

1966 4

1-3 增刊 1-2

(84)

学术研究

XUESHU YANJIU



1

一九六六年

論历史上流传的海瑞形象和吳晗同志筆下的海瑞形象·····	黎 滨 (1)
談海瑞的升官、罢官与东山再起·····	卞恩才 黃崇岳 (8)
从清官談到海瑞的評價問題 ·····	刘序琦 (14)
讀《杜国庠文集》筆記 ·····	赵紀彬 (18)
学习杜国庠同志研究哲学史的革命精神·····	杨荣国 李錦全 (24)
沒有成功的人物形象就沒有成功的戏 ·····	王 琢 (31)
——关于革命現代戏創作怎样組織戏剧冲突的問題	
談写人民内部矛盾和“暴露文学”的区别·····	萧学鵬 (44)
生活的艺术結晶·····	杨 嘉 (50)
——評《綠竹村风云》第一卷	
略論王杰同志的幸福观 ·····	叶 蔭 (56)
学习《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毛主席著作的意义·····	刘 嶸 (62)
学习毛主席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理論的体会·····	左 群 (67)
革命实践是經濟理論的源泉 ·····	陈錫潤 黃麟福 王光振 (71)
关于农业半机械化問題 ·····	吳 勉 (74)
专用綠肥經濟效果問題的初步考察 ·····	邵建勋 (80)
談組織工业生产专业化的条件問題 ·····	赵元浩 (86)

动 态

广东经济理論工作者下乡調查增产增收問題 (79)

广东文、史学界开展关于《海瑞罢官》問題的讨论 (封三)

論历史上流传的海瑞形象和 吳晗同志笔下的海瑞形象

黎 宾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海瑞形象，是三百年来封建地主阶级根据本阶级的政治需要而精心焙制出来的。

最近几年，吳晗同志在《論海瑞》和《海瑞罢官》等一系列作品中，对历史上流传的海瑞形象，又重新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再塑造和再宣传。人們有理由要問：这样做，究竟是适应了哪些阶级的政治需要？

为了說明这个问题，不能不对历史上的海瑞形象和吳晗同志塑造的海瑞形象作些考察。

海瑞形象的流传是封建統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統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統治，总是要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統治經驗的。明朝的海瑞就很注意这一点。当他在世的时候，曾及时地总结了自己的統治經驗，編成《淳安政事》等书。他死后，除万历皇帝贈諡“忠介”之外，其他地主分子所写的“年譜”、“行狀”、傳記和編定的文集，連篇累牋，不一而足。海瑞在世之日，封建王朝就注意向其他官吏传播海瑞的“德行”和統治經驗，而海瑞死后的三百多年中，他一直受到封建王朝、地主豪紳和文人騷客的礼贊和祈表。海瑞的形象不仅在上层統治阶级中流传，而且封建統治者特別注重向下层社会中广为流传开去，于是就出现了大量的以海瑞为主角的清官戏和公案小說。歌頌海瑞的剧本《金环記》在明代已經出现，清代描写海瑞的传统戏有《朝阳凤》、《五彩輿》和《德政坊》等等。公案小說中則有《大紅袍》、《小紅袍》，以及长篇彈詞《福寿大紅袍》等。在这些公案小說和清官戏里，海瑞对被压迫人民采取的軍事镇压这一手在许多场合下不見了，而政治欺騙这一手也往往被篡改為关怀老百姓，爱护老百姓了。他一切都从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是一个“清如水，明如鏡”的人，是一个“为民請命”、“打抱不平”的人，是一个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敢把“皇帝扯下馬”的人。海瑞由一个农民阶级的敌人，搖身一变成了农民的“恩人”。所以，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海瑞形象，并不是真正的海瑞形象，而是一个被溢美了的神化了的形象。这个形象集中表现了封建宗法統治的特有的迷惑性，用“为民父母”“爱民如子”的面紗，来掩飾“那些把人們系縛于其‘天然尊长’的复杂封建羈絆”，从而維持那“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剝削。”（《共产党宣言》）

历史上流传的海瑞的形象，是剥削阶级精心树立起来的一面缓和阶级冲突、散布阶级调和幻想的旗帜。他们树起这面旗帜，并广泛地宣传到下层社会中去，是为了使农民相信，农民的贫困和受欺凌，不是根源于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是由于贪官、坏官没有执行“王法”，因此，只要有了“清官”与老百姓作主，伸张“王法”，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借此泯灭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使农民把自己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对“清官”的幻想上。

马克思說得好：无产阶级以前的剥削阶级，总是“战战兢兢地請出亡灵来給他們以帮助”。（《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封建統治阶级这样塑造海瑞形象，就是为了帮助维护封建統治而“召唤亡灵的行动”。所以，海瑞形象的流传是統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要說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海瑞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明朝統治阶级为什么特別重視海瑞說起。

海瑞是調和阶级矛盾的封建卫道士

說到明代的海瑞，有几个问题是发人深思的：

海瑞所处的年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下降时期，为什么封建社会的統治阶级在下降时期大力宣扬海瑞式的清官，要比封建社会前期卖力得多呢？

海瑞所处的年代是明朝的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帝的时代，是明朝由盛而衰的轉折点，是經濟“繁盛”而又危机四伏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海瑞真正有“清官”政績可言的时期极短，計任淳安知县六个年头，兴国知县一年，任应天巡撫才九个月，总共七年多，他究竟有多少政績，是极为可疑的。他在《兴革条例》中，自供在淳安知县任內，“初意直欲以圣贤之所已言者，据守行之，自謂效可还至。迄今四載，中夜返思：日日催征，小民卖子鬻产，未有定事之日；时时听訟，小民斗狠趋利，未有息訟之期。感孚之道薄而民不化，烛奸之智浅而弊犹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見其功。”在任应天巡撫之后，又在《被論自陈不职疏》中提到自己失职的情况說：“賦役未見均平……而軍兵未聞强壯……刁訟未息，禁浮靡而侈僭如初。謂扶弱，被侵夺而貧者自貧；謂抑强，肆侵夺而富者自富。”为什么地主官僚和封建文人偏偏要把他捧为“海青天”？

更奇怪的是，海瑞罵了一些人，許多被罵的乡官豪紳，在慨叹海瑞过于古板的同时，一致都說他的好話，說他一切都是“为民”！这又是为什么呢？

問題的症結在于：在封建社会走向崩潰的时期，統治阶级更加腐朽了，阶级矛盾更加尖銳和复杂了，农民起义提出的“等貴賤，均貧富”和“均田”的綱領口号，明确地指向封建制度，标志着农民的新觉醒。为了扼杀农民对封建制度的日益提高的認識，维护其反动統治，所以統治阶级更加需要采取反革命的两手政策。而明朝的嘉靖、万历年間，不仅是处在封建社会走向崩潰的时期，而且是阶级斗争的风暴一触即发的时期。面对着农民革命斗争的发展（从抗租抗税、逃亡到起义）和新觉醒，統治阶级除了使用赤裸裸的

暴力之外，还迫切需要使用另外一种統治手法：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一些改良措施，緩和一下矛盾，另方面散布“執法公平”之类的階級矛盾可以調和的論調，以欺騙農民。而海瑞就是一个竭力“緩和衝突”、散布“階級調和”毒素的人物。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一名著中曾經揭露了剝削階級国家的所謂“緩和衝突”的活动的本质，他說：“在馬克思看来，国家是階級統治的机关，是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階級衝突得到緩和。在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階級調和，而不是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緩和衝突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压迫階級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工具和手段。”

重溫列宁这段話，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海瑞进行“緩和衝突”的活动的实质。

海瑞“緩和衝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农民武装起义，这就是列宁說的，是“剝奪被压迫階級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工具和手段”。

海瑞早在福建南平县任儒学教諭的时候，就为防止驛传水夫的逃亡和起义上疏献策，在《驛传申文》中說，“然应付不堪，必至逃避，逃避誤官事，必如初年水夫之变。”在《驛传議·无策》中說：“百鈞之馬，不堪千鈞之任也。近日十室九空，聚为盜賊，見其端矣。”海瑞关于驛传問題的政見，本质上都是为了剝奪水夫之变和逃亡起义的斗争手段。他任淳安县知县后，在《諭矿徒告示》中，威胁武装掘矿的起义者說：“若仍前所为，是終日取祸亡也，尔等念之，反思之，毋自貽悔。”在《兴革条例》中，提到镇压嘉靖年間矿徒武装起义，及組織保甲乡兵，巡捕义軍的問題。一五六三年任兴国知县，竭力解决逃亡問題，整頓“防盜隘所”。在有名的《治安疏》中提請嘉靖皇帝注意“盜賊滋盛”的問題。在《被論自陈不职疏》中說，在应天巡撫任內时，“江北之荒，比苏松尤甚，劫掠之多，其經奏聞屢矣，”于是他竭力用“以工代賑”方法和改革募兵制等办法来防止。在《劝农文》中，明令农民“毋酗酒，毋斗争，毋作强賊，毋毆杀人，毋从白蓮教自殞其生”。凡此种种，都是海瑞“緩和衝突”的第一要义。所以海瑞在每一个时期，除了采取政治欺騙，威胁利誘之外，还极其注意抓兵权，以暴力镇压作为他軟的一手的后盾和基础。

海瑞“緩和衝突”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紧紧抓住“封建道德”与“封建的法”这两个武器，一方面，建立一种封建的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而所謂秩序，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就是使階級压迫固定化、合法化。另一方面，又通过“仁义道德”和“執法公平”来散布階級調和論的毒素。

先說封建道德。海瑞对封建皇帝和官僚的指責，并不是对剝削罪恶的批判，恰恰相反，他只是从封建道德的准則來說明問題。《治安疏》开宗明义說“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又說“二十余年不視朝，綱紀弛矣”。他指斥嘉靖皇帝，不过是說他离开了三綱五常，这样对維持封建秩序不利。海瑞标榜守礼法，道往古，遵先王。海瑞很懂得道德宣传对群众的麻痹作用，例如他任知县时在乡里恢复“乡飲酒礼”，各乡要找一老人掌教化。他自己說，設此老人，是“千金买駿馬之骨”，便于駕御“愚民”。

海瑞反对豪强的故事中，总是提出“父改子”之类的父子之間的綱紀問題。海瑞的指

斥从来没有越过封建礼法一步，也就是說，随时都没离开维护封建秩序而斗争。

次說封建的法。海瑞并不是对封建法律加以否定，而只不过是按照封建法律办事，实际上海瑞执法也并不是那么“公平”。在《启刘石圃誠意伯》一文中，海瑞自供，鉴于“吳中刁訟”，“衙門前尝不絕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候月满发驛充徒。曾有解审二三起，俱原告中途脫逃，解人告称，聞此重处声也。生心喜之，謂可以消息刁訟矣”。这是說他对許多越級告状的原告先施以重刑。在《被論自陈不职疏》中說：“江南民风刁伪，每放告日，状动以三四千計，臣所准行二十分中之一而已。”說明他所处理的案件甚少。在审案过程中，海瑞是带着阶级偏見定案的。如在《吳吉祥人命参語》中說，“不告奴仆而誣措主人，以求抵敌，今日人情之常”。他就是以这种有利主子的“人情之常”来断案的。在《諭道府州县毋听嘱托》一文中，說明判案目的是为大多数士大夫有一个清白名声，所謂“从公从实，必使諸士夫心事得以自明，刁頑小民不得借为口实。”在《示府县状不受理》一文中，禁止府县审案时“姑念貧民愚民之說”，为了对付貧民，“本院已諭令各府县官，始无憚煩，終无姑息。痛之使畏，庶乎事可衰止”。凡此种种，都說明了法律的阶级性和海瑞执法的阶级性。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簡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末，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規定”。（《第六屆萊茵省議会的辯論（第三篇論文）》）因此，怎能說得上海瑞“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海知县，海都堂是当时被压抑、被欺騙、被冤屈人們的救星”？

海瑞“緩和冲突”，还表現在进行某些改良，作出限制某些豪强的姿态，（当这些豪强无限制剝削引起的危机威胁到整个統治阶级統治的安定的时候）从而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服务。

海瑞的改良除了“平冤獄”之外，主要表現在：对地方弊政苛例进行某些兴革，修建水利，賑济灾荒；抑制豪强，丈量土地，主持退田。

所有这些措施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即《治安疏》中所說的“求万世治安”。海瑞还在未仕以前，就一貫反对“欲为目前苟安之图，不思万世无穷之利”（《治黎策》），主张“絕后患图久安”（《平黎疏》）。

能否說，海瑞在维护封建統治阶级长远利益的同时，也为被压迫的人民謀福利呢？

否！海瑞在《兴革条例·里长老人》条中說：“剝其子以厚其身，竭泽而漁，非不得魚，明年无魚。”在《里老参評》一文中，海瑞重述了这一段話。在《驛传議·无策》中說道：“百鈞之馬，不堪千鈞之任也。”海瑞是把役民当作牛馬的。

难道說，这样一个精心策划如何更长久更安稳地魚肉人民的地主头子，这样一个把人民当牛馬的海瑞，有絲毫是为人民謀福利的嗎？

海瑞在作地方官时所进行的废除地方自訂苛稅的兴革，除了是为了稳定封建王朝的

万世基业之外，还是为了保证朝廷的“维正之供”，即保证封建统治阶级的基本地租。在《兴革条例》中，他说：“然则钱粮之繁，朝廷为之耶？诸臣私自为之耶？下民归怨，朝廷所自致者何如？诸为朝廷取怨者何如？”海瑞不过是生怕朝廷的正差絹粮受到丝毫的损失罢了。

海瑞进行苏松水利建设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地主阶级谋福利，因为，在苏松一带，地主乡官占有绝大部分田亩，他们是水利工程的最大受益者，难怪骂过海瑞的大地主何良俊仍表扬其开吴淞江之力。另一方面，他在《被论自陈不职疏》中说：“江北之荒，比苏松尤甚，劫掠之多，其经奏闻屡矣。”透露出修水利是为了“以工代赈”，防止人民乘荒年举行武装起义。

海瑞在苏松主持退田，九个月间有多少政绩可言是很值得怀疑的。至于说到海瑞的丈田，正如他在《量田则例》中所说：“产业争论者极多，今日丈量，止以见今管业人众为业主，不论前事”，不过是承认土地兼并的现状，丝毫也不会阻遏兼并之风的盛行。

总上说来，海瑞是一个对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什么较大作用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在地主阶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极有用处的忠臣；海瑞是一个没有多大政绩和实际建树的人物，但却是一个设计了种种统治方案，作出了种种统治经验总结的能臣；海瑞是一个并没有给贫苦农民真正带来什么利益的人物，但却是为封建道德而不惜献身的统治阶级的楷模。所以，海瑞是一个维护封建统治的最大的功利主义者，是一个对农民采取军事镇压与政治欺骗而尤长于政治欺骗这一手的封建卫道士，是农民阶级不可调和的阶级敌人。这便是明朝的海瑞的本质和真实的形象。

吴晗同志对他所塑造的海瑞形象的宣扬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封建统治阶级铸造出来的海瑞形象，本来就已经较之历史上真实的海瑞大大地走了样，而吴晗同志所刻划的海瑞形象，却更加歪曲历史。

在封建社会里，不管统治阶级怎样把海瑞打扮成一个超阶级的人物，但是，他们打扮海瑞的思想武器只能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而打扮海瑞的目的又是维护封建统治，这就决定了他们对海瑞形象的塑造和透过海瑞所宣扬的东西，也只能是封建的伦理道德、等级观念和恩赐观念，而决不可能超出封建社会所不可能有的社会意识。只不过是利用艺术的加工，使它更富有欺骗性罢了。

吴晗同志对海瑞的刻划却远不止此。

吴晗同志在《论海瑞》一文中，竭力刻划海瑞的“强哉矫”、“大丈夫”、“古今一男子”、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形象，号召人们学习“他反对坏人坏事，不屈不挠，从不灰心丧气，勇敢地把全部生命投入战斗”的“斗争的一生”。在《海瑞罢官》中，作者精心描绘了海瑞的“退田”和“平冤狱”，并通过剧中人海瑞的口，说“海瑞不只做官，还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海瑞死都不怕，何况区区一顶乌纱帽”，并严斥徐阶“学乡愿讲园融愧对吾皇”。自称“老来傲骨犹然在，岂肯折腰媚权臣”。于是，在吴晗同志笔下，海瑞的“刚直不

阿”的“反乡愿”精神，被充分地提到了阶级的高度，海瑞成了一个对现存秩序具有叛逆性格和干预精神的杰出“英雄”。

看来，吴晗同志不仅继承了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所塑造的海瑞形象，继承了封建的道德观念和恩赐观念，而且又在海瑞身上强加进去许多资产阶级的东西，使海瑞又披上一层薄薄的资产阶级面纱，使他既有点“民主”、“博爱”的风度，又是“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的“全民”利益的代表者，显示出资产阶级的性格，从而使海瑞一身二任，既是一个封建的卫道士，又儼如一个资产阶级的勇士。

为什么在我们大力提倡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旧观念、旧传统的时候，吴晗同志还着力刻划和宣扬这样的海瑞形象呢？吴晗同志在《论历史剧》一文中说：“旧历史剧在过去的时代里，是起了它应有的作用的。……每一个历史剧都有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或者以古喻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或者是强调某一方面的教育意义，或者有其他意图等等”。而现代的“正确的历史剧可以普及历史知识，是进行历史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最有效的工具”。既然吴晗同志如此清楚地懂得每一个历史剧都有它的现实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以及它的潜移默化的巨大力量，那末，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当然也是有所为而创作的了。因此，人们有理由要问：

吴晗同志号召人们学习海瑞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精神，这乡愿又是指谁呢？他要引导人们去反对哪些人呢？

吴晗同志号召人们学习海瑞，学习他“骂皇帝”的勇敢精神，是要人们勇敢地去骂谁呢？

吴晗同志号召人们学习海瑞“不屈服，不丧气”的精神，学习他“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是指引人民对谁不屈？不怕什么性质的失败？又坚强地去“再干”一些什么事情呢？

吴晗同志为海瑞“曾经遭受攻击，排挤，辱骂，坐过牢，丢过官”而惋惜，要青年人仰慕他，这是对什么类型的人物表示惻隐之心呢？

直到吴晗同志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他仍然没有回答这些实质性的问题。他不敢承认自己灵魂深处有一个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王国，在这个王国的字典上，“刚直不阿”究竟是有怎么样的现实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甚至在“自我批评”中仍然说：“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

什么“正义感”？！什么“斗争性”？！还是让吴晗同志的那些起了极其恶劣的社会效果的作品本身来回答吧！

所谓反对乡愿，就是在“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论海瑞》）的旗号下，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反对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干部。

所谓“正义感”，所谓反对甘草，反对“圆融”，反对“明知是坏事而不敢反对”，就是要和党唱对台戏，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攻击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暂时的、局部的细小缺点，惟恐攻击不尖锐，惟恐天下不乱。

所謂“斗争性”，所謂“失败了再干”，不过是鼓励人們去再干“平冤獄”、“退田”这一类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所謂不怕“丢官”、“罢官”，不过是为那些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败下陣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撑腰和慰勉。

除了这些，还能說明什么呢？在这里，吳晗同志的世界观、政治态度和“以古非今”“借古諷今”的史学方法与艺术方法，都是一致的。吳晗同志不是向来都自詡要叫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嗎？在《論历史剧》里不是明明白白地談出了历史剧的时代背景和創作意图嗎？怎么到了写“自我批評”时，又說自己在写《海瑞罢官》时，“‘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則在当时一点也沒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这种表白，人們怎能信得过呢？吳晗同志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但沒有脱离“现实”，因为他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最现实的政治要求。吳晗同志还說，“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吳晗同志发出了那么多的号召，能够用“糊涂”加以解釋嗎？

人們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必然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史学方法和創作方法。貫穿在吳晗同志的历史研究和創作实践中一个十分錯誤的思想方法就是“借古非今”。而这就是吳晗同志的《論海瑞》和《海瑞罢官》的創作意图。

几百年来，封建統治阶级所塑造的海瑞形象的流传，在人民群众中散播了极为有害的影响，直至今天，这种流毒还没有彻底清除。吳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不只是通过社会主义的舞台，贊扬了封建的毒素，而且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毒素。因此，今天的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必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这种毒素加以彻底批判，毫不姑息地加以清除。讓我們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使战斗的历史科学在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斗争中，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迸发出青春的光采！

談海瑞的升官、罢官与东山再起

卞恩才 黃崇岳

海瑞的起家与升官

海瑞(一五一五——一五八七年)，广东琼州(海南島)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父是举人，当过知县。父亲是廪生，叔伯都是举人或进士。他早年丧父，其母謝氏，“矢志励节，日夜与公(海瑞)偕寝处，口授孝經、学、庸諸书。”当他逐渐长大后，又“择严明师托之”。这样的出身和教养，在海瑞身上深深打下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烙印，形成了儒家思想的世界观。在以后的活动中，他处处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封建制度的卫道士自居。梁云龙说他“直欲学圣贤”，“言动必则古昔，称先王，莅官必守祖宗成宪”。^①这些话，是梁云龙对他的一曲颂歌，而我们今天看来，恰好是他的阶级本质的写照。

海瑞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是明朝由盛而衰的年代。嘉靖、隆庆年间，据《国榷》记载，云南地区有李向阳起义，自称混天大王，攻占安宁、三泊等地，并得到南安、泥丛等地义军的响应；四川地区有蔡伯贯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旬日間就攻破合州、大足等七城；江西地区有叶槐和李文彪的起义，各率义军万人；广东惠潮地区有黄启荐率领的起义军，攻占海丰碣石、甲子等地；海南島昌化、陵水、感恩等地的黎族人民也不断地起来进行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并得到汉族人民的支持。在明王朝危机四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革命烽火遍地燃烧的年代，海瑞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为挽救明王朝的命运，奋斗了一生。

一五四九年(嘉靖二十八年)，海瑞以《治黎策》中举。以后又向皇帝上《平黎疏》，系统地阐述自己对军事镇压与政治统治黎族人民的主张。他一方面称赞明王朝的残酷镇压是“赫然之举”，另一方面又认为单靠军事镇压还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最好是“乘今日大军之势，首恶既平之后”，“开十字道路”，“设州县”，以作政治上长久统治之計。

一五五八年(嘉靖三十七年)，海瑞因宣扬封建礼教和参预政治有功，便从福建南平儒学教諭，提升为浙江淳安县令。他在任内，一方面实行清丈土地，在客观上些微减少了点农民的负担，而另一方面又着力建立保甲制度，组织地方武装，以此来对付“为衣食計而来”“劫村杀人”的“矿徒穷民”。^②

五年后，他调任江西兴国知县。当时兴国人民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目睹这种状况，海瑞一方面做了一些整理田籍，招徕逃民的工作，另一方面，则对挣扎在死亡线上

^① 梁云龙：《刚峰海公行状》，载《海刚峰先生文集》卷之下。

^② 《保甲法》，载《海忠介公集》卷之二。

的农民采取高压政策，把所謂“防盜”的隘所的分布和人員加以調整，強化軍事、政治机构，以維護业已动搖的統治。

由此可見，海瑞这套軍事镇压与政治統治双管齐下的反革命两手政策，象一条黑綫貫穿在他早期的政治活动中。这种反革命的两手政策，是他为封建統治階級服务的看家本領，也是他比同时代的許多封建官吏高明和迷人之处。也正是由于他認識到两手要比一手好，所以，他在不放松抓軍事的同时，总是或多或少地做点減輕徭役和賦稅的事情。

他在担任地方官吏时，积累了这套統治經驗之后，于是在他由地方官升为京官的第二年（嘉靖四十四年），便向明王朝上了一个《治安疏》^①，提出整頓軍隊，刷新政治的主张，希望嘉靖皇帝按照他的統治术办事，以恢复明王朝的青春。

在海瑞看来，朱厚熜长期以来沉湎于修仙养道，妄求长生不老，不理朝政，是弄得“天下吏貪將弱”的根本原因，如果做皇帝的不振作起来，在“盜賊滋熾”的年代，地主階級的江山便有复沒的危險，而朱厚熜也就辜負了地主階級对他的期望。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統治，为了維護整个地主階級的利益，他宁愿做一个封建卫道者以殉“王法”，而不愿眼見地主階級的江山被农民革命推翻。所以，他在《治安疏》里，首先一再表示“臣受国恩厚矣”，不得不“披肝为陛下言”。既然是“瀝胆披肝”，自然不能不触着朱厚熜的痛处，而触着痛处的目的，就是要皇帝振作起来，使“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复兴矣”。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做臣子的胆敢揭皇帝的短处，这自然是犯了大罪，何况朱厚熜又是个庸庸碌碌的昏君。所以嘉靖在大发脾气之下，便将海瑞下獄。不过，朱厚熜也意識到海瑞“有比干之忠”，如果“遽加刑戮，恐后无此人了”。^②因而沒有把他杀掉。

海瑞提出的整頓軍隊和“刷新”政治的两手政策，虽然沒有被明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接受下来，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但是他却因此为統治者所賞識，在出獄后三年内連升六級，并于一五六九年（隆庆三年）七月，升为右僉都御史，欽差总督粮儲，巡撫应天十府。这說明明王朝之所以重視海瑞，不仅仅是他的忠君，而且还由于他有一套“高明”的統治术。

海瑞上疏所表現的“不怕牺牲”的精神，既感动了嘉靖皇帝，也为同时代的官僚地主所推崇，說他“挫折不磨，鼎鑊不避，即伊尹奚让”。^③可見海瑞“不怕牺牲”的精神，乃是为君尽忠，为臣死节的維護封建統治的精神。既然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为封建統治階級所贊許、所推崇、有利于維護封建統治的封建道德品质，为什么吳晗同志却一再贊許、推崇并要我們向海瑞学习呢？毛主席教导我們說：“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剝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还輕。”^④海瑞愿意替剝削与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心甘情愿以死来寻求封建王朝的統治的稳定，这种死，比鴻毛还輕，有什么值得歌頌和值得学习的呢？封建統治階級提倡学习海瑞是完全可以理解

① 《海忠介公集》卷之一。

②③ 梁云龙：《刚峰海公行狀》，載《海刚峰先生文集》卷之下。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03頁。

的；而吳晗同志提倡我們向海瑞學習，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因為，“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爱。”^① 所以，“不怕犧牲”的精神，決不能抽去它的階級內容，必須看他為那一個階級的利益不怕死，從而去加以肯定或者否定。明王朝肯定海瑞不怕死，是因為封建統治者需要這樣的忠實奴才。而吳晗同志今天還在大力贊許海瑞的“為民請命”，提倡學習海瑞的“不怕犧牲”的精神，是適應那個階級的政治需要，難道還不一目了然嗎？

應天巡撫與海瑞罷官

海瑞高升為應天巡撫之時，江南地區的階級矛盾是十分尖銳的。海瑞到任之後，還是採取了他過去的那一套“剿撫兼施”的統治術，即首先抓軍隊。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和防止原有的招募來的軍隊倒向農民起義一邊，他主張廢除募兵制，而以民壯防守本鄉本土，以加強地主武裝力量。在他看來，招募來的兵，士氣不高，戰鬥力不强，“小民偷逸成習，一僉為兵，載塗怨讟”，^② 而且募兵制會引起農民起義。他在《革募兵疏》中說：“二三十年以來，閩、廣、浙、直之變，大抵生自募兵。召之則為兵，散兵則為賊，再有召募，又不過即此前日之賊應之”。組織地方武裝，既可“省冗費”，又可達到“安地方之事”的效果。由此可見，廢除募兵制的根本目的是加強地方軍事力量，防止和對付農民起義。

在抓軍事武裝的同時，他又行使了“牧師式”的另一手政策，即疏浚吳淞江、白茆河，以及搞了些所謂“平冤獄”、“退田”的事情。這些事情，至今仍被一部分史學家所津津樂道，推崇備至。這樣我們就有必要來分析一下這三個“政績”的階級實質。

海瑞上任後，江南正值水災，而水災直接影響了國家稅糧的收入。同時，伴隨而來的是階級矛盾進一步加劇，“飢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富有統治經驗的海瑞，預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面。他說：“飢饉頻仍，變故叵測”，^③ 如果不“賑濟”，江南農民起義即將爆發，便採取以工代賑的辦法，“修復水利，以濟迫切飢民”。乘災荒之機，大量搜括勞動力，去疏通吳淞江和白茆河，從而達到“國計所需”和防止“變故”，緩和階級矛盾，這就是海瑞“修復水利”的目的。史稱疏浚吳淞江“計費甚省”^④，而且，不到兩個月就已經完成，這說明飢民的勞動力是極為廉價的，當時參加水利工程的飢民的人數是很多的，勞動的強度是很大的。疏浚吳淞江和白茆河就是建築在江南人民血汗的基礎上。吳晗同志把治水的功績歸於海瑞一人，描寫老百姓是如何贊揚“海龍王出世”。我們說，治水的功勞應該記在勞動人民的賬上，勞動人民才是歷史真正的創造者，絕不是騎在人民頭上指手劃腳的海瑞。

海瑞治水雖然客觀上對生產有利，但在土地高度集中的情況下，被奴役的農民又能

①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72頁。

② 《革募兵疏》，載《海忠介公集》卷之一。

③ 《開吳淞江疏》，載《海忠介公集》卷之一。

④ 梁云龍：《剛峰海公行狀》，載《海剛峰先生文集》卷之下。

得到多大的好处呢？相反，水利却成了統治階級对劳动人民的吸血管，农民又被統治階級吸尽了血汗。因为，生产得多一些，統治階級剝削得也就更多一些，到头来，农民还是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这正如恩格斯說的：“文明底基础既是一个階級剝削另一个階級，那末它的全部发展便是在經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領域里每前进一步，同时也就意味着被压迫階級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后退一步。”^①

讓我們再来看看海瑞在任巡撫时期“平冤獄”的真相。

海瑞任应天巡撫时，告状的人确实很多，“每放告日，状动以三四千計”，^② 說明当时江南地区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同时也說明一部分人对統治階級所宣扬的“海青天”还抱着一綫希望。但滿口“仁义道德”的海瑞，并不是真的想去解决这些告状的問題，他却借口“民风刁伪”，“民刁奸胜”，只“准行二十分中之一而已”，^③ 而且这些案件，也不是全由海瑞亲审，而是“尽批府县，情重解审，非臣自問”。海瑞处理案件的冷淡态度，使得人民对“海青天”的幻想破灭了，而海瑞却得意地說：“自十一月以后，則告人减前，所准极少。”^④ 海瑞还誣蔑告状的农民为“刁訟”，一再告示府县“严治刁訟”，施用“重刑”，“衙門前尝不絕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候月滿，发驛充徒”。^⑤ 他企图用严刑来“消息刁訟”。这怎能說海瑞是“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們的救星”呢？怎能說海瑞“站在农民一边的”呢？又怎能說海瑞“昭雪了許多冤獄”呢？

既然“平冤獄”不过如此而已，那么“退田”又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江南地区土地高度集中，乡官利用封建特权大肆兼并土地，史載：“盖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胥怒而恨。”^⑥ 海瑞在一五六九年十二月巡历松江，告乡官夺产者就有“几万人”。府县官吏对海瑞說：“民今而后得反之也。”^⑦ 海瑞主张某种程度的“退田”，正是迫于当时尖銳的階級斗争的形势。这一点还可从他給首輔李春芳的信中得到印証：“存翁（徐阶）近为群小所苦太甚，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亦自取也。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靜計也，幸勿以为訝！”^⑧ 这段話說明海瑞要徐阶退田正是为了避免“民风刁险”，緩和階級矛盾，以挽救业已动摇的封建統治。海瑞对徐阶的“小打击”正是为了大維護，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靜”，为了整个地主階級的长远利益。因此我們决不能說，海瑞主张“退田”是为人民利益着想的。

再說，海瑞对一部分大地主的“小打击”也是非常有限的，海瑞在《被論自陈不职疏》中說：“况先夺其十百，今償其一，所償无几”。又說：“謂扶弱，被侵夺而貧者自貧，謂抑强，肆侵夺而富者自富”。說明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的海瑞，沒有也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問題。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0頁。

②③④⑥⑦ 《被論自陈不职疏》，載《海忠介公集》卷之一。

⑤ 《自刘石圃誠憲伯》，載《海忠介公集》卷之五。

⑧ 《复李石麓閣老》，載《海忠介公全集》卷五。

可是《海瑞罢官》却极力夸大海瑞“退田”的政绩，仿佛海瑞的一纸公文，就使地主阶级自动交出土地，而农民的土地问题只要依靠海瑞的“恩赐”便可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田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

事实果真是如此吗？我们知道，封建国家是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官吏、法庭、法律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海瑞是地主阶级的大官吏，是地主阶级的法官，他执行的法是地主阶级的法律，怎么能依靠海瑞来为农民“平冤狱”，为农民“退田”呢？海瑞怎能成为农民的政治代表和农民的“救星”呢？如果真的如吴晗同志所描写的那样，那末，封建的国家和法律也就成了超阶级的全民的国家和全民的法律了，封建的官吏也就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也就根本不存在了，从而也就不需要革命，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可见，吴晗同志的上述观点，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和国家学说的。

事实上，海瑞“退田”的主张乃是为了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这个主张与一部分广占土地的大地主的目前利益发生了冲突，因此遭到了一部分大地主的反对，加剧了地主阶级的内部倾轧，海瑞在这一场倾轧中成了暂时的失败者。

在《海瑞罢官》中，把海瑞描写成站在劳动人民的一边，替人民“平冤狱”和闹“退田”而被罢官，是歪曲历史事实的，也是颠倒了海瑞的阶级立场的。

人们不禁要问：吴晗同志用歪曲历史事实，用颠倒海瑞的阶级立场的手法，来美化和颂扬海瑞的“退田”和“平冤狱”，对反复强调“古为今用”的吴晗同志来说，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东山再起

一五七〇年海瑞罢官以后，回到老家居住。但他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除通过文字对广东和琼州府各州县官员提出斥责或赞扬，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外，也曾直接干预州县的政治措施，心怀王朝，坚持他维护封建王朝利益的立场。

封建王朝对他也是很关心的，希望他早日从政。史称“归未几，而荐（海瑞）者踵至。”^①皇帝也很操心，再三再四敦促有关部门，“遇有两京清散员缺推补”^②，有关部门曾考虑让他出任通正司左通政，万历帝朱翊钧仍嫌大材小用，要有关部门“再查相应员缺起他”^③。说明封建王朝对他寄予极大希望，人虽在野，影响在朝。

一五八六年（万历十三年）二月，经过十六年考验的海瑞，终于东山再起，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御史，后改为吏部右侍郎。接到通知后，他受宠若惊，立即走马上任。当时他已七十二岁，风烛残年了。有些人劝他不要去拼这条老命，他说：“主上有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④这个头发斑白、牙齿稀疏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便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一年之后，海瑞死于南京，明王朝折断了一根台柱，皇帝为之“咨嗟缠恻”^⑤。为了

^{①②③④⑤} 梁云龙：《刚峰海公行状》。

表彰他对封建王朝的忠心，万历帝贈他太子少保諡忠介，死了还給他升官。

为了在人民当中制造对統治階級的幻想，腐蝕人民的革命意志，封建統治階級便开动宣传机器，通过文学、戏剧等形式，大肆渲染海瑞的“政績”和“美德”，让海瑞的幽灵繼續为封建統治階級服务。这就是几百年来有关海瑞的种种傳說到处流行的原因，这是封建統治階級散布的毒素。但是，历史是无情的，革命的火焰是不熄的，無論是活海瑞或死海瑞，到头来都不能挽救封建王朝复灭的命运。今天，吳晗同志又进一步把海瑞这个幽灵重新打扮起来，并搬上社会主义的戏剧舞台。当然，历史的車輪是不会倒退的，但这种妄图使历史車輪倒退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确不能不引起我們严重的注意。

升官、罢官与东山再起說明什么？

海瑞的升官，說明他是地主階級的忠实的政治代表。他依靠反革命两手政策起家，并在毕生的政治活动中，熟练地运用这两手政策，以适应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他是統治階級中比較有远見的人物，全部活动都是为了緩和階級矛盾，消弭人民的革命，挽救封建王朝的統治，維護整个地主階級的利益。因此，他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推崇。

海瑞罢官，是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互相傾軋的結果，而决不是海瑞为人民利益斗争的結果。每当封建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时，对于怎样繼續統治人民，維護整个地主階級利益的問題，在統治階級內部的不同政治集团間，是会发生爭論和冲突的。有时为了保存整体的利益，也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个别剝削者的利益。同时，在这种內部爭論和冲突中，也总有一部分人胜利了或失敗了。海瑞就是其中暫时的失敗者。

海瑞的东山再起，是明王朝把他当作一根“扶大厦之將傾”的支柱，而他本人也的确是做到了为封建統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海瑞在地主階級与农民階級之間、統治階級与被压迫民族之間的矛盾斗争中，始終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一方，处处为地主階級的长远利益着想。为了巩固地主階級的統治，他不服老，不怕死，确实不是“甘草”，而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錚錚一汉子”。他的一生，是为封建統治階級利益“斗争的一生”。他不可能是“既为了巩固封建統治階級的长远統治”，又是“处处事事为百姓設想，为民謀利”的合二而一的化身。

对海瑞的評價，必須把海瑞放到当时階級斗争的环境中去考察，坚持馬克思主义的階級分析。对明代人关于海瑞的評價，必須站在无产階級的立场上加以分析批判，不能兼收并蓄。明朝統治階級对海瑞的渲染，是封建統治者进行階級斗争的一种手段，是麻痹人民斗志的鴉片烟。吳晗同志的《論海瑞》和《海瑞罢官》不仅是照本宣科，甚至用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感情加以渲染，这显然是从封建主义的武庫中寻找評價历史人物的武器，借古諷今，从而适应了社会上一小撮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政治需要。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从清官谈到海瑞的评价问题

刘序琦

吳晗同志认为“清官”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人民的“救星”；姚文元同志却认为“清官”、“貪官”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没有什么区别。如何看待“清官”是当前评价海瑞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想从这个角度提出一点浅见，供讨论参考。

說吳晗同志认为“清官”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人民的“救星”，也許吳晗同志会不服气地说：我不是不止一次地说明过海瑞的活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统治”，“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嗎？^①但实际上吳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论述却是另一回事。让我们来看看吳晗同志是如何评价海瑞的？

一、海瑞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民的救星”。

二、海瑞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他“强迫乡官把侵占的田地退还百姓”，“穷人田地被夺的都到巡撫衙門告状申诉，海瑞一一依法判处。老百姓欣喜相告，从今以后有活路了。”

三、海瑞为人民申雪冤枉：他“敢替老百姓撑腰说话”，“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他是站在农民一边”。^②

这样的海瑞，还不是农民的“救星”嗎？可惜历史上的海瑞完全不是如吳晗同志所说的那样。

海瑞是明朝中叶的人。当时阶级矛盾已达到异常尖锐的程度。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以皇帝为首的官僚、縉紳、地主霸占着大量的土地，农民的土地几乎被掠夺已尽；另一方面，官僚、縉紳、地主又通过“诡寄”、“飞洒”、“移挪”等手段，把全部的赋税和徭役轉嫁到农民身上，“户去粮存”。农民实在活不下去，就四处逃亡，“流民”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山西、貴州、河南、四川、广东等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盗贼滋熾”。

江南地区土地更为集中，又是明王朝赋税收入主要来源地，问题更严重，是当时阶级矛盾的焦点，处在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种阶级斗争形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海瑞来到江南后，执行了统治阶级两手政策中的另一手，以“牧师”的面孔出现。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阻止农民革命的爆发，巩固明王朝的统治。

海瑞并不是“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的人民“救星”，而是“处处事事”为统治阶级长远利益“设想”为明王朝“谋利”的忠臣。例如，在吳晗同志大肆渲染的那篇“罵”

① 吳晗：《論海瑞》、《海瑞罢官》序。

② 以上見吳晗：《灯下集》、《海瑞的故事》。

皇帝的奏疏中，海瑞就說：“夫天下者，陛下之家，……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① 这不是清楚地說明海瑞的一切活动是为了使明王朝如磐石一样稳固嗎？海瑞也就是立志要做一块封建王朝的基石。他早年所上的《平黎疏》中，提出一套剿灭黎族人民起义的办法，很得統治者的贊賞，其根本目的是要“永絕禍根，遺安万代，省国家无已之費，紓陛下附髀之忧。”^② 海瑞任淳安知县时期，提出有名的“兴革条例”，要府吏及下級官吏不要剝削得太厉害，因为“竭泽而魚，非不得魚，明年无魚”。^③ 这一切不是很清楚嗎？海瑞所反对的是“竭泽而魚”，而不是什么“为民”。而在吳晗同志的笔下，海瑞却搖身一变，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成为人民的“救星”。这是对历史莫大的歪曲。

吳晗同志的清官——人民“救星”的理論是与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階級調和論。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階級压迫階級的工具”(毛主席語)，封建国家就是地主階級对农民階級专政的工具。而封建官吏就是代表地主階級来执行这种专政的。資產階級学者在“清官”問題上制造了很多混乱，似乎“清官”是“超階級”的，是“公正”与“正义”的化身。今天，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义階級分析法扫除这种混乱，揭示出“清官”的階級本质。“清官”之“清”不过是一种虛假的表面現象，“官”才是本质。無論他如何“清”，如何“好”，他的本质还是“官”，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無論清官进行了多少改革，做了多少“好事”，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长远利益，而不是相反。

吳晗同志的清官——人民“救星”的理論是十分有害的。首先，它从根本上取消了階級的分野。这样一来，官与民、地主与农民还有什么区别？封建社会的历史也就不成其为階級斗争的历史，而只是“好人”与“坏人”的斗争史了。这与馬克思主义的階級观点真乃天淵之別。其次，这种理論，从根本上取消了农民革命。按照这种理論，有了“清官”，农民有冤可申，不愁沒有土地、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有活路了”，那末又何必起来革命呢？毛主席說：“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階級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④ 按照吳晗同志的理論，清官倒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了。再次，吳晗同志这种理論，必然导致否定无产階級对农民的領導，否定我們党所領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并非危言聳听。因为，既然有了“清官”，可以解决农民的土地、衣食問題，使他們过好日子，又何必需要无产階級来領導他們来革命？

吳晗同志这种理論，不論自觉还是不自觉，它不是引导人民走向革命、斗争，而是用階級調和論来模糊人民的階級界限，制造对統治階級的幻想，放弃革命和斗争，是不利于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我們要毫不姑息地加以清除。

二

姚文元同志在“清官”与“貪官”之間划上一个等号，因而对海瑞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种意見也是值得商榷的。我們要“用无产階級的宇宙观批判地对待一切，并不是

① 《明史·海瑞传》。

②③ 《海瑞集》。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9頁。

不要继承，否定一切。”^①

清官問題是一个被資產階級學者弄得十分混亂的問題，然而也是一个比較複雜的問題。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必須要坚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但不能是簡單化。很多歷史人物，不能因為他們是封建地主階級出身，就一概否定。如果是這樣，那麼歷史上除了幾個農民起義的領袖之外，就沒有可以肯定的了。列寧說：“無產階級敵視一切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制度的一切表現，但這種敵視並沒有解除它應對資產階級人士在歷史上的進步和反動加以區別的責任。”^② 這對我們評價剝削階級中的歷史人物是一個極重要的指示。對於剝削階級的歷史人物，首先要揭露其階級本質，但與此同時，又要對具體人物作具體分析，不能一概否定；或在否定的基礎上，也要考慮其中某些地方應適當肯定。

對歷史人物，特別是剝削階級的人物，有無可以肯定之處，主要標準是看其對當時歷史的發展，對生產的發展，對文化藝術的發展有否起到一定的作用？在那些方面起到這些作用，就肯定這些方面。剝削階級的人物當然是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所作所為都是為了維護剝削階級的長遠利益，這是毫無疑問的。難道能要求他們站到被剝削階級的立場上來？如果那樣，他們就不成其為剝削階級的一員了。承認這點，但不能因此對剝削階級的歷史人物完全否定。如果他們的活動，在客觀上對當時的歷史、社會生產和文化藝術的發展有一點促進作用，為什麼不能適當的肯定呢？

“清官”問題也是如此。有人把“清官”與“貪官”等同，甚至認為“清官”比“貪官”更壞，因為“清官”緩和了階級矛盾，而“貪官”加劇了階級矛盾。這樣，貪官豈不成了歷史發展的动力嗎？這種歌頌奴隸主的皮鞭與封建主的枷鎖的觀點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毛主席說：“地主階級這樣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的窮苦和落后，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 and 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③ 而貪官就是“地主階級這樣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的集中表現，對歷史和生產的發展是起阻礙和破壞作用的，會比“清官”好嗎？

當然，“清官”與“貪官”，從其階級本質上來看是一致的，但又不能完全等同，還是有所區別的。

首先，“貪官”對人民的剝削與壓迫是赤裸裸的，毫不顧及什麼封建法律；而“清官”帶上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至少表面上是要遵守和維護封建法律的。

其次，“貪官”完全是從其個人利益和私欲出發的，對人民的剝削與壓迫特別殘酷。又因在封建統治階級中“貪官”是占絕大多數，因而對社會生產的破壞性大。而清官不純粹是為個人的私利，主要是從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出發。有時採取一些改良措施，在客觀上減輕了勞動人民的一點負擔，或多或少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

既然“清官”與“貪官”還是有所區分，那麼對歷史上的清官海瑞應如何評價呢？

① 《紅旗》1965年第11期社論。

② 《列寧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頁。

③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9頁。

我們认为海瑞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忠臣，是明王朝的一块基石。他一生所作所为，都是从整个地主階級的长远利益出发，保护明王朝不被农民革命的风暴所摧毁。在階級矛盾尖銳的形势下，海瑞执行了封建統治階級“牧师”的职能，緩和了階級矛盾，阻止了农民革命的爆发，充当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調节器，他不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方面，而是极力維護腐朽的明封建王朝。他不是应当肯定、歌頌，而是应当否定、批判的历史人物。

从海瑞一生的活动来看，在否定的基础上，有无某些可以肯定之处？我們认为以下三点是可以考虑的。

一、海瑞在任应天巡撫期間，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稍稍減輕了人民的一点負担，在客观上对局部地区生产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当然，一条鞭法并不是从海瑞开始的，早在嘉靖十年（一五三一年），南直隶宁国知县甘澧就实行一条鞭法，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年），浙江巡撫御史庞尚鵬曾在江南实行过一条鞭法。到隆庆三年（一五六九年）海瑞做应天巡撫，就是采取庞尚鵬的成法，在应天十府的范围中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实行，不仅减少了赋稅的名目，而且由于改为官办，减少了下級官吏在征粮时从中貪污、榨取，在客观上对当时人民多少有点好处，海瑞自己也說：“此法于各衙門誠不利，于百姓則为甚利。”^①因而对生产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海瑞任应天巡撫才九个月，一条鞭法遭到大地主的反对，推行也不彻底，其作用是有限的。但为以后张居正改革，在全国普遍推行一条鞭法奠定了基础。

二、兴修水利，特别是修治吳淞江，对生产也有些好处。根据史料記載，海瑞修吳淞江是事实，而姚文元同志以“想当然”来否定，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吳淞江的修治，使附近地区免除水患，对生产是有利的。有人說，这是劳动人民的功劳，不應該記在海瑞賬上。当然，吳淞江是劳动人民修治的，但不能說和海瑞完全无关。因为，如果没有海瑞的建議与領導，吳淞江能否修成、何时修成还是一个問題。按照这种邏輯，秦始皇筑长城，隋煬帝开运河，又有什么值得肯定之处呢？

三、海瑞不貪污，廉洁，生活俭朴。这在当时統治階級奢侈腐化、貪污成风的明朝，还是难能可貴的。明代官吏貪污之风特別盛行，“撫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賄是視，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②而海瑞不貪污，所过生活也較為俭朴，也没有为他的后代积累什么财产，甚至死的时候也无法安葬，还是御史王用汲湊一点钱代葬的。这点是难能可貴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美德对統治階級中个别人物的影响。

毛主席說：“……給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辯証法的发展。”^③所以，我們认为給海瑞以公正的評價，就应当予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这丝毫不是說我們还要向海瑞学习什么，而是尊重历史的辯証法的发展。

① <海瑞集>。

② 赵翼：《廿二史劄記》，《明初吏治》。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01頁。

讀《杜国庠文集》筆記

趙紀彬

当杜老逝世时，我正住院治病，未能撰文一抒哀悼，始終耿耿于怀。际此杜老逝世五周年前夕，重温《杜国庠文集》，益觉其于哲学史方法論，創見独多，在建立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哲学史通途上，确是伟大的“便桥”；因写学习筆記数則，以为紀念。

一

中国奴隶制的下限，迄于何时？乃正确衡量先秦諸子思想的先决問題。对此問題，历史学界与哲学史界，均有长期爭論；杜老于此，有其一家之言：

……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时代。……开始于春秋中叶而完成于汉代，……学术史上的“百家爭鳴”，正好反映着社会史上的氏族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第五页）。

杜老此說，有两个要点极应注意：

第一，学术史是社会史的反映；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反映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氏族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此种論断，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中国哲学史实际相结合，至为显然；亦正因如此，杜老强调指出唯有阶级分析才是科学方法：

他们（按指先秦諸子）在主观上都想“以其学易天下”，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如果用“纯哲学”的眼光去衡量他们，结果必然要失败；窥得一斑，失掉全豹（第四页）。

第二，肯定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完成于汉代。此中义蕴，杜老闡发不多；据我的体会，当謂从春秋至于战国，經濟領域的封建化虽已基本完成，而政权却始終为奴隶主世袭贵族阶级所垄断；其間的侯国兼并、乱賊篡弑以及僭礼变法等等措施，均未能解决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直至公元前二〇九年陈胜、吳广大起义，才由革命暴力将奴隶主世袭贵族阶级逐出历史舞台，地主阶级利用革命力量盗窃了政权，在奴隶制废墟上，开拓出封建制度发展的道路。此即是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不是由于上层的改良，而是由人民的暴力革命所完成。

上述两个要点，由一条紅綫貫穿起来：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原理。

二

先秦諸子的思想，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杜老对先秦諸子的研究，亦不是“为研

究而研究”，而是其在抗日战争时期与蒋管区反动思想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武器：

……时代的落伍者，也惯会向古老的思想宝库中，找着他们所喜爱的长满了锈的武器，拿来镀点金，贴上‘新’的商标，到处叫卖。因此，读者如果不愿上当，就必须有点思想发展史的常识，首先弄清楚先秦诸子的思想，尤其是它们中间的关系，才不至为那些漂亮的商标所贻误（第五至六页）。

此所谓将生锈的古老思想贴上“新”的商标到处叫卖，正是当时蒋管区反动思想的时间表现形式。杜老所指，定非一家，而其主要代表者，当为馮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例如在《論〈公孙龙子〉》中，杜老指出：

在研究中，也时常觉得公孙龙好象还活着，活在近人的新理学之中。公孙龙的“指世界”，似就是新理学的真际——“理世界”。在理世界中有许许多多的“理”，在指世界中也有许许多多的自藏的“指”。它们都是不变的。所不同的，只是“理”要“气”去“依照”，而“指”则“固自为非指”，自动地下凡。自然新理学是写得比《公孙龙子》精致些、细腻些，这是“时间”的功劳。他们都从实际的分析出发，而结果都不切于实际，不合乎真理。在二千多年前，就有人作过那样的“指”观，可说已奇；而在二千余年后还有人在做这样的“理”想，也不可不说很奇。在这一点上，“时间”又似乎对于某些人显得格外无力。谁能说几千年前的古物不会和当前的现实生活发生藤葛呢？也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把研究的一点点结果写了出来（第一三三页）。

由此足证，杜老的哲学史研究，乃当时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特点所急需。针对此种需要，当时有不少的哲学史著作，例如郭沫若同志的《驳说儒》与《十批判书》，侯外庐同志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与《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杨荣国同志的《孔墨的思想》等，虽各有自己的体系，却在战斗方向上互为犄角，并从不同方面体现出哲学史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而杜老的长者风格与独创研究，则尤为各家所同尊。

三

从一九四二年起，馮友兰先生的“新”字号著作，先称《贞元三书》，后又扩充为《贞元之间所著书》，在蒋管区蔓延至广；当即受到应有的批判：陈家康同志从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批判其认识论；胡绳同志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批判其历史观；杜老则从哲学史方面，批判其“歪曲史实，厚诬古人”；此三方面的批判，恰相呼应，影响极为深远。

《文集》的第三部分，共收录论文五篇，有四篇为批判馮先生的专著：其一，《论“理学”的终结》，乃对于《新理学》的批判；而批判的方法，则为从明清之交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颜习斋诸人的反理学斗争中，论证“理学”“绝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第三七七页）。其二，《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批判《新原道》的道统观念，“歪曲事实，有损学者的风度，貽误青年的学业，尤应纠正”（第四〇五页）。其三，《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批判《新原道》、《新原人》的宇宙人生观；指出所谓“社会的最高底首领”，实际上是“不学无术”、“容恶庇奸”、“擅权窃国的大奸巨慝”；所谓“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便是在精神上麻醉被压迫者，而松懈其斗志，直接地替压迫者维持其腐败

慘酷的統治，間接地阻礙了社會的革新”(第四三四至四三五頁)。其四，《評馮友蘭的新形上学》，是對於《新理學》、《新世訓》、《新時論》、《新原道》、《新原人》等五書的總批判：“為了‘持標新統’，不惜抹殺史實，厚誣古人，為了鼓吹‘玄風’，不惜提倡‘風流’，是認‘任誕’，則不免有損學人的風格。而且這種形上学，崇尚‘玄虛’，足以阻礙科學的發展，標榜道統，也復違背民主的精神，對於今後和平建國的大業，實不相宜”(第四三六頁)。

上述的批判，全是在大量史實中，由細膩的分析所導出的科學論定，擺事實講道理，說服力與邏輯力極強，既對於馮先生的體系謬誤，進行了徹底批判，又對於哲學史規律做出了深刻闡述，確是破中求立的榜樣。

四

杜老在哲學史研究中，十分重視《莊子·天下篇》“道術將為天下裂”，指出此語雖不免於唯心，卻充分透露了階級分裂的社會必然將產生不同思想的真理(第三七八頁、第四一三頁)。根據此種“一分為二”的辯證方法論，杜老針對《新原道》所說“經虛涉曠”的“玄學”傳統，系統地強調了中國的唯物主義優秀傳統：

在先秦，強調了與思孟、老莊及施龍對立的墨、荀、韓三家；在西漢，強調了楊王孫與王充；在魏晉六朝，強調了楊泉與范縝；在兩宋，強調了楊萬里與陳亮；在明清，強調了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顏習齋及戴震。通過一系列唯物主義傳統的強調，杜老揭穿了《新原道》“先論舊學，後標新統”，是對於中國哲學史的最大歪曲，並且進一步指出：“道統思想，本來與所謂法統思想原是一對孿生兄弟，同是社會沒落的社會階層所產生的思想”(第四一三頁)。

杜老關於唯物主義發展規律的闡述，貫注着“實事求是”與“經虛涉曠”的對立，亦即“致用”與“虛玄”的對立。在此對立中，包含兩種本性相反的世界觀，而方法論乃世界觀的應用，因此，亦同時揭露了《新理學》方法論的形而上學實質：

馮氏……說：“‘過河拆橋’是大不道德底事。但講哲學即非此不足以達到‘玄之又玄’的標準’。……這方法是怎樣的呢？……比方說，經驗是“橋”，不從“分析解釋經驗”開始，便得不到所謂“形式底”觀念，例如“理”，好像沒有橋就不能到達彼岸。但“既已得之之後，即見其並不另需經驗以為證明”，……好像已過了河，無須用橋，……其始“仍是以事實或實際底事物，為出發點”；其終，則成為“哲學可以說是不切實際，不管事實”的(《新理學》第一二頁)。所謂“過河拆橋”，就是這個意思(第四三八頁)。

此種“過河拆橋”的方法論，正是馮先生《貞元之間所著書》的形而上學秘密，亦即所謂“現代新邏輯”的形式主義表現。杜老為要揭穿此種方法的唯心主義實質，關於先秦的“名辯”，尤其關於《墨經》與《荀子》，以及唐代輸入的“因明”，進行了細致深入的研究，並在“邏輯離不開認識論”的真理指導下，為中國邏輯史開創了光輝的篇章。

五

与馮友兰先生以承接程朱理学而宣扬新的形而上学相呼应，熊十力先生宣扬陆王心学的《新唯識論》，亦同时刊行了“語体本”，其影响虽不及《新理学》广泛，实乃将生鏽的古老思想，貼上“新”的商标，到处叫卖的另一支派。因此，杜老亦对之进行了相应的批判：在《紅棉屋札存》中，既从思想渊源上批判其“六經注我”的主观主义（第四七七至四七八页），又从訓詁句讀上揭露其“断章取义”的誣妄作风（第四八三页）。此一批判，虽然着墨不多，而却深刻之至。在批判的基础上，杜老进一步指出：

我们并不反对吸收各派的见解，消化它，综合它，用来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我们反对的是“破句读书”，歪曲附会，强使古人就己的接受遗产的方法。因为这样做，不但重诬古人，而且徒使思想系统混乱起来，反而成为学术进步的障碍（第四八四页）。

应当指出，杜老在二十三年前所反对的接受遗产的方法，即断章取义，歪曲附会，强使古人就己的方法，在目前关于哲学遗产批判继承問題的討論上，仍有现实意义。因为此种方法，即是將古人思想，貼上“新”的商标，到处叫卖的方法，亦即“旧思想利用新形式”，“改头換面地滲入新事物之中”的方法，在目前的遺產继承問題上，乃急需批判的主要危險。

六

在《略論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中，杜老通过对于“提倡制礼作乐的先生們”的批判，关于礼乐的起源与发展，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专史研究。在此不足一万八千字的专史研究中，引《詩·周頌》者六章，引《三礼》者五篇，引《左》、《国》、《史記》者八次，引《論》、《孟》、《荀》、《韓》者二十一次；引《隋书·經籍志》与《經典释文》者二次；此外，于阮元、姚际恒、康有为、钱玄同、王国維等人的研究以及郭沫若同志的《駁說儒》、德国卢森堡的《經濟学入門》与日本山川均的《資本主义以前經濟史》等著作，亦各有称引。凡此，足証杜老的博雅。

但是，杜老的研究，不止以博雅过人，而在其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經史文献进行科学的分析，导出独創的結論。例如：

第一，关于《礼記·礼运》篇与《荀子·礼論》篇的“礼”的起源說的不同，杜老在分析了前者保留着原始社会的影子以后，进而指出：“这不同是由于它們所反映的社会的发展阶段不同。荀子的礼的起源論，是不符合于初民社会的情形的；因为‘求而无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乱’的观念，确是阶级分裂以后的社会情形的反映，它和荀子时代的社会状况正相适应的”（第二七三页）。

第二，关于从孔子到荀子“礼学”思想的发展，杜老认为，孔子的时代，礼虽动摇，尚有相当权威，故只要說“是礼也”，就可以使对方首肯；但是到了接近社会变革的前夜，礼已处于几乎没有权威可言的时候，所以后期儒家荀子的《礼論》，一开始便从說明

礼的起源入手，这是孔、荀礼学不同的一个特点。从此分析中，杜老指出：“由此可見历史的进展，不依人們的主观見解为轉移，反而人們的主观見解要以历史的进展来解释”（第二九三页）。

凡此关于礼的起源与礼学发展的研究，可視為鉄案不移的定論。但是，杜老的分析闡发，“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而是針對“提倡制礼作乐”的唯心主义复古逆流进行有的放矢的战斗：

沒有石斧的发明，就不会有干戚的“武舞”，沒有弓矢的发明，也不会有弦乐。这样看来，礼节和音乐的发展，是跟着社会的“经济结构”之发展而发展的。可见礼乐不是“推进历史的动力（象燕义权所说）”，反而历史实是推进礼乐的动力（第二七一页）。

……所谓“礼学”，……其本身实随着时代而发展，不能一概而论，但都具有差等观念，适应于从奴隶制社会后半期到封建社会建立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东西。所以，不加批判地提倡什么“礼学”，那必然要做古人的俘虏，而根据那些“礼学”来鼓吹“制礼作乐”，也必然要开倒车，硬拉中国走上复古的道路；因为它们都是既不科学又非民主的，不适于现代中国的东西（第二九五页）。

从一九四三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文化，出現了“复兴礼学”或“制礼作乐”的逆流，在《中国学报》、《文化先鋒》、《新評論》、《时代之波》、《民主半月刊》等反动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此类“怪談”（王冠青的《三民主义礼乐綱要》，胡說此种“怪談”会一变而为现代学术上的“怪杰”），上引杜老所批判的燕义权，以礼乐为推进历史的动力（見所作《儒家历史观》），即此类“怪談”之一。

杜老在批判中，強調“中华民族目前正在爭取抗战的胜利，正在爭取建国的前提，——而这却需要民主和科学的”（第二六六页）。此种批判标准，显然是以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經典規定作为指导思想的。所以杜老明白指出：

只要使民众获得充分的民主自由，获得丰衣足食的机会，获得接近世界前进的新文化——尤其是新的科学和文艺，获得批判接受中国过去文化的方法和时间，那末，经过了一个相当时期之后，一定会有优美的礼节和音乐产生出来（第二九六页）。

侯外庐同志为《文集》作《序》，认此所謂“世界前进的新文化”乃“指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第九页），自为定論。但我受此启发，又深感杜老此文此段，乃对于解放区的歌頌；并从其政治上“民主自由”（《在陝甘宁边区参議会的演說》）、經濟上“丰衣足食”（《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文化上“世界前进的新的科学和文艺”以及“批判接受中国过去文化的方法”（《改造我們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等各方面欣欣向荣之中，看到了新中国的雛型。总之，此乃历史分析与政治斗争相結合的科学批判的方法論。

七

王匡同志在《写在〈杜国庠文集〉后面》中，认为“杜老的本色就是一位哲学史家”（第五九一页），此乃公允的論定。如前所述，杜老的哲学史研究，乃以批判资产阶级的哲学

史方法为重点；其批判的武器，乃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論，其坚持的方向，則是党在当时根据毛泽东思想制定的策略和政策。

因此，杜老写的批判文章，在学术上旗帜鮮明，在政治上极有分寸，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哲学史家的修养与风度。故杜老在研究中导出的具体結論，虽不必为各家所共許，而杜老所应用的方法及所坚持的方向，則永为科学哲学史工作者所共由的唯一通途；“便桥”的伟大意义，当在于此。

一九四六至四七年在沪，与杜老同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編写，比邻而居，时相过从，其談及哲学史方法論者，多与《文集》互为表里；本文在过录原著首尾所附己意，則半为当日对話的片断，半为重溫《文集》的随感，其与杜老本义是否有合，未敢自必；至希分別观之。所遺憾者，自沪上一别，迄未相遇，犹蓬之心，未获頓开；杜老逝世五年以来，我在哲学史上，亦复碌碌无所长进；惟愿循“便桥”指引的道路，全力以赴。

学习杜国庠同志研究哲学史的革命精神

杨荣国 李錦全

杜国庠同志是我国最早运用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取得卓越成績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論著《杜国庠文集》，鮮明地体现研究哲学史的战斗的批判的革命精神，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結合的榜样。我們讀过后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下面愿意就我們学习所得，談一些初步体会。

一

杜老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抓住了中国哲学思潮在各个社会阶段中的关键性問題。即是說，能够从各时代哲学思潮的“一切迷乱中追踪其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証明其一切表面偶然性中的內在規律性”（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正因为这样，所以杜老不是一般地讲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而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力图闡明各个时期思想斗争的特点及其发展規律。同时杜老还認識到，一个时代思潮是不会凭空产生的，正如恩格斯所說：“每一历史时期由法权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宗教观念、哲学观念和其他观念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來說明的”（同上）。因此，哲学虽然是“更高高凌駕于空中的思想部門”（恩格斯：致《康·施米特》书），但毕竟是为当时的社会經濟所制約。而杜老在依次追踪各时代思潮的发展特点时，就是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來說明各个时代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演变的原因。

杜老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认为“在中国学术的园地里，先秦諸子的思想，无疑的是第一批开出来的鮮艳美丽的花朵”，但諸子思想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这自然有着它的社会根源”。杜老指出：“因为那个时代，正是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时代”，“学术史上的‘百家爭鳴’正好反映着社会史上的氏族貴族和新兴地主階級的斗争”（《杜国庠文集》第五页。以下所引，只注页碼）。到“战国末叶，已是奴隶制社会的結束阶段，故学术思想也到了可以总结的时候”，因而出現中国古代思想的綜合者——荀子（第一九一页）。杜老认为：“荀子时代，已是奴隶制社会接近私有土地的显族阶段，新的私有經濟已将达到‘取而代之’的时候”（第二〇二页）。“这里反映着社会已到了变革的前夜，礼坏乐崩已达极点，礼学須有新的根据才能維系人心，至少新兴阶层是这样要求的”（第二〇一页）。因此，在反映新兴力量利益的“荀子的思想中，就可看出由礼到法的发展的痕迹”（第一九八页）。杜老并批評“过去許多腐儒，蔽于卫道的偏見，往往因性恶論而扬孟

抑荀，因痛恨暴秦的焚书，便以罪李斯罪荀卿，从来不肯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学术。不知道礼論的发展，以及由礼到法的递嬗，是历史必然的发展的反映，不是某些人所能凭空构想出来的。所以‘知人論世’，必須对于当时的历史有更深刻的認識”(第二〇一页)。杜老說这番話，就是从当时社会經濟的演变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来说明荀子思想的必然趋向，从而对荀子思想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評價。

战国以后，杜老认为“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之渐趋确立，思想学术也逐渐地庸俗化并僵尸地教条化起来”(第二九九页)，这就是所謂定儒学于一尊。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杜老指出：由于汉代“确实地奠定了封建社会的經濟基础”，“并在这基础之上建立了經学一尊的一代的思想学术”(第三二二页)。这即是說，中国奴隶社会到汉代已經完成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所以他說：“到了西汉时候，社会变革完成，思想界也就发生了‘尊崇儒术，罢黜百家’的事件，要是把它简单地看做董仲舒个人所策动，汉武帝一时的高兴，那就錯了”(第五页)。杜老这番話，就是說明一个时代思潮的产生并不是决定于个别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于当时社会經濟和阶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結果。

从两汉經学演进为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杜老亦是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特点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他认为：“如果可說，两汉思想主潮的經学植基于县乡亭制下的比較巩固的土地制度，那末，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主流便是那种土地制度动摇破坏了的时代的产品。因为兼并盛行，农民失所，社会的基础动摇以至破坏，必至引起經濟的危机，发展为政治的危机，反映于思想学术，便不能不表现为浮华任誕的特色”(第三二二页)。所以他說：“正統經学之衰歇，主要原因固不由于玄学夺其席，而实由于它自身已失去了社会的根据”(第三三四页)。“按由清議到清談的演变，本为社会經濟上由‘地著’到‘萍浮’的反映”(第三四五页)。

唐宋以后，中国哲学轉入反理学对理学的斗争，在这一阶段中，杜老特別注重对明清之际黄、顾、王、顏的哲学的研究。他說：“在中国学术史上，明清之交(約当公元十七世紀)，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重要时代。这个时代之所以重要，是它总结了宋明五百余年的所謂‘理学’，而完成了这一学术任务的，則为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顏(习斋)諸人”(第三七七页)。由此可見，杜老对清初学者的研究，是从总结反理学斗争这一时代特点出发的。他认为“当南宋理学正盛的时候，已有和它对立的学說存在”，“明朝中叶以后，反理学的思想又見抬头”，但“沒有取得支配学术界的地位而已”，“及至明清之交，受了‘天崩地解’的刺激，遂汇为巨流，成为一种风气，終于表现于黄顾王顏的学术，而把理学結束了”(第三七八页)。

由上所述，可以見到杜老的研究是紧紧抓住各时代思潮的发展特点，并且从社会經濟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来深刻地說明思想变化的原因。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总是反对用形式邏輯的办法把思想学說看成是孤立不变的东西。他說：“同是这个从人从二的仁字，有孔子‘仁者爱人’的仁，有程明道‘渾然与物同体’的仁”，“甚至以‘冲决網罗’自命的譚嗣同，还替自己的哲学安上‘仁学’的名称”。“真是‘見仁見智’，一样商标，各种货

色；稍不注意，真会叫你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滿腦子牢記着哲學名詞，不但一點沒有用处，倒把思想弄糊塗了”（第六頁）。杜老這番話，就是指出我們對古人的一些思想學說，不能單從所使用的名詞術語上來形式地看問題。因為時代不同，所反映的社會基礎不同，故必需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進行階級分析，才能認清各種貨色的本來面目，而給以正確的評價。

顯然，杜老對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首先表現出來的一個特點，就是有着鮮明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歷史在其發展過程中是有它的實際內容的，就階級社會來說就是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而杜老在中國哲學思想史研究中，其所以能夠對中國社會各個時期的哲學思潮和思想家的哲學思想分析得那樣深入、細致，那樣合情合理，那樣具有極大的說服力，就在於他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從而科學地論證了，作為意識形態的哲學思想是上層建築的一個方面，它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為一定階級的政治服務的。超時代、超階級的哲學思想從來就不存在。

但是，直至今天，在哲學史研究工作中，還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不能用來研究中國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也有人則提出所謂“普遍形式的思想”，並且認為這種超階級的形式具有真實性。這些分歧，正是在學術研究中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兩條路線的分歧，是哲學上不同黨派性的表現。

二

杜老對中國哲學史上唯物主義對唯心主義的鬥爭，態度一向是非常鮮明的，就是闡揚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當時由於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底下，一般不容易發表直接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因此，能夠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闡揚歷史上的唯物主義和進步社會思想，實質上就是加強了人民文化力量，杜老對中國歷史上唯物論思想的闡揚，可以說是做到不遺余力的，他做的這項工作，對國民黨政府所宣揚的反動思想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因之，在當時是有着極其現實的意義。

從杜老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哲學史上是有着豐富的唯物主義傳統。如在先秦諸子中，杜老就指出：“墨家邏輯可以說是集先秦邏輯思想的大成，是中國古代一家比較完備的唯物主義的邏輯”（第五四四頁）。而“荀子的宇宙觀在先秦諸子中，是最富於唯物主義的因素的”（第三九頁）。因此，杜老特別用力於墨家的邏輯和荀子思想的研究，這做的就是闡揚中國歷史上唯物主義思想傳統的工作。

從杜老看來，中國古代唯物論思想亦是从對唯心論思想的鬥爭中得到發展的。如說荀子的宇宙觀，就是和“西周以來的上帝神的天道觀分手，同時也與宋尹學派之類的形而上學的天道觀分手”；即是說，荀子通過對這些有神論和形而上學天命思想的鬥爭，才能提出“明天人之分”的主張，而“建立了戡天思想”（第四〇頁）。同樣漢代的王充亦是通過對當時唯心主義的災異譴告說的批判，而發展了唯物主義自然觀。

從漢以後到南北朝，宇宙本體的“有無”問題與形神關係問題，又逐漸成為唯物論與

唯心論斗争的焦点，杜老一方面追溯墨家的有无观，认为是一种脚踏实地的科学的見解，是和道家所謂“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玄学的有无观，恰恰相反，并指出这种合于常識和科学的有无观，发展到晋时裴頠所作的《崇有論》，更肯定宇宙中間是“有”从“有”生，批判了当时“无能生有”的唯心主义玄談的說法，亦从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本体論(第五〇三至五〇四页)。

对形神关系，杜老亦着重发掘和闡揚有关这个问题的唯物主义看法。如汉武帝时提倡羸葬的杨王孙，杜老指出他的“精神离形”、“死者不知”的理論是范缜《神灭論》的先导(第三二〇页)。又如魏晋間創立水一元宇宙論的杨泉，杜老亦指出他是一个唯物論者，同时指出他对人类形神关系的看法，以为人死神灭，主张“人死之后，无遺魂矣”(第三五七页)。这种神灭思想发展到齐梁之际，范缜就写出有名的《神灭論》，对佛教唯心主义神不灭思想給以致命打击。杜老在《范缜的唯物思想》一文中对《神灭論》曾作出全面考察，并从而肯定范缜的神灭思想“在中国的唯物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第三六二页)。

唐宋以后，唯物主义的发展路綫轉到反理学斗争方面，因而杜老亦着重这方面的闡揚工作。如他指出南宋的杨万里用人事說《易》，正是針对着程朱等的“先天、后天”“太极、无极”的玄学者“易說”而发，有意与之对立的(第三七八页)。又如指出陈亮曾从正面去反对“道德性命之說”，后来反对理学的人，大抵都继承着他“志存經濟”这种傾向(第三七八至三七九页)。从杨、陈的反理学发展到明清之际，杜老更列举当时費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顏元等諸大师，指出他們虽然出身不同，性格不同，造詣不同，但其間却在反理学上表现出共同的特点，认为这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結果(第三八四页)。这就是說明从宋明以来，反理学斗争已成为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由于清初諸大师反理学的特点，往往不是从本体論方面来批判理学的唯心主义观点，而是多从“經世致用”这个角度来反对理学的“空談心性”。因此有些人看不清这场斗争的思想实质，以致低估了明清之际反理学思潮的哲学意义。杜老卓越的貢獻在于他不是教条地对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而是根据中国历史的特点，把“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并从而闡明清初的“經世致用”思想的唯物主义实质，使之与玄幻的理学唯心主义相对立。如他指出費密所謂道，是“人道”而不是“天道”，这是一种重“致用”的見解，和杨万里、陈亮等反理学論調，自有一脉相通之处(第三八二页)。对黄宗羲則指出他因挽救王学的流弊而側重功夫，終而从重視“当世之务”而走到对理学的否定(第三八四页、三八八页)。对顾炎武，杜老則认为他所以反对理学，实由于他做學問的目的在于“經世致用”(第三八九页)。对顏元則指出他做人治学是怎样富于“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他能彻底批判了理学(第四〇〇页)。

另外，杜老还注意到由于中国被儒家經典支配了近二千年，一些被称为“异端”的唯物主义思想往往会披着“正教”的外衣出現。因此，他特別強調要人們多多努力发掘包裹在“正教”外衣里面的一些有价值思想的真面目，而他自己亦正是致力于这项工作。如他

所写《披着“經言”外衣的哲学》一文，就是揭开戴震以疏証孟子为名的“經言”外衣，闡明戴氏哲学在認識論和宇宙論中的唯物主义实质及其在理欲論上反程朱理学的巨大意义（第三七〇至三七二页）。

与闡扬唯物主义的同时，杜老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思想和人物，則从来就是采取批判的态度。在先秦諸子中，他着重批判庄子和公孙龙，特別对庄子的滑头处世哲学，更給以辛辣的嘲諷（第三六页）。至于对公孙龙的研究，則通过对他“离坚白”这一詭辯方法的分析，从而揭发他这种多元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实质（第一二五页）。目的亦是作为反面教材来批判。

在先秦諸子之后，杜老特別着力抨击魏晋清談（玄学）与宋明理学（道学）。他一方面指斥“清談的士大夫的空談无用”，而影响所及，却“助长了后来士大夫的所謂明哲保身的乡愿风习”（第三五三至三五四页）。对于理学，杜老亦认为是“空談‘道德性命’”（第三七九页）。指出“玄幻的理学是怎样和现实的致用相反的”（第三八二至三八三页）。由于玄学与理学都一样在談玄說虛，因此，杜老认为两者亦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即玄学“为道学埋下了种子”（第三五四页）。

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玄談道学都是为当时的反动統治阶级所喜爱，因为这些言心言性，故弄玄虛的說教，不但不会有損于反动統治，相反会起着麻醉人民和维护反动統治的作用。因此，到中国末代王朝蒋介石統治的时候，他們还是不能忘怀这些长满了锈的武器，拿出来鍍点金，貼上“新”的商标，到处叫卖，以此来欺騙人民。如在抗战后期馮友兰先生所提倡的“新理学”，就是这样。

面对着资产阶级玄学的猖獗一时，杜老写出一系列的批判文章。揭开“新理学”提出的所謂“經虛涉曠”的玄学外衣，指出他們为統治阶级涂脂抹粉，而要劳动人民安命于阶级压迫这一奴隶哲学的反动实质。

杜老对“新理学”的批判，主要針对着他們这种“經虛涉曠”的玄学作风。当时馮友兰先生要为他那一套“最玄虛的哲学”——“新理学”提高身价，曾写出《新原道》一书，企图建立起他的新道統，并自命为独接“中国哲学的精神”。与此針鋒相对，杜老在《玄虛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一文中，一方面正确指出：“中国哲学的精神，不是‘經虛涉曠’，而是‘实事求是’”（第四〇五页）。即是說，只有从战斗中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才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同时，揭露“新理学”所自居于“接着”的只是几个唯心主义的传统，是“集道家、玄学、禅宗及宋明道学的‘玄虛’之大成”（第四三八页）。这里杜老正是用鮮明的党性原则来划清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对立的体系，从而揭穿“新理学”以“中国哲学之精神”自居，只不过是一块鍍着金字的冒牌商标，而实际上所表现的却是已經早已发锈的“中国玄学之精神”。所以杜老說：“如果单說它（指“新理学”）是玄学的精神的进展，倒也罢了”，“要是說成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就得提出抗議了”（第四一三页）。

杜老对“新理学”的玄学精神，不但从哲学史的角度来加以揭露批判，指出这是“以玄学传统僭称中国哲学的精神，不合中国哲学的史实”（第四一六页），并且还直接指斥

这些所謂“最玄虛的哲学”是怎样在为害人生，虽然当时馮友兰先生一面說他的“新理学”是“无用底”“空虛之学”；但另方面又說它有“无用之用”，“也可称为大用”。这說明“新理学”并不真的是什么“遺世独立”的东西，而是在当时是起着反动的作用。

针对“新理学”这种企图，杜老写出《玄虛不是人生的道路》一文給以严正的駁斥。指出“这种宇宙人生观在实际上的弊害”；一方面美化統治者，說“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作王”，“这种說法，势将助桀为虐，而誤尽天下蒼生”；另方面說劳动人民只要能“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一样地也可以做到圣人，这是“在精神上麻醉被压迫者，而松懈其斗志”，是“直接地替压迫者維持其腐敗慘酷的統治，間接地阻碍了社会的革新”（第四三四至四三五页）。这样杜老就揭开“新理学”的玄学外衣，暴露出这种“帮閑哲学”的反动实质。

显然，杜老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表现出又一个特点，就是在他的全部学术著作中，都是充满着革命的战斗精神。这是說，在杜老的研究工作中，不但具有严谨的科学性，而且还有着高度的革命性。由于杜老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是为着党的革命利益来从事学术工作。因此，他在研究工作中，总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批判旧事物、旧思想、旧习惯、旧传统。杜老运用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来研究哲学思想史，就极其有力地宣扬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唯物主义的发展路綫，揭示出了中国古代唯物論思想总是从对唯心論思想的斗争中才得到发展的这个客观真理，表明了不破不立，不塞不流，确是事物发展的規律；而杜老对于古代哲学思想史的批判又总是和对当时资产阶级意識形态的批判紧密地結合起来。这样，杜老的研究工作，也就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創造、有所前进；并最終落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上来，为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陣地，作了孜孜不倦的战斗。

三

杜老不但是一个朴素严谨的学者，而且是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在杜老七十多高龄的一生中，有六十年是在旧社会里度过的。他早年留学日本，接触馬克思主义比較早，在国内北洋軍閥統治时期，他对中国的經濟路綫問題，已經主张要实行科学的社会主义。回国以后，一九二六年他在广州和郭老見面时，就曾高兴地說：“我們是志同道合的，我們是馬克思主义者。”当然，杜老这句话并不是說說就算了，他实际上对馬克思主义是做过不少翻譯介紹工作。同时更重要的是他表現在革命实践上，無論在大革命失敗后国民党白色恐怖統治底下，或在抗战时受到內忧外患交相煎迫期間，他总是能站稳立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进行战斗。因此，杜老最可貴之处，还不在于他懂得馬克思主义的道理，而在于他在实际行动上是一个坚定的馬克思主义者。

杜老从事学术研究，从来都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虽然从他的《文集》看来，研究古代的东西比較多，但他的研究，都能貫徹“古为今用”和“有的放矢”的原則。他曾对侯外庐同志說过：“新理学者玩弄古董走到那里，我不得不跟到他那里，予岂为古典而古典研究哉？予不得已也”。杜老这番話，說明他研究古典为的是要对当前形形式式资产阶级

唯心主义哲学和复古主义进行批判，并不是脱离实际的为研究而研究。

正因为杜老是把学术研究作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他的工作态度是极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凡是读过杜老学术著作的人，都可以看出他这种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作风。他对学术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如对先秦诸子中墨家、公孙龙、荀子以及礼法思想的研究，对中古唯物主义者的探索以至对清初诸大师反理学思想的研究，都是功力极深的著作，其中有不少独创性的见解，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而杜老所以提出这些见解，亦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其中每一个论断都是有着坚实的科学根据，成为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榜样。

杜老逝世，到现在已经五周年了。缅怀杜老的战斗的一生，更激发我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更好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并象杜老一样，把哲学史的批判同现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密切地结合起来，并以此作为我们在哲学史研究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

沒有成功的人物形象就沒有成功的戏

——关于革命现代戏創作怎样組織戏剧冲突的問題

王 琢

沒有成功的人物形象就沒有成功的戏，这是陶鑄同志最近向中南地区的戏剧工作者提出来的一个战斗号召。这个战斗号召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戏剧工作者动員起来，塑造出大量的光輝的英雄人物形象去占領观众的心。陶鑄同志說，这是革命现代戏占領舞台的根本問題，是革命现代戏的灵魂，也是編好演好革命现代戏的关键所在。

怎样才能塑造出无愧于我們时代的工农兵英雄人物形象呢？陶鑄同志說，現在的問題，最重要的还是戏剧工作者必須深入生活，真正和工农兵打成一片，改造自己的思想，培养对工农兵的深厚感情，然后才有可能成功地塑造社会主义英雄人物形象。当然，有了生活，还要解决如何表現生活的問題。所以陶鑄同志在突出強調深入生活的同时，又明确指出，要成功地塑造英雄人物形象，在創作过程中还要解放思想，要大胆地揭示矛盾，展开矛盾和解决矛盾。我认为，陶鑄同志的这个論述，在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最近出現的一些优秀剧目的創作經驗，也十分中肯地指出了一些不受观众欢迎的戏的缺点所在。

这次参加中南区戏剧会演的几出話剧和一批小戏，多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题材的好戏，并且以思想性高、艺术感染力强、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形象高大而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若問以人民内部矛盾为题材的戏，为什么能够塑造出这样光采照人的人物形象呢？他們在艺术处理上有什么經驗呢？那就是陶鑄同志在前面所作的概括：在創作上要善于揭示矛盾，展开矛盾和解决矛盾。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时代工农兵英雄人物，是在生活斗争的海洋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作者敢于让英雄人物在矛盾冲突的海洋中游泳，經受时代的风浪的冲击，才能使他們获得駕馭矛盾的英雄气质，才能构成尖銳的戏剧冲突，賦予英雄人物以崇高的品质和鮮明的个性，才能突出主题思想和高大的人物形象。

我是一个普通的观众，不懂戏，更不懂美学，只是有学习的兴趣。这里談的就是我学习中的一些理解和体会。

揭示矛盾是为了突出鮮明的主题思想

要敢于揭示矛盾，但揭示矛盾本身并不是創作目的。革命现代戏揭示矛盾是为了突出革命的主题思想。如果离开革命的主题思想去揭示矛盾，势必走到斜路上去。所以，討論如何揭示矛盾，首先要明确的是：究竟揭示什么矛盾？剧作者的任务就是以自己的

銳敏的目光，善于从生活中常見的那些矛盾中，捕捉具有时代印記的社会矛盾，深入发掘矛盾的社会內容，加以集中概括，才能突出鮮明的主题思想，而不是随便把生活中的任何矛盾都搬上舞台。

話剧《电閃雷鳴》写的是一般的工业题材，但是，剧作者并没有糾纏在技术問題上面，而是通过雷凱忠同丁强和秦满常之間의思想和性格的矛盾冲突，揭示了一个鮮明的主题思想，提出了一个尖銳的生活課題：工人階級中的老一輩和年青一代，应当以什么态度对待我們的突飞猛进的建設事业？是不断革命，不断前进，还是停止不前，甘于落后呢？是心怀祖国，放眼世界，还是在小家庭的圈子里打轉轉呢？同样，話剧《在险峰》描写的虽然是108号合理化建議实现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但是，最激动人心的还在于：作者通过林彥平的嘴，道出了无产階級的革命志气。她說馬振东的合理化建議，不只是生产上的大問題，也在生活上給我們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課題：在这个叱咤风云的时代，我們應該怎样对待生活，要不要做生活的主宰？这出戏通过老工人馬振东同秦彬、馬志宏之間的矛盾冲突，还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尖銳問題：在社会主义建設中，要不要打破洋框框，要不要發揮創造性？資產階級沒有办成的事情，无产階級敢不敢去办？

話剧《英雄工兵》更是一出充满时代精神的好戏。这出戏写的是拦洪搶險建設水电站的事，但是作者着力描繪的并不是人和自然的斗争，而是以人同自然的斗争为背景，着意突出指导員丁战同副指导員何万里之間的矛盾冲突，并且通过这个矛盾冲突的展开，揭示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主题：在革命战争年代要有无产階級的硬骨头的革命精神，在和平建設时期要不要繼續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們要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传统，在和平建設年代要不要繼續发扬这个革命传统？这出戏正是抓住了这个时代主题，才写出了人民解放軍的伟大本质，塑造了以丁战为首的英雄工兵的群象，歌颂了人民战士的共产主义的英雄气概和豪情壮志。这出戏虽然写的是軍隊的事，实际上它写出了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共产主义精神面貌。

突出正面人物要树立有分量的对立面

在一出戏中，如果没有树立有分量的对立面人物，一則，矛盾发展不下去；再則，英雄人物形象也难于高大起来。树立对立面，是为了衬托正面人物形象，这是主要的。同时，认真刻划对立面人物形象，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的一种方法。我們主要是靠正面人物形象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但是，对立面人物对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也不能忽視。光有正面教育，沒有反面教育，既不能說明社会主义社会的階級斗争的复杂性，同时，也不能引起人民群众的严重警惕。我們党一向重視正面教育的伟大意义，但从来也沒有否认反面教育的作用。《打銅鑼》在湖南农村演出时，群众流传这样的一句話：“莫学林十娘，当心蔡九的銅鑼！”这“莫学林十娘”，就是对立面人物所起的教育作用。

有的人也贊成要树立有分量的对立面，但是，又顾虑把对立面人物写得生动了，会妨碍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这話要看怎么說。如果把对立面人物加强了，而正面人物不

能胜它一筹，甚至正不压邪，当然不行。反过来说，如果把对立面人物写成豆腐一样，不堪一击，那么，正面人物形象也不可能显得高大。看来，根本的问题是要把两方面人物都能写得深刻，演来生动，真正做到棋逢对手，并且要使正面人物在思想上、精神和革命情操上，无不处于绝对的优势，压倒对立面人物。这样，树立有分量的对立面人物，就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了。

怎样使对立面人物为突出正面人物形象服务呢？话剧《在险峰》和《朝阳》给我们作了回答。话剧《在险峰》描写的是技术革命中的一个先进事迹，歌颂了一位提出过一百零七次合理化倡议的老工人马振东。作者为了突出这位技术革命闯将马振东的形象，特意让青年工程师马志宏和退休老工程师秦彬站在他的对面，而他们之间争论的又是一个十九世纪的落后设备生产高级锌的科学技术问题。看来，这个对手是相当有力量的，他们手里掌握了世界上炼锌的书本知识，又有一堆外国资料，又有三十年前试制高级锌失败的所谓“教训”，还有马振东试验遇到挫折的记录。但是，作者始终让正面人物站在矛盾的主导方面，处处显示出马振东这位老工人在思想、风格、智慧、胆识和科学态度等方面，无不压倒对方，衬托出一位伟大的敢于攻克科学技术难关的老工人的高大形象。

话剧《朝阳》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经验。这出戏写的是一件事——兴办半工半读学校，一个矛盾——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矛盾。在这出戏中，林恒是一位高举毛泽东教育思想红旗的勇于实践的人物，又是一员准备用铁头碰钉子的闯将，但是，站在林恒对立面的林原是有分量的人物，何况当初同她站在一起的还有她的丈夫刘克成、女儿刘秀梅和老师方利珍；而且她手里还掌握了学生成绩下降的材料，一些家长提意见的来信，方利珍告的状，等等。《朝阳》的作者就这样大胆地揭开矛盾，让正面人物同有分量的对立面人物展开了一场兵对兵、将对将的戏剧冲突。两位领导干部之间的斗争，两位老师之间的斗争，两种同学之间的斗争，无不把校长林恒推到矛盾的“漩涡”之中，戏剧冲突的浪花无不打在林恒的头上。但是，作者以热情充沛的笔墨，描写了林恒如何团结了同学，争取了刘秀梅，克服种种困难，顶住了一股反对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歪风，终于把半工半读学校办得十分出色。作者就是在这样尖锐的斗争中，在两种教育思想的剧烈斗争中，在两种力量的冲突中，塑造了一员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

人们不难设想，前面谈到的话剧《在险峰》和《朝阳》，如果削弱了马志宏、秦彬和林原、刘克成这些对立面人物，那末，马振东和林恒的形象能不能如此突出？能不能如此感人？我们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有一些戏，就是不敢让英雄人物走进矛盾冲突的“漩涡”，更不敢树立有分量的对立面人物，而是让正面人物超然于矛盾之外，或者充当解决矛盾的仲裁者，英雄人物根本没有什么象样的斗争行动。其实，回避同对立面人物作较量，光是靠漂亮的台词装饰起来的英雄人物，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因而也是不真实的。遇到这样的戏，演员倒挺作难，只好用形体动作去表现“英雄人物”那种空泛的伟大。可是，这样一来，就越发不能表现英雄人物那种寓伟大于平凡的朴素气质了。

要善于在层层展开矛盾中突出英雄人物形象

有一些戏，确实写了矛盾冲突，可就是不敢展开矛盾，更不敢层层展开矛盾，往往一接触矛盾，就用“你打我通”的空泛的政治說教去解决矛盾。一个矛盾解决了，又安上一个情节，再引出一个矛盾，于是，又用同样的方法去解决。这样的戏，常常求助于剧中人互相唱贊歌去抬高英雄人物。这种戏，观众不欢迎。他們說戏里无戏。但是，一些得到观众好評的优秀剧目就不是这样。作者不只是善于揭示矛盾，而且善于层层展开矛盾，让英雄人物生活在矛盾斗争之中，駕馭矛盾的发展，让英雄人物通过自己的斗争树立自己的形象。这里且举話剧《英雄工兵》和小戏《扒瓜园》为例。

話剧《英雄工兵》中丁战的英雄形象，就是在层层展开矛盾中突出起来的。这出戏一开始，工兵連的領導同志和战士們，就为留在营地整訓还是到风浪中去练兵，以及要不要去爭取建設水电站这个任务而議論紛紛。副指導員何万里同副連长邵虎臣，对这件事看法不同，各执己見，爭持不下。指導員丁战把問題交給群众去討論，結果解决了这场爭論。这时，工兵連中三位老战友在思想和性格上的矛盾已經揭开了，并且預示着他們之間更尖銳的冲突即将来临。但是，这三个人物留給观众的印象毕竟还是朦朧的。接着，工兵連开到工地，正逢着百年一遇的洪水。战士們日夜奋战，刚守住了西段围堰，东段围堰又出現了险象。在这个时候，要不要組織力量帮助东段搶險，是决定这个戏敢不敢进一步展开矛盾的重要一环。于是，作者揮动采笔，描写了工兵連在西段人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坚决組織部队前往东段搶險，这就把丁战、邵虎臣同何万里之間的思想冲突和性格冲突突出起来了。同时，也正因为丁战能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敢于頂住何万里的反对意見，一下就把丁战的英雄气概表現出来了。但是，戏剧发展到这个阶段，还远沒有揭示出英雄人物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在这里，如何进一步把矛盾展开，敢不敢写工兵連在同洪水作斗争中遭到失敗，是决定戏剧冲突能不能进入高潮的一个关键問題。在这个問題上，作者有过思想斗争。万川同志說，“前三遍稿中，我們是想写一场失敗，又不敢写”。后来，作者从毛主席的《实践論》中得到启示，才最后下了决心写第三场堵堤失敗。这场戏是全剧的核心，戏剧冲突的高潮能不能向前发展，完全取决于这一场戏；人物形象能不能进一步突出起来，也完全取决于这一场戏。观众看到在堤堰万分危急的时刻，丁战奋不顾身，率領战士們跳下水，筑成一条人堤拦截洪水。这时，丁战的英雄行为已經紧紧扣住了观众的心弦，然而这还不是矛盾的頂点。这一次拦截洪水的斗争失敗了，围堰冲垮了，丁战身負重伤，受人高翔和战士赵明被洪水冲走了。眼看着洪水不断上涨，围堰缺口繼續扩大，何万里和邵虎臣一个要撤，一个要拚，矛盾冲突已經发展到极端尖銳的程度，而且各种矛盾都集中到了丁战的头上。失敗和困难严重地考验着他，然而，就在这个形势万分紧急的时刻，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在观众面前树立起来了。丁战强忍着內心的悲痛，从毛主席的著作中吸取了力量，重新思考堵缺口的方策，特別值得贊許的是，正在这个矛盾即将解决的前夕，又展开了一个新的矛盾——“夺任

务”，并且由此引出了第四场戏——举行晚会。真是波涛滚滚，奇峰迭起。这个晚会，开的生动活泼，是连史的回忆，又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对比。思想性强，针对性强。这段戏对展开矛盾不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还挖掘出解决矛盾的积极因素，堪称绝妙之作。在这里，人们看到随着戏剧冲突的层层展开，工兵连找到了制服洪水的思想力量，而且在战胜洪水的同时，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以丁战为代表的工兵连英雄群象，就象高山一样屹立在观众的面前，它有力地弹动着观众的心弦。

层层展开矛盾，才能突出英雄人物形象，这一条创作经验适用于大型革命现代戏，也适用于小型革命现代戏。河南越调《扒瓜园》就是这样层层展开矛盾的一出动人的小戏。热爱集体的贫农宋老发为生产队种的瓜田，暴雨渍水，要扒开自家的自留地才能保住这块瓜田。这件事，他的老伴宋大妈不赞成。宋老发批评老伴眼光短浅，只看到自留地上那点儿芝麻，看不到集体种的大片西瓜。老两口子正在争得难分难解的当儿，女儿宋国英(妇女队长)出来帮助爸爸说服了妈妈。看来，这一场戏剧冲突已经解决了。可是作者并没有就此收笔，他以奇峰突起之势，挥笔而上，写出宋国英要宋老发同意扒开集体的瓜园，让邻队排水，抢救大片庄稼。宋老发眼看着这片集体的瓜，长的可爱，扒去实在心疼，他的思想一下子转不过来，但他有热爱集体的思想基础，终于在女儿的帮助和老伴的反激之下，心胸豁然开朗，亲手扒开了瓜园。在这里，作者只用了疏疏几笔，就把一个普通农民的思想一下提高到共产主义的崇高境界，演来感人，真实可信。可见，戏剧创作的构思，贵在敢于层层展开矛盾，突出人物形象，开拓更加广阔更加深远的思想境界。唐人王之涣的名诗《登鹳雀楼》写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两句，大自然的壮丽景色，可谓尽览无遗了。然而诗人并未以此为足，继而挥笔直书，猛然间写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前后映照，相得益彰。此时诗人才真正进入了一个更加宽广的境界。这首诗的艺术构思，颇值得戏剧创作借鉴。

层层展开矛盾会不会把对立面人物推远了？

层层展开矛盾会不会把对立面人物推远了，以致矛盾不好解决呢？不少人有这个顾虑。其实，任何矛盾本身都包含着解决矛盾的因素，但是，这种因素只有在矛盾充分展开的过程中才会成熟起来。从这个意义来说，只有充分展开矛盾，才能为更好地解决矛盾创造条件。有些戏之所以矛盾解决得不那么理想，只好借助于剧中人的滔滔不绝的议论来解决矛盾，原因之一，就是不敢放手层层展开矛盾，没有从矛盾发展中挖掘解决矛盾的因素，因而事件本身的发展还不足以打动对立面人物的心。

层层展开矛盾才有利于解决矛盾，话剧《电闪雷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出戏中雷凯忠同丁强之间的矛盾冲突发展到丁强避着雷凯忠偷偷搬家，可算是相当尖锐了。但当雷凯忠痛说解放前因偷学技术而受到美国工程师毒打的这段遭遇，丁强听了深受感动，决定不搬家了，秦满常也不再阻挠雷凯忠准备补考的事了。到此，戏剧冲突似乎也可以解决了。有一些戏就是这样处理的。一旦矛盾展开得差不多了，就让剧中人叙一段

家史，或者讲一遍革命道理，于是一切矛盾迎刃而解。可是《电閃雷鸣》的作者却不捡这个方便，他们为了突出英雄人物更高的思想境界，也是为解决矛盾创造更深厚的基础，作者决定让矛盾冲突进一步展开。于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戏出现了。在补考前夕，一个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之夜，雷凯忠悄悄地来到了锅炉车间。这是新机组接受严峻考验的时刻，也是两种思想大搏斗的时刻。事情是这样，当丁强突然发现锅炉严重缺水迹象而慌张地发出紧急停炉的命令的时候，雷凯忠抢上一步，挡住丁强。他说：“班……长，我请求再校一次水！”丁强颤抖地说，“严重缺水就要停炉，这有明文规定，师傅，您不能……。”雷凯忠严肃而恳切地说，“我不能看着你犯罪，丁强，我敢保证，现在不是严重缺水。”丁强反驳说，“保证！一百个保证也解决不了问题，你阻挡执行任务，你要负责呀！”雷凯忠断然回答说，“不，我要求重新校水，我负责！”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雷凯忠爬上锅炉校水，查明是轻微缺水，决定机组继续运行。正是由于雷凯忠的这种果敢行动，才避免了一场停电事故。当这场惊心动魄的事件刚刚过去，雷凯忠若无其事地拿起拖把在那里擦起地板。伟大出于平凡，观众从这个平凡的动作中看到了一位光芒四射的老工人的英雄形象。

话剧《电閃雷鸣》这样大胆展开矛盾，不但没有把对立面人物推远了，正好相反，它把对立面人物突然拉近了。丁强在这个时候动心了，思想上开始出现一个突然的变化——对他爱人说：“嗯，我在想一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戏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作者继续把矛盾向前发展。当马小荣向总工程师提出建议，雷师傅的补考该取消了。雷凯忠回答说，“不，处理一次事故，还不能证明我全部都及格。再说，这是制度，谁也不能特殊化。”补考没有取消，这就引出第五幕戏。这是作者的精心之作，由补考这场戏把主人公的形象烘托得更高大了，主题思想也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而矛盾的解决也才到了瓜熟蒂落的火候。第五幕描写雷凯忠补考结果是：理论成绩——优秀，现场考试——优秀，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还是他在生活的考验中，在革命意志的考验中，得的也是优秀！正是这三个“优秀”，象一把锐利的钢刀一样，刺痛着丁强的心。丁强悔悟地说，“师傅，真正考试不及格的不是你，是我；在生活的考验中，我交了白卷。”当丁强祝贺雷师傅，并将班长的职务移交他师傅的时候，雷凯忠却建议把丁强提升为正式班长，而自己仍然跟班劳动，并对丁强说，“大胆领导吧！”而秦满常在雷凯忠的英雄行为和崇高思想的感召之下也翻然悔悟，他对党委书记说，“对，老方，调我回锅炉房吧！我要向这老家伙学，从头干起！”

要展开矛盾，还要正确解决矛盾，推动对立面人物转变

革命现代戏要揭示矛盾，展开矛盾，目的是为了经过批评或者斗争，正确地解决矛盾，加强人民的团结，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热情。革命现代戏同资产阶级的一些社会问题戏剧根本不同，他们只是从现象上反映一些矛盾，根本没有勇气去展开矛盾，因而也谈不上正确地解决矛盾。其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来，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

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革命现代戏之所以敢于揭示矛盾，又敢于展开矛盾，最后又能够正确地解决矛盾，从根本上说来，那是因为“它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有一种主张说，文艺创作“只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让观众自己去判断”。这反映了资产阶级回避斗争和害怕革命的精神状态，为革命现代戏所不取。

戏剧中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一般说来，不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而是透过人与自然的矛盾而揭示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以《英雄工兵》这出戏来说，它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以丁战为代表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同何万里的右倾保守思想之间的矛盾。这出戏的精湛的艺术构思，就在于作者通过人同自然的矛盾，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两种思想的矛盾；而在解决人同自然的矛盾的过程中，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并且推动了对立面人物的转变，把有缺点的人物争取过来。这出戏感人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豫剧《杏花营》的主题思想是很高的，作者是想通过这出戏给老灾区人民送去精神“食粮”——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这出戏描写了以生产队长郑大荣为首的革命群众，高举自力更生的革命旗帜，战胜了特大的自然灾害，获得了较好的收成。这样，作为人同自然的矛盾是解决了。但是，以生产队长郑大荣为代表的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思想同以生产队副队长孙景泰为代表的害怕困难的落后思想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在解决人同自然的矛盾过程中得到真实可信的解决。尽管这出戏的上半场，非常感人，赢得不少观众的激动的泪花，可是从下半场开始直到剧终，并没有在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过程中，紧紧抓住解决人与人之间两种思想的矛盾这根主线，因而使这出戏的下半场显得缺乏感人的思想力量。湘剧《山花颂》的主题思想也是很好的，作者试图通过进洞探水这个人同自然的一场斗争，塑造三代贫农舍己为公的崇高风格。但是，这出戏没有树立有分量的对立面，只是突出人同自然的矛盾，而没有突出人与人之间的两种思想、两种风格的矛盾。结果，探水的问题是解决了，而两种思想、两种风格的矛盾究竟是怎样解决的呢？给观众的印象不那么清楚。尽管这出戏的演员很努力，但是，艺术效果还是不够理想。

戏剧中具体事件的矛盾毕竟是比较好解决的，问题在于：在解决具体事件的矛盾的过程中如何解决正面人物同对立面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说的所谓揭示矛盾、展开矛盾和解决矛盾，是就人民内部矛盾为题材的戏来说的。这里有个处理矛盾的方法问题。毛主席说，对于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对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压服的方法去处理；对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去处理。这里说的是政治生活中处理两类矛盾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就是对敌人要暴露，要打击；对人民要歌颂，要鼓舞，对人民身上的缺点错误，也要给以适当的批评教育。在这里，矛盾的性质决定处理矛盾的方法。但是，如果处理矛盾方法搞错了，会不会影响矛盾的性质呢？譬如在戏剧中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或者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敌我矛盾，那么，不管你嘴上怎么

說，它給观众留下的印象，只能是兩類矛盾性質的混淆。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毛主席為我們概括了一個公式：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個公式每日每時地被人們應用於實際生活。戲劇反映生活，當然要在舞台上反映人們正確運用這個公式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當前問題的焦點是在藝術上如何表現它。在這方面，資產階級和封建文藝都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可以借鑒的東西，完全靠我們自己獨創和積累經驗。值得高興的是，我們的許多以人民內部矛盾為題材的優秀劇目，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

要以正面人物的先進思想去征服對立面人物的內心世界

革命現代戲要正確運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公式，有許多問題要研究，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推動對立面人物轉變的問題。如果對立面人物沒有轉變過來，那麼，矛盾還是矛盾，就不可能獲得新的基礎，因而也就談不到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那末，怎樣推動對立面人物的轉變呢？前面已經談到，首先要充分展開矛盾，從而獲取解決矛盾的條件。同時，還要經過批評或者鬥爭，才能推動對立面人物的轉變。

當然，這裡是指開展正確的批評或者鬥爭說的。如果不是正確的批評或者鬥爭，就不能解決矛盾，甚至會適得其反，加深或者擴大矛盾。“在這裡，首先需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因為如果在主觀上沒有團結的願望，一鬥勢必把事情鬥亂，不可收拾”。現在的問題是，在藝術上如何體現出正面人物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呢？當然，不是靠正面人物抽象的說教，而是重在正面人物的身教，重在以形象性的英雄行動，去擊中對立面人物的思想深處，感動對立面人物，征服對立面人物的內心世界。這實際上也就是感動觀眾，征服觀眾的內心世界的問題。戲劇作為教育武器，它的巨大的威力也就在這裡。

話劇《英雄工兵》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最具特色。指導員丁戰不僅以自己的英雄行動去影響和說服何萬里，而且还以充滿了強烈的戰鬥友誼和濃郁的階級感情去幫助何萬里。思想認識上的分歧，引起了他們之間的一系列的原則鬥爭。但是，原則的鬥爭並沒有沖淡他們之間的深厚友情。你看，丁戰、邵虎臣和何萬里，他們“三個老疙瘩”回憶起在朝鮮的一段戰鬥經歷，是那樣心心相印，神采飛揚。他們各自檢討了自己的缺點。當丁戰又聽到何萬里愉快的歌聲，高興地說：“能聽到我們班副唱歌，真比餓了三天吃頓餃子還要香啊！”主人公丁戰的這種革命情懷和階級友情，感動了何萬里，也感動了觀眾。這種情景之所以同原則上的鬥爭十分協調，就是因為主人公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的結果。

要用自己的先進行為去感動對立面，才能有力地體現正面人物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這一條適用於大戲，也適用於小戲。廣東漢劇《一袋麥種》，寫到春梅為他父親祝壽的一袋麥種被他的愛人志洪偷換成一袋白米，叫她在父親面前當場出“丑”，春梅對此抱着一肚子的干火，準備回去同志洪大吵一場。正在春梅的火氣剛發作的當兒，她的父親興伯替隊里送麥種來了，支援春梅這個生產隊。春梅在父親的模範行動的感動下，檢討了自

已，解决了矛盾，所以她与志洪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当然，正面人物的崇高的革命情操和英雄行为不一定都能有力地推动矛盾的解决。这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的放矢，才能收到效果。《电闪雷鸣》中的雷凯忠的革命情操就处处刺着丁强和秦满常的痛处。雷凯忠年过五十，记忆力在衰退了，但他的革命意志不衰退，他坚持学习，掌握新技术，这就刺痛了丁强的骄傲自满和秦满常革命意志衰退的痛处；雷凯忠一心想革命，想着党的事业，这就刺痛着丁强的一心想着小家庭和秦满常一心想着退休的痛处；雷凯忠的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革命勇气和过硬的技术本领，也刺痛着丁强的那种胆小怕事、惊慌失措和技术不过硬的痛处。但是，有的戏就不是这样。剧中英雄人物的崇高的革命情操和英雄行为，并没有处处击中对立面人物的思想痛处，因而不能推动对立面人物的转变。

正确解决矛盾要经过批评或者斗争

正确解决矛盾要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但是，在戏剧中如何根据不同矛盾和矛盾发展的激化程度，掌握适当的批评或者斗争的分寸，这也是一个关系到推动对立面人物转变的大问题。对于对立面人物的缺点错误，必须开展批评或者斗争。但是，大题小作不行，小题大作也不行。大题小作了，火候未到，矛盾解决不了；小题大作了，火候过了，一斗就斗翻了，既不符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精神，也不能达到解决矛盾的目的。

实际生活中，人民内部矛盾总是千差万别的。且不说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有着根本的区别，就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是千差万别的，即使是同样的矛盾，也还有在具体环境中所表现的激化程度不同，批评或者斗争的分寸也不能千篇一律。何况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有些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到了敌我矛盾的边缘，有些又是两类矛盾交错在一起的，更不能用一个框框去硬套。

这次中南区戏剧会演中表现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戏有四个，都是描写如何经过斗争使贫下中农同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的。其中，《万山红》对于抵抗合作化的富裕中农处理得比较好，斗争的分寸比较适当。首先，作者着力刻画了王阿犀这个“力求把自己变为新富农”的富裕中农面貌，揭露他搞投机活动和逼债买地的行为，突出他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而在解决矛盾的时候，既有群众斗争的场面，又通过新旧两本账的强烈对比，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比过去，分析前途，明之以大义，晓之以利害。在真理面前，王阿犀哑口无言，只好低头认错。在解决矛盾中，王阿犀交出了受典山地的文书，写了入社申请书，但没有在红榜上写上名字。这就象征性地表明，贫下中农同富裕中农的斗争并未结束，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未最后解决。这种解决矛盾留有余地的作法，寓意深远，戏外有戏，发人深思。

豫剧《人欢马叫》和花鼓戏《烘房飘香》都是描写公社化以后的贫下中农同具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之间的斗争的好戏。看来，《烘房飘香》对富裕中农宋乔贵的斗争恰到好处，而《人欢马叫》则显得斗争不够有力。

《烘房飘香》里的富裕中农宋乔贵凭他一手烘茶好技术，作为同集体相抗衡的“资本”，争夺领导权，沾集体的“便宜”。贫农女青年组长林里香坚决同他作斗争，他就装病怠工，消极抵抗。当林里香烘出他自己也烘不出的好茶时，他硬说是一级次品，而当支部书记把一小包这种茶当成茶叶收购站的一级茶样品给他看时，他就大吹大擂，简直捧上天。后来一听说不是样品，他又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说话不算数。这样，用他自己的嘴巴嘲弄了他同社会主义道路相抗衡的愚蠢。这样的斗争是深刻而有力的，而又没有超出把他作为团结对象的劳动人民的界限。

豫剧《人欢马叫》对刘自得这样的人，斗争就不够有力，没有深刻批判他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特别是对徐富贵这样的投机倒把分子，未经任何斗争只是“搭税罚了款，收了牌照”，“就回到队里老老实实当社员啦。”这样的处理，显然是冲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程度。而且，不经过适当的斗争就达到新的团结，矛盾的解决也是不可信的。

批评要掌握分寸又要讲究适当的方式

工农兵内部的矛盾是多种多样而又千差万别的，大量的矛盾要经过批评求得解决。在使用批评的方法的时候，还要讲究恰如其分的批评分寸，过了不好，不够也不成。有的矛盾，象话剧《朝阳》中林恒同林原的矛盾，象《打铜锣》中蔡九同林十娘的矛盾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但是，这两个矛盾的激化程度不同。对林原的批评，只能是说理的，用事实去纠正她的错误思想；而对林十娘的批判就要采取比较尖锐一些的形式，用讽刺和嘲弄的手法去揭露她的资本主义的自私观念。不如此，就不可能把她改造过来。在工农兵内部还有两种方法、两种作风以及对待某种问题上左一点和右一点的矛盾，等等。象京剧《豹子湾战斗》中的杨虹同丁勇就完全是认识上的矛盾。正如杨虹向丁勇指出的那样：“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该经常使自己的思想适合于当前现实斗争环境。”而丁勇同高大力之间的矛盾，也是以火热的革命激情为基础的认识上的矛盾。在这出戏里，根本不存在落后人物的问题，都是先进的英雄人物，而他们之间的戏剧冲突则属于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而引起的。对于这种矛盾，只有经过耐心的说服和实践去解决，绝不允许乱斗一通。

批评还要讲究适当的方式。当然，采取什么批评方式，本身也是一种分寸，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寸。对于剧中的对立面人物来说，正剧和喜剧就是两种不同的批评方式。象《双教子》和《三朵小红花》这样涉及到孩子做错事的戏，只能采取正面的严肃的态度，不能采取嘲笑和讽刺的手法。当然，《三朵小红花》中有讽刺的手法，但那是对着小图的舅舅那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而不是对着孩子。象《英雄工兵》和《电闪雷鸣》中的对立面人物何万里和丁强这样的人，也只能用热情而又十分严肃的正面批评，不容许采取喜剧中的讽刺手法。当然，这不是说，表现人民内部矛盾不可以用喜剧形式。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时代，落后的思想意识，一经公之于众，人们就觉得可笑，而对于沾染了这种旧思想的劳动人民，给以一种轻松诙谐的批评，往往比那种尖锐的严肃的批评更

有力量。花鼓戏《补锅》和汉剧《借牛》，就是两出深得观众喜爱的社会主义新喜剧。但是，运用讽刺和嘲笑的喜剧手法，必须从特定的人物关系出发，不能从抓哏逗笑出发。在电影《李双双》中有许多寓意深刻的喜剧手法，逗笑中包含着严肃的深刻的思想批评。但是，在豫剧《杏花营》中，有些喜剧手法使用的效果并不好。《杏花营》描写劳动人民遇到严重自然灾害而“逃荒”的时候，仍然用旧社会闖江湖的要猴形式，戏倒热闹，就是使人看了很不自然，容易使人联想起旧时代凤阳花鼓那种流浪异乡的灾民生活的情景。在以生产队副队长孙景泰为首的一批老少人等外出之前，有一段教唱学唱的戏，作者以嘲弄的态度对待他们，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还有保管员百顺（贫农）装病不出工这个情节，在观众的心目中，总觉得郑大荣是明知百顺装病，而故意嘲弄他一番，让他当众出洋相。这样，郑大荣的精神境界反而显得低了。尽管这出戏有不足之处，但由于豫剧三团的同志，有一身演革命现代戏的过硬工夫，特别是饰演郑大荣的马琳同志，唱做俱工，演来自然得法，为这出戏增色不少。从演出效果来看，《杏花营》仍然不失为一出有分量的好戏。

要写出对立面人物本身的矛盾和斗争

写好对立面人物的转变，重要的还在于写好对立面人物本身。对立面人物有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缺点错误，但是，他们并没有失掉劳动人民基本的品质。这就是说，对立面人物本身就存在着正确同错误、先进同落后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所引起的斗争，才是推动对立面人物转变的内因。前面谈到的批评或者斗争，对于对立面人物来说，毕竟还是外因。外因是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是不能推动对立面人物的自我斗争的。但外部条件只有在推动对立面人物的自我斗争才能发生作用；并且只有把外因同内因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矛盾的转化——对立面人物的转变。

目前，有一批优秀剧目在写好对立面人物转变方面，创造了很好的经验。话剧《电闪雷鸣》就是善于写对立面本身的矛盾，并且善于把正面人物和对立面人物之间的斗争同对立面人物的自我斗争结合起来。《电闪雷鸣》的戏剧冲突是相当尖锐的，而且是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这出戏选择丁强作为对立面人物，只是把他写成一个本质好、错误思想初露头的青年工人。丁强既是本质好的青年工人，又是错误思想初露头的青年工人，这就是丁强自身存在着的一个矛盾。正是这个矛盾决定了丁强在雷凯忠的先进思想强烈影响下引起了剧烈的自我思想斗争，终于在雷师傅的感动下而觉醒过来。在这方面，湖南花鼓戏《补锅》也有很好的经验。刘大娘挑女婿同女儿兰英选对象的问题上的冲突是尖锐的，他们各自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刘大娘这个对立面人物是热爱劳动、热爱集体的养猪能手。自己爱劳动而又看不起补锅这种劳动，这就构成了刘大娘思想上的矛盾。正因为刘大娘身上有这样的矛盾，所以她的思想问题，就象薄薄的一张纸，一舐就通了。

既要写出尖锐的戏剧冲突又不能丑化对立面人物

有人说，写好对立面人物是个难题。这话有道理。《英雄工兵》的作者万川同志说，对立面人物写得好坏同样关系到作品的思想威力。他在几遍稿的修改过程中，费力最大的还是何万里这个人物。为什么对立面人物这样难写呢？话剧《电闪雷鸣》的作者胡书鏐同志讲的很好。他说，我们觉得既要写人民内部矛盾，又要写得有尖锐的冲突，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而这个矛盾又集中在如何写好对立面人物的问题上。因为要构成尖锐的戏剧冲突，就要树立有分量的对立面。但是，怎样树立起有分量的对立面人物呢？是不是一定要把对立面人物写的一无是处，甚至尽干坏事，才能构成尖锐的戏剧冲突呢？胡书鏐同志认为不能这样看。他说，戏剧冲突是否尖锐，这要从特定的人物关系出发，不能笼统地抽象地谈论这个问题。他在写《电闪雷鸣》的过程中，当初，就有同志认为丁强这个对立面人物，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能形成尖锐的戏剧冲突。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说，话剧《年青的一代》中的对立面人物林育生，搞了假证明，逃避艰苦；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中的对立面人物丁少纯，打野鸭子卖，并且因此造成了事故。而丁强做了些什么呢？不就是涮涮奶瓶，推推摇窝，擦擦自行车嘛！胡书鏐同志没有采纳这种意见。他认为，在艺术作品里，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落后要同特定的人物关系联系起来看。丁强这个人物如果同地主资本家放在一起比较，肯定是先进的青年工人；但是，当他同雷凯忠这样不断革命、勇往直前的老工人一比，先进同落后之间的差距就很大，这就构成了尖锐的戏剧冲突。

我觉得《电闪雷鸣》的经验很重要，它告诉我们写人民内部矛盾，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写出尖锐的戏剧冲突，但是，什么样的人民内部矛盾才能构成尖锐的戏剧冲突，这决定于特定的人物关系。只要找出两个对立的人物的针锋相对的思想冲突以及由此必然引起的行动上的冲突，那末就能构成尖锐的戏剧冲突。如果对立的双方又是各自能坚持自己的东西，这样撞击在一起，就能构成尖锐的戏剧冲突；而各方愈以为自己是正确的，愈是坚持自己的东西，那末，由此构成的戏剧冲突就愈是尖锐。如果离开特定的人物关系，抽象地追求尖锐的戏剧冲突，让对立面人物什么坏事都干，势必就容易把对立面人物写过“线”，结果也不一定就能突出正面人物形象。

要写出尖锐的戏剧冲突，又不丑化对立面人物，话剧《英雄工兵》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英雄工兵》的作者万川同志，他写何万里是煞费心思的。究竟是把何万里写成个人主义恶性发展，贪恋小家庭生活，厌倦部队，斗志衰退，还是写成因背上了怕犯错误的包袱，摇摆观望，斗志不旺，处于犯错误的边缘好呢？作者肯定了后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且也足以构成尖锐的戏剧冲突。何万里自信是接受了过去事故的“教训”，自己有了“经验”，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这样就构成他同丁战、邵虎臣之间的尖锐的戏剧冲突。如果把何万里写成个人主义的恶性发展，那末，在非常无产阶级化的人民解放军中，别人就不理他这一套，因此反而不能形成有分量的对立面。既

然不能形成有分量的对立面，也就谈不上构成什么尖锐的戏剧冲突了。

敢于突破旧戏的陈套，应当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我們說沒有矛盾冲突就沒有戏，我們主張在創作上要解放思想，打破形而上学的束縛，要以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鬥爭為綱，揭示矛盾、展開矛盾和解決矛盾，反對把矛盾磨得平平的，甚至掩蓋矛盾，回避鬥爭，其目的是為了塑造丰满的英雄人物形象，突出鮮明的主題思想，充分發揮戏剧這個教育武器的感人的威力。但是，我們不能贊成搬用旧戏中的“反面人物”的陈套，用之于对立面人物身上。我們不能贊成在外形上丑化对立面人物，也不能贊成對於对立面人物的思想批判不讲究分寸和方式。我們說，在写工农兵个别人物的缺点錯誤的時候，只要能写出他們作為劳动人民的基本品质是主导一面，可以写他們身上的一般性质的錯誤，也可以写他們因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响和腐蝕，在某一件事上自觉地犯了品质上或者立場上的錯誤。这是从特定环境和特定人物关系的需要說的。象前面提到的《万山紅》中的王阿犀，《人欢馬叫》中的刘自得和徐富貴，《游乡》中的姚三元，甚至象《打銅鑼》中的林十娘，他們都是劳动人民，他們所犯的錯誤属于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质，但是，根据特定环境和人物关系，作者把他們写成自觉的犯了品质上的或者立場上的錯誤，观众和評論界就能通过。如果着墨过輕，批判无力，观众和評論界未必能通过。但是，我們反对离开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人物关系，把所有戏中的对立面人物都写到这个程度。人們不能設想，如果把《万山紅》中对王阿犀和《游乡》中对姚三元的写法，用到《英雄工兵》中的何万里头上，或者用到《电閃雷鸣》中的丁强身上，观众和評論界肯定是通不过的。因为，这样的描写不符合这两出戏的特定环境和特定的人物关系，因而就会发生过“綫”的問題。

我們反对不敢写人民內部矛盾的傾向；同时，我們也反对那种从資產階級的戏剧公式出发，在表現人民內部矛盾的戏中，片面追求所謂尖锐的戏剧冲突，片面追求所謂传奇色彩，不适当地夸大对立面人物的缺点錯誤。同时，我們主張，革命現代戏应当把表現人民内部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特別是要把兩條道路和两种思想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在劳动人民和干部身上的反映，放在最主要的地位。但是，我們也不排斥其他方面的矛盾，包括一些先进人物中間，因對於某件事、某个問題的認識分歧和所持态度的不同所形成的矛盾。这种矛盾同样可以构成紧张热烈而风趣横生的戏剧冲突。总之，在戏剧創作上，要进一步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深入生活，学习工农兵，写好工农兵，坚持政治同艺术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統一，大胆突破旧戏的陈套和資產階級的戏剧公式，發揮自己的創造性，总结我們自己的經驗，应当有所突破，有所創造，有所前进。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附記：本文提到的一些戏，在中南区戏剧会演之后，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有的还在修改中。我在修改此文时，只看到几个小戏的改本。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仍按会演时的演出本，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谈写人民内部矛盾和“暴露文学”的区别

萧 学 鹏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日益需要，文艺作品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已越来越多，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中南区戏剧会演的剧目，绝大部分是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这些戏剧对于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促进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是有作用的。

社会主义文艺在反映和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当然要充分揭露矛盾，生动地、真实地描绘矛盾的各个方面，才能塑造出各种人物形象，发挥文艺的教育作用。就是说，社会主义文艺在歌颂社会主义、歌颂英雄人物的同时，也要描写其对立面，要描写人民内部某些人物的缺点和错误。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和“暴露文学”有什么区别呢？它们中间有什么界限呢？以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名，而在实际上贩卖资产阶级的“暴露文学”，这种情况过去有，将来也还可能出现，这是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和批判的。但是，如果把一些正确的，或者在基本倾向上是正确的反映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误看作为“暴露文学”，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

我们认为，区别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和“暴露文学”，首先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正确分析作品所反映的矛盾性质，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以不同的态度去对待，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原则上规定了区别社会主义文艺和资产阶级“暴露文学”的界限。对于敌人，我们的文艺作品应当充分暴露其丑恶的面目和阶级本质，唤起人民打而倒之，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之一，自然不是“暴露文学”。对于人民大众的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克服，我们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3页。

的文艺作品反映这个批評与自我批評的过程，以教育人民提高人民，促进人民内部的团结，这也是社会主义文艺最重要任务之一，自然也不是“暴露文学”。相反地，文艺作品如果混淆了两类矛盾的性质，对于人民身上的缺点和錯誤，采取对付敌人的方法进行嘲笑和攻击，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說話，这样就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①这样的文艺作品，不管作者的动机如何，其效果和资产阶级的“暴露文学”并没有两样，只能称之为“暴露文学”。

有些同志一般地承认社会主义文艺可以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問題，一般地也同意上述区别社会主义文艺和“暴露文学”的原则。但是在評論具体文艺作品的时候，他們又主观地定出了一些框框条条，例如說，对于劳动人民，只能写一般性的錯誤，不能写品质上的錯誤；只能写思想認識上的錯誤，不能写立场上的錯誤；只能写他不自觉地犯錯誤，不能写他自觉地犯錯誤，等等。否則，便是暴露人民。我們认为，这些看法是不对的。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尚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誰战胜誰”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阶级斗争是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部和劳动人民内部来的。资产阶级总是要在党内找寻它的代理人，梦想使党变色。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总是要利用劳动人民身上的某些弱点，进行复辟活动。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这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既然可能有人完全变质、做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and 俘虏，怎么能設想没有人在某一問題、某一事件上自觉或不自觉地犯带有立场性质的錯誤，怎能保証没有人在品质上不受腐蝕呢？比如，有人在某个时候或某个問題上，做了四类分子的附和者，或受了他們的礼物，同情了他們，这总該算是立场的动摇吧？又比如，《打銅鑼》中的林十娘，損公利私，《千万不要忘記》中的丁少純，行为不那么老实，这些总該算是品质上的問題吧？再如丁少純在其岳母的慫恿下所干的一系列損害集体利益的行动，他自己也是明知不对的，这总該算是自觉地犯錯誤吧？上列犯了錯誤的人物，如果不向坏的方面繼續发展，都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但是，《打銅鑼》和《千万不要忘記》是公认的富有教育意义的好戏，看了这两出戏之后，并没有使观众有暴露人民的感觉。可見，文艺作品要正确地反映人民内部的矛盾，正确地描写人民内部的批評与自我批評，并无必要給作者定出一套什么可以写，什么不能写的限制，重要的是不能混淆两类矛盾的性质，要有正确的立场和态度。

二

文艺不等于生活本身。文艺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必須通过概括化、典型化的过程。生活中存在的東西，自然不能全部搬上舞台，写入作品。那末，我們社会中的矛盾，应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4頁。

如何提炼为艺术的冲突，如何才能真实地反映生活，而不墮入“暴露黑暗”的泥潭呢？

文艺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我們所謂艺术的真实，丝毫也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政治的要求。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为了鼓舞人民前进。如果离开了这个前提，为揭露而揭露，就会掉入“暴露人民”的泥坑中去。“写中間人物論”的提倡者认为只要“提出问题”，不必解决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个主张，某些作家不是早已实行了嗎？他們把一大堆“落后现象”罗列起来，加以夸张，使人民对现实丧失信心。这样的“真实”，不是无产阶级要求的真实，而是资产阶级眼中的“真实”。他們看不見也不愿看社会主义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他們不能理解社会新的变化，只看到一大堆消极落后的现象。

然而，也不能认为凡是落后现象都不能反映。问题是在于揭露矛盾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毛泽东同志說：“人民也有缺点的。……我們應該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帮助他們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錯誤作斗争，使他們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們在斗争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艺應該描写他們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錯誤的人，我們就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敌視他們。我們所写的东西，應該是使他們团结，使他們进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①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說得很清楚，我們的文艺描写人民在斗争中改造的过程，目的是为了帮助人民“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与“暴露文学”不同，社会主义文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对人民的缺点，必須有一分为二的基本观点。既然是人民的缺点和錯誤，就不是敌我問題，本质上是一个是非問題。这就要分清是非，具体地分析这些缺点和錯誤，揭发这些問題，不是否定整个人，更不是怀疑他們转变的可能性。我們看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有各种矛盾，并不是怀疑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及其朝革命方向的轉化，正是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假如不是这样，即使把矛盾写得不那么尖锐，也不一定就不是“暴露文学”，如《賴大嫂》，作品所写的問題也不是很严重的，然而作者却夸大了賴大嫂的作用，让她肆无忌惮，直来直往，矛盾是暴露了，但毫无解决办法。把现实中落后现象写得象可以为所欲为，这种作品仍然是对现实的歪曲。这样說，并不否认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轉化为敌我矛盾的可能性，也不排除作家描写这种轉化的可能性，但是矛盾的性质既然起了变化，那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而是敌我矛盾的問題了。

可以看出，揭露矛盾和“暴露黑暗”的不同，不仅在于作家如何揭示矛盾，而且也在于如何处理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敌对力量，暴露是为了打倒，因而即使不写出矛盾的轉化，也有着巨大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所以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所暴露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頁。

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十九世纪中叶，无产阶级革命未成熟的时候，恩格斯这样说过：“如果它能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打破对于这些关系的性质的传统的幻想，粉碎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对于现存秩序的永久性的怀疑，那末，纵然作者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解决，甚至没有显明地站在哪一边，这部小说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①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社会主义社会是我们需要保卫，需要促进其发展的，它是和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两种制度，如果文艺作品仅仅一般地揭露矛盾，不反映革命发展的趋势或矛盾的革命转化，就会使人们看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看不清前途。这种作品非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而且会起相反的作用。如果把小戏《打铜锣》中蔡九与林十娘的斗争写成半斤对八两，那人们就不能不怀疑：林十娘为什么能够如此横行无忌呢？为什么蔡九始终斗不过她呢？党的力量在哪里呢？象林十娘这样的人能不能把她改造过来呢？剧本并不是这样处理的。它开始时还写蔡九被林十娘抓住弱点，处在下风，但后来在党的帮助和支持下，他战胜了，林十娘在改造的道路中也迈进一步了。林十娘失败了，林十娘又是胜利了，失败的是她的落后思想，胜利的是集体主义精神。

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后者产生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不能解决的，只有推翻这个制度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我们的文艺作品只有充分地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优越性，反映出各种矛盾的斗争和不断解决，反映出它如何推进了历史的发展，才能很好地起到文艺应有的作用。

三

文艺对现实生活的概括化、典型化过程是通过人物形象来进行的。作家只有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②，才能起鼓舞人民前进的作用。文学作品的揭露矛盾，是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它也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

揭露矛盾与“暴露文学”不同，一般说来，“暴露文学”的矛头在于暴露社会制度，它塑造人物主要为了否定现实。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则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它着重于塑造社会主义社会的英雄形象。揭露矛盾，批评落后现象，目的也是为了歌颂新生事物的成长、革命力量的胜利。因而，写反面也是为了写正面，揭露为了歌颂。事物总是要比较的，英雄总是在战胜困难中成长，“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③在“无冲突论”指导下的文艺作品，产生

① 《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3页。

③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3页。

不出真正的英雄形象。

許多同志都贊成要寫英雄形象，但談到為了襯托英雄形象而寫落后的典型，問題就來了。他們認為，寫人物要寫本質，如果寫了某個貧農封建保守、受地主欺騙，那就不是典型的東西，因為貧農應該是敵我界綫分明，大公無私的人民公社社員。這樣一來，問題就很簡單了，寫黨員、工人、貧農、戰士，只能寫進步的典型。

文藝創作的實踐已經否定了這種片面的觀點。《千萬不要忘記》中的工人丁少純，《霓虹燈下的哨兵》中的陳喜，《紅色工兵》中的何萬里，《電閃雷鳴》中的老工人秦滿常，……難道這些人物都不是典型？文藝總是從生活出發的，典型的概括如果離開了豐富的生活而去抽象理解其本質，那怎麼會有藝術形象呢。

文藝要不要反映人物的階級本質呢？要的。但我們不能作狹隘的理解，誤認為寫了勞動人民的缺點和錯誤就違背了描寫他們的本質的目的。即使無產階級吧，也是要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改造自己的。馬克思、恩格斯說：“無論為了使這種共產主義意識普遍地產生還是為了達到目的本身，都必須使人們普遍地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推翻統治階級，而且还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旧的骯髒東西，才能建立社會的新基礎。”^①無產階級尚且要通过革命來拋掉身上的骯髒東西，何況是其他非無產階級的勞動人民。文藝作品揭露矛盾，批評落后現象，正是使勞動人民拋掉身上的非本質的骯髒東西，而使其優秀的階級本質得到發揚。由於矛盾向革命的方面轉化，人的思想便進入了一個新的飛躍，這種被埋藏被掩蓋的勞動人民的階級本質便會显得更加豐富而光采奪目。因而，寫非本質的東西，是批判對本質的背離，是使這些非本質的缺點和錯誤在與反映了階級本質的優秀品德的比較和鬥爭中被消滅。如小戲《補鍋》中的劉大娘，本是一個勤勞、淳樸的農民，但她卻受着舊思想的侵蝕，殘留着輕視某些勞動工種的觀念，她是勞動者，卻又歧視補鍋這樣的職業，在新思想的幫助下，她的精神世界就飛躍到一個新的階段。劇本批評她某些陳腐的觀念，並不妨礙對她的勞動人民本質的描繪，而是使她的精神世界顯得更豐滿了。

還要指出的是，階級的本質不是固定不變的東西，隨着革命的發展，它也在不斷的鬥爭中不斷的成熟、豐富的。無產階級如此，其他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更是如此。也就是說，他們要在三大革命實踐中逐步豐富的。貧農不是無產階級，作為階級的特點來說，他們身上有許多非無產階級的東西，今天，社會主義的文藝不僅是要反映他們原有的優良品質，還要負擔着幫助他們提高到社會主義的優秀人物的水平。長期落后的、個體的經濟給農民帶來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是需要經過幾代的事情。”^②今天人民公社貧農的本質，是從原來個體農民中發展來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8頁。

② 《列寧全集》，第32卷，第205頁。

是在不断的革命运动中改造过来的。如果作品反映了某些劳动者的改造过程，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我們认为，典型化不排斥可以写劳动人民的缺点和錯誤，这并不意味着把典型作为一个数量的总和，把一切落后現象都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它要求作家用无产階級观点、按历史发展的真实来塑造人物，否則这些就是不真实的，談不上典型性。以前就有人写过所謂官僚主义者形象，把我們某些同志簡直描繪得象小丑一样，这不是为了爱护干部、帮助干部，而是夸大他們的缺点，夸大这些缺点的作用，实际上是为了攻击党的領導，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如刘宾雁的《本报內报消息》就是这样的作品。这里是一个立场問題，不是分寸問題。如果为了爱护人民，就会恰当地指出他們的缺点所在，而不是任意夸大他的缺点、丑化他們的形象。

这次中南戏剧会演剧目中，不少有缺点有錯誤的人物形象，都反映得比較深刻，提供了許多創作經驗。如《英雄工兵》的邵虎臣和何万里，邵虎臣热情干劲有余而求实精神不足，有冒险主义苗头；何万里“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由于考虑个人得失，革命精神正在消退。两个人都有缺点，但情况不同、性质不同，效果就不同。作者毫不掩飾地夸奖邵虎臣那种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不怕艰苦的精神，因而，虽对邵有批評，观众却非常喜欢这个人；何万里缺点較严重，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曾經在朝鮮战场上英勇战斗的战士，他的无产階級战士的本色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作品批評他們，但沒有整个地否定他們，把他們写得一无是处。邵、何两个人物就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不仅在解放軍中，在地方机关干部中，他們都有“代表性”：一种是有勇无謀、不善于将革命干劲和求实精神結合起来；一种是碰了点钉子就前怕龙、后怕虎，背上思想包袱。作者写得很有分寸。如果作品把他們的缺点和錯誤写得很严重，作品的主题恐怕就不相同了，性质可能就不一样了。

典型的深刻性，关键在于作家如何选择题材，开掘主题；在于作家深入生活，对生活有正确的态度和深入的理解。如果不抓住这个要点而去追求缺点数量的綜合，那这种典型倒不可避免是“暴露文学”所謂的“典型”了。

生活的艺术结晶

——評《綠竹村风云》第一卷

杨 嘉

从潮州說唱《綠竹村的斗争》到长篇小说《綠竹村风云》的出版，经历了好几年的時間，作过許多次的修改加工。一位三十岁的年青农民，从拿五尺二的鋤头柄到搖动不及半两重的笔杆儿，从当农民到写农民，这变化是巨大的，其成就也是出色的。小說真实、生动地記錄了潮汕地区一个小山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初期，貧下中农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尖銳而复杂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終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确是合乎“穷哥們”心意的一本好书。正如社主任曾經对王杏元同志說过的：“这是书，这是我們的路，要剪尺二紅綢把它包起来，留着传子教孙啊！”①

一

《綠竹村风云》成功地創造出以王天来为首的一群鮮明、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現了他們那种“泡出茶色来”的貧农品质，能够“靠鉄肩挑起江山来”的豪迈气概，刻划出一班“漚不烂、折不断、踩不散的硬骨头”，为英雄的貧下中农立传。其中最大成就，是塑造了綠竹村村长、共产党员王天来的形象。

小說描写王天来走过的是一条艰辛险阻、漫长曲折的生活道路。在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中，他事事带头，是火海刀山都踩得过的一員闖将。作者在刻划这个人物性格的时候，是从多方面去塑造和雕琢的，但着重表現了他的两个方面：

首先，是他对貧农兄弟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当他被选为村长掌握起印把子的时候，便意識到“这是老八哥用头用血换来的，千万不能馬虎”。印把子掌握在誰的手里，是阶级斗争的焦点。凭着他的政治敏感，他知道这个印关系全村三百口人的命运，“除非我的头先丢了，印才会丢！”同时他也就“看到村里的房屋、场地和道路，好象比往日更加亲切似的，觉得一切都應該管一管。”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当家作主的精神，使我們一开始就听到这位“碗仔头”的誓言壮語，相信他一定会帶領大家跟着党走，擂起社会主义革命的震山鼓来，坚决地走到底的。

在以后的篇章里，作者用酣暢的笔墨着意描繪他的这种高貴感情。土地改革之后，农村出現了新的两极分化現象。他为了替天賜贖回竹山，走門串戶地向貧农兄弟湊钱，

① 王杏元：《当农民、写农民》，載《羊城晚报》1965年11月13日。以下有关作者談及的創作經驗，均引自該文。

說服鳳梨把自己家里的一口猪也卖了；他看到春婆連土改时特意分給她的一个銅鍋也要卖掉了，对旁人的譏笑和嘲弄感到义愤填膺。他十分理解，这并不仅仅是个人遭遇的問題，而是資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的挑战和进攻。他风急火燎地对石生指出：“走！天賜的竹山都卖了，春婆那个銅鍋也保不住了，你还躺着哩！有人就要把我們的肚皮当路踩了。”对木坤和日兰創造的木牛，他又充满喜悅，大力支持，因为这正是表现了穷人的骨气。他就是这样紧紧地依靠着貧下中农，重新組成了天来互助組，开荒生产，打八面拳，到建立农业社时，他更是“为了集体事业，情愿磨骨头”。正因为王天来能够跟这一班“吃蛇配虎肉”的階級兄弟同心同德，和他們“咬姜蘸醋”地同甘共苦，他才有无穷的力量，也才能无比坚定地和大家一起踩出一条合作化的大道来。

另一方面，王天来对階級敌人却是“敢在虎口拔大牙”，勇猛斗争，誓不两立；而对那些一心想走資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分子，他又能“看穿三道墙”，心明眼亮，警惕性很高。特别是在互助合作运动中，他对富裕中农王阿獅的針鋒相对的一連串明爭暗斗。阿獅先是“张着嘴等着咬”村长的紅印；后来要买天賜的竹山，公然向农会挑战；继又办起全家的假互助組，唱对台戏；墟场做投机倒把，企图拉天来互助組下水；尾后他还勾結一班富裕戶暗訂同盟，对抗农业社，准备分庭抗礼。作者把这个成为王天来对立面的人物，写得十分嚣张而狡詐，却又不失分寸地囿限于人民內部矛盾的斗争。而在天来看来，能够把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提高到階級命运，階級前途的問題去認識，表现了他过人的斗争胆識和斗争艺术。这批頑固、自私的富裕中农在他的面前节节败退，到第一卷結束的时候，这场誰胜誰敗的斗争虽然还未終結，但以王天来为首的貧下中农，已获得了輝煌的成果。

作者就是集中从这两个方面着手，通过許多动人的故事情节，把王天来放在矛盾的漩渦和斗争的焦点，将他刻划得感情丰富，性格鮮明，意志坚定，胸怀开闊，成为一个比較完善的貧农典型。在他的教育与带动下，木坤和石生打消了各奔前程的私念，在互助合作运动中逐渐成长并坚定起来；日兰和鳳梨打开了眼界，积极投身到劳动生产的广阔天地；落后的銀花和烏山經過事实教訓，也都痛改前非，轉变过来；天賜最后回乡归队，重新創造新的生活。王天来在复杂、尖銳的斗争中（这些矛盾斗争包括敌我之間的矛盾和干部之間、夫妻之間、組員之間、叔侄之間等等的人民內部矛盾），巩固并发展了階級队伍，把它“箍成一个大桶”！無論是王天来及其階級兄弟也好，王阿獅和他的同謀合伙者也好，他們双方都是既有階級共性，又是千差万别、各具不同个性的“这一个”。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鮮明生动的艺术群象，正是作者生活的根子扎得深，真正了解和熟悉自己的农民群众，把了解的触須深入到人物的心坎，熟悉他們的思想活动和生活习惯，然后才能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运用階級分析，創造出在农业合作化初期农村中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来。

王杏元从小在农村中长大，曾經担任过乡政府的民政委員和农业社的社主任，深深扎根于农村生活之中，亲身經历了各种变革和斗争，他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員。毛

主席提出的“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的問題，他是完全按照這個指示做到了。正因為能夠如此，所以農民羣衆有了什麼歡樂、哀愁、願望，或者碰上什麼困難、疑慮、糾葛，便都將心事對他和盤托出，把他當作自己的貼心人。他正確地解決了這個文藝創作中帶着根本性質的階級立場和階級感情問題，密切聯繫羣衆，一旦當他遵貧農之命，執起筆杆來，就能把他們豐富的精神世界，細膩的心理活動，崇高的革命抱負，以及愛憎分明的強烈感情，分別概括於藝術形象之中，通過作品成為貧下中農的忠實的代言人了。王杏元同志介紹他的體會時說：“如果自己在工作中，不是一個五好社員、五好幹部，又沒投身到火熱的三大革命運動中去接受教育和鍛煉，那儘管你有多大本事，多大的干劲，也是寫不出貧下中農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热心和堅定性，寫不出我們的共產黨、革命幹部、先進人物，怎樣胸懷壯志、為公忘我、夜以繼日為集體事業操心的崇高風格。”這是值得每一個文藝工作者深思的問題。

二

情節被稱作人物性格的歷史。情節來自現實生活和鬥爭，又是為了塑造人物性格而服務的。《綠竹村風雲》描寫了許多生動有趣、發人深思的故事情節，足見作者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礎，經過藝術概括，又正顯得“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從而把作品的主题思想提到一定的高度。

首先，作者在作品中勾勒出潮汕地區一個山村의獨特環境。這裡山多地少，交通梗塞，民風淳樸。地主三腳虎在生時，獨霸一方，百姓遭殃。斗垮了地主轉入互助合作運動時，又因人窮地瘠，困難甚多。加以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猖獗一時，便使得兩條道路的鬥爭愈益增加其複雜性和艱巨性。作者正是在這樣一個矛盾交織的典型環境中安排情節，以塑造出各種各樣的典型性格來的。例如小說一開始，描寫王天來的為人處境，就很攔住人心。他出生在福建，被迫逃亡到綠竹村入贅窮戶，生平勇於助人，甘願當起眾人牛來。這却成了三腳虎的眼中釘，伺隙迫害。使他“家鄉沒有他立腳之地，便跑過廣東來，可廣東也沒有他安身之所啊，他能跑到哪里去呢？”“飛禽走獸都有家可歸，天來却有歸家不得”。他想起了過去的苦難，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地主逼出來的。正当地主在祠堂迫害王婆母女的关头，他毅然跑回村來，迎面牛吼一聲：“三腳虎，我來了！”以他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風豪勇，壓服了地主惡霸。“天來仇恨未消，轉過身，舉起槍，‘嘭’一聲，只見祠堂前，三丈多高懸挂燈籠的木杆頂端倒復着的黑瓷坛子，在硝烟中碎片四射。‘好厉害的神枪手！’寨子裡的窮哥們个个喝彩，三腳虎也吓出了一身冷汗”。這個精彩的情節，真有点象《三國演義》中關雲長“溫酒斬華雄”的出場一樣，几筆就把人物性格寫得活龍活現，光彩照人。以這樣的一個在階級仇恨中培育出的“礮仔頭”性格，他後來能够在黨的指引下帶領着窮兄弟們不斷鬧革命，“敢教日月換新天”，要“骨头組”也能長出肉來，走上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大道，也就十分令人信服的了。

貧农天賜的生活遭遇，也很有典型意义。穷人娶妻，原是为了增加劳动力，而山村討媳，更非易事。天賜出山去了，把勤勞积攒下来的十二块龙銀全帶了去，却被騙娶了一个又粗又黑的女人。好心肠的天賜同情这个誠实的村妇，“终于承受了这份‘千里姻缘’！把黑脸新娘带回家来。”老婆后来不幸病逝，他又义收一对逃难的母子，也是不能完滿，終又送妻儿回原夫家团聚。“穷人才知穷人苦”，天賜忍受自己的痛苦去成全别人的幸福，这段娶妻，收妻，送妻的情节，是异常动人的，表現貧农的情操則十分高尚。土地改革过后，他自己和女儿又相继病倒，不得已卖却竹山償債。正在这节骨眼时，天来挺身而出，挽救自己的阶级兄弟，打击富裕中农的嚣张气焰。这一情节，形象地說明了，非和个体經濟决裂，农民无以彻底解放和翻身，同时也把天来的阶级情义描写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人物性格正是通过这些富有特征意义的故事情节，而显得血肉丰满起来，充分表现了农民阶级的优秀品质的。

“入党申请书”是非常巧妙的艺术构思，是前所未见的独特情节。乍一看题目，还以为这是石生或木坤提出入党要求了，而事实不然，要求入党的却是阿獅！这段情节，真是出乎讀者的意料，但又合乎生活的情理，合乎阿獅这个人物的性格邏輯。因为阿獅“是个满肚《三国》，算盘終日挂在褲头的人”，工于心計，很懂得政治和經濟的关系，自以为在新社会里也是“有权就有势，有势就有钱，借当今的話說，就是有政治，就有經濟。”他夺印失敗之后，便想起了申請入党这条妙計来。他不仅从正面对互助組挑战、捣乱，而且懂得使用反面的两手，这就把这个十分狡猾的人物性格諷刺得入木三分，成为一段很好的也是形象性很强的反面教育材料。

王天来接到这份申请书，阶级斗争的经验使他提高了警惕，他将計就計，利用阿獅的假积极，攻其弱点，使他改掉榕树坝，而阿獅却想入非非，买乐器书册开设閑間，結果落得一场笑話。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这并非仅是一段笑料，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的。

在作品中，諸如真假互助組的斗田，石生和日兰的爱情波折，銀花用“实物教育”对付木坤，猪屎伯在地主面前嘴咬指头，紅梅对葫芦關“家庭革命”等等，这許多情节都描写得精彩动人。现实生活本身的繽紛多采、浪涌波回，給作者以无限广阔的創作天地。这些艺术情节都从生活中来，作者善于从生活小节中引出大题目，从平凡故事中揭示大道理，这是很不简单的。王杏元同志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小說所描写的虽然只是一个小小山村发生的事情，然而，由于作者根子扎的深，作品富有地方色彩，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了鮮明的时代精神，特别是塑造出王天来这样英雄的农民形象，它的教育意义也就愈加普遍。

三

我們提倡文学作品的大众化、民族化。什么叫做大众化呢？毛主席說：“就是我們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

学习群众的語言。”大众化，指的是思想感情；民族化，指的是表现形式。这二者都是要运用艺术語言来表达的。《綠竹村风云》在这方面获得了可喜的成就。作者善于使用经过精心选择和提炼的生活語言，娓娓动听地向讀者們陈述山村的故事，傾訴农民的心思，来龙去脉，清晰可寻，能鋪能約。事之大者气势不凡，振动人心；事之微者精雕細琢，引人入胜。作品运用民間說唱的叙事手法，也适当吸取某些古典文学的描写技巧，通过饒有生命力的艺术語言，表达了当地农民群众的口語心声，因而在大众化、民族化上具有比較显著的特色。

这部小說的語言特点，归納起来可以說是：强烈的阶级感情，通俗的口語化和鮮明的性格化。这三者往往又是交織和融汇在一起的。例如杨書記启发天来要当村长的一番對話，描写互助組斗田、开荒的气势，入社时农民按捺指模的場面等等，作者都使用了激励人心、热情洋溢的語言。反过来，对于阿獅投机买卖的揭发，对葫芦侮蔑互助組的反击，又都表現了那种对資本主义道路切齿痛恨，势不两立的貧农骨气。王天来在被选上当村长时对凤梨說：“我不是甘草，哪能和百药。”他发动大家要組織起来，說道：“我們不能做烏龟，不能象蜘蛛一样，各打自己的小网。”他把弟弟带回村来时，对他說：“老竹相連，新竹也要相連，我們要一輩輩相連下去，永世擂同个鼓，开同个山，唱同出戏！”这些語言，都不是单纯一些生活上的比喻，而是蕴含着强烈的阶级意識和阶级感情的。作者一方面很注意运用提炼过的語言来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一方面又善于使用质朴的生活口語，使人讀来琅琅上口，通俗易懂。天来使用的語言很多就都是深入浅出的。例如他在当上村长时发表的“就职宣言”：“今后我……若变相，放开乞食籃打乞食者，大家就拿状紙到大乡告我。”到后来創建农业社时，他先說起单干苦来启发大家：“单干苦不苦呢？老話說，树不成林怕大风。一家单脚独手，打到鼓来鑼不响，遇到一陣灾，害了一场病，就象折骨草一样抬不起头来。”他跟着动員大家建社：“我們拿不稳，想唱‘千年田，八百主’的人，就要出来老鹰抓小鸡了。”因此一定就得把农会印换成一个农业社的大圓印，“有了大圓印，穷哥們就不会再卖山卖地了。”这是多么形象化的艺术語言，又是多么具有說服力的口語化的通俗語言啊。

可以看出，上述的語言同时也是具有性格化的特点的。作品中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語言表現出不同的思想感情。作者用他独自の語言手段，切合人物身份，符合当时气氛，来刻划各种人物性格，表現丰富的思想內容，突出鮮明的作品主题。这里不妨再引述一两个例子。当銀花想拉木坤脱离互助組去福建寻工，送段鯁魚来給天来吃，并对凤梨說：“我們咸菜根不是咬了一两年了，难道还不够苦？”凤梨答道：“銀花，我說呀，男人家一心創大业，我們妇女，即使不打鑼，不敲鼓，也得帮帮腔，勤勤儉儉把家理好，大家齐心合力，互助組这台戏，才能唱給全村人听呀！”这說得异常生动，又是十分鮮明的对照，聞其声而知其为人，讀者是不会混淆的。又如天来在发动建立农业社时，“在场的风水先生王庭芳接嘴說：‘天来，哪能比得人家，他們乡里是蜜蜂做窩，我們綠竹村是蜘蛛結网。’这一說，有人哄笑起来。石生說：‘风水仙，你的罗庚盘呀，

快拿去盖屎桶吧!’王庭芳还执意說:‘盖屎桶?嘿,你听着,人家平原一根草,就赢得山里一枝花呢。”这段描述写得有声有色,把风水先生的肠肚都翻了出来。这番話只有他說得出口,至于阿獅、葫芦等人則会是另一种口气的。

如果作者不是在火热的农村生活中生根,和农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充分和认真地学习人民群众的丰富生动的語言,对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具有比較深刻的理解,因而在大量的語言庫藏中經過遴选、錘炼,是不可能收到这么好的效果的。过去曾經有人对某些作品的語言作了片面的夸大和推崇,把它和作品的思想內容,人物的精神品质,故事的結構安排,都游离开来,孤立地去推敲钻研,甚至盲目吹捧。語言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但被用作描写社会生活的文学語言,便一定印上了人物的阶级意識,表現着作品的政治傾向,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感情。离开作品內容来議論文学語言的艺术魅力或技巧运用,显然是十分錯誤的。

《綠竹村风云》是广东省第一本青年农民作者的长篇小说。这是从农民的角度来观察农民,反映农民的作品,自有它独特的意义,很值得我們重視。

作者从生活实践到艺术概括,經歷过漫长的道路。小說从初稿到修改完成,也花費了三年多的時間。这个过程,是王杏元同志学习和实践反复結合的过程。也是他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党的方針政策,学习社会,学习文学艺术的过程。他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上,不断学习来提高了思想,又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去研究、分析生活,慢慢的掌握了創作的技巧,加强了艺术表現的能力。可以說,《綠竹村风云》是生活的艺术結晶。作者的創作經驗對我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他并不象某些創作人員一样,下乡“体验生活”和“搜集素材”之后,便独自构思,閉門創作,而是在社員們开荒地上边写边改地“鋤”出稿子来的。他的一把鋤头和一枝笔杆,都是斗争的武器,同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服务的。

王杏元同志写作《綠竹村风云》时,从“只知人壳,不知肚腹”,到塑造出王天来、石生、木坤、日兰等一群新农民的典型,也刻划了象王阿獅、葫芦等一些富裕中农的人物,表达了互助合作运动取得胜利的主题,这是作者能够把深入生活,提高思想,和促进技巧統一起来的結果。如果說,小說中还有不足之处,例如:描写党的领导和以王天来为首的集体领导力量,都可以再加强和突出;正面人物的革命理想还概括得不高,他們的工作能力还显得弱了些;表現互助組和合作社的优越性还不够显著;整部作品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还欠强烈;个别語言仍可以再加工提炼;等等。因此,整部作品讀完之后,使人感到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反面人物的丑恶比較充分,相应的通过王天来等人的生活和斗争,来展示革命事业及革命理想的光輝灿烂,以鼓舞人心和激励斗志,則觉得不够满足。而这也正是反映了作者学习不足和对生活的理解尚不够深刻的問題。相信作者只要按照党的指示,永不脱离群众,永不脱离劳动,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学习文学艺术,是一定可以把作品的下部提到更高度的。

略論王杰同志的幸福觀

叶 蔭

王杰同志在他的日記里提出、并用自己的實踐解答了人生的根本問題：“为什么活着？为谁活着？怎样活着？”王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一心为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杰同志在这种革命人生观指导下，解决了什么是幸福，怎样达到幸福的问题。在他看来，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彻底革命，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幸福，这一概念并没有什么奥秘，它只不过是人们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从一定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出发，对于生活的评价和理想的追求。因此，从那个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出发，追求什么样的理想，就决定了人们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区别于其他阶级世界观的根本特点，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王杰同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幸福，就是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表现，王杰同志的幸福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幸福观。

“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

王杰同志的日記，记录了他的光辉的共产主义思想。什么是幸福？怎样对待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王杰同志在他的日記和行动中作了回答。請看他这些閃閃发光的語言：

“干革命是为了什么？革命者永远认为：干革命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为了少数狭隘集团的私利。但是也有少数人认为干革命是为了吃好穿好。”

“毛主席說：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拣重担子挑。今后我一定做到，宁肯自己辛苦，换来别人幸福。”

“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

“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这句话充分体现了王杰同志幸福观的实质。王杰同志言行一致，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时时处处閃耀着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他把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这种崇高的思想落实到他的具体行动中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行軍路上，一个战士不小心踩倒老乡的几棵麦苗，他立即上去一棵棵扶起来，培好土。外出拉粮，碰到一位行走困难的老大娘，他毫不犹豫地請她上车，一直拉十几里送她到家。旅途中，有几次碰到旅客丢了車票和钱包，他就解囊相助。”①

① 《革命青春的贊歌》，載《人民日報》1965年11月23日。

在路上看見工人們拉着裝滿石料的板車過橋有困難，就幫助工人推車，連星期天休息也忘了。行軍時，全班三天的口糧，他自己就背了一大半。他帶的一壺水，自己舍不得喝，都讓給戰友。晚上，他毫不顧及行軍一天的勞累，一直忙到深夜，為戰友烤干濕衣服。王杰同志這種助人為樂的事跡是很多的，他在生前就被同志們稱為“活雷鋒”。在任何情況下，他想的是工作、是別人。右手燙傷了，就用左手去為上工的同志們到山下河溝去打水。住了醫院，他就為醫院服務，幫助護理員擦地板、送藥、倒開水，關懷和幫助戰友。他到那里就為那里的人民做好事。他說：“為了黨和祖國，為了人民，我有一天的生命，就努力工作一天。”他就是这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象毛主席所教導的那樣，完全是為了解放人民，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當他為人民、為戰友做了一點好事，他就感到由衷的喜悅，他說：“……我雖然累出了不少的汗，但是我感到愉快，我累一點沒有什麼，只要同志們能多休息一會，只要能減輕同志們一點負擔，我就感到幸福。”

以人民的幸福為幸福，以為人民服務為幸福，這是無產階級的幸福觀。歷史上有那一階級有過這樣崇高的幸福觀嗎？沒有。地主階級以占有更多的土地，以能更多地榨取農民的血汗，以高官厚祿、封妻蔭子，以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為幸福。資產階級繼承和發展了這種剝削者的幸福觀。它把一切都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資產階級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着就是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還有別的痛苦。”^①金錢即是生命、即是理想、即是幸福，“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生為金錢生，死為金錢死。為了滿足追求利潤、獲得金錢的欲望，他們損人利己、巧取豪奪，無產階級和廣大勞苦群眾則成了他們這種幸福的犧牲品。可見資產階級的幸福觀同地主階級、一切剝削者的幸福觀一樣，都是利己主義的幸福觀，都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受痛苦的基础之上。這是一種可恥的、腐朽的幸福觀。

只有無產階級才能以大多數人民的幸福為幸福，以為人民服務為幸福，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全體勞動人民同享幸福的基础之上。為什麼只有無產階級才有這樣崇高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幸福觀？因為無產階級是歷史上最先進、最革命、最大公無私的階級，它那種高貴的道德情操就是由這種階級特性決定的，是它的經濟地位和歷史使命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完全喪失了生產資料，一無所有，在革命中，無產階級失掉的只是自己頸上的一條鎖鏈，獲得的却是整個世界。無產階級是新生產力的代表者，是全体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爭取解放的領袖，而無產階級也只有最終解放全體人民，才能解放自己。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在全世界消滅一切剝削和壓迫，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和沒有剝削制度的共產主義社會。無產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4頁。

階級这种經濟地位和历史使命，就是它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幸福观的客观基础。其次，无产阶级又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創造者，是历史的主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人民群众創造的。人民創造了幸福，幸福也应归于人民。这种世界观也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幸福观必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幸福观。

王杰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通过自己的实践，通过世界观的彻底的改造，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幸福观。由此出发，他就能正确地处理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的关系。王杰同志把集体幸福摆在第一位，坚定地认为：干革命就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幸福，而不是为了少数狭隘集团的私利，更不是把干革命当作为名为利，为达到个人享受目的的敲门砖。王杰同志心目中的集体幸福不是小家庭或小集团的所謂“幸福”，而是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幸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幸福。他认为只有这种革命集体的幸福才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因此，他在处理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的关系时，能够时时处处把集体幸福摆在第一位，把集体幸福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当个人幸福同集体幸福发生矛盾时，他就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幸福服从集体幸福。

例如，关于怎样对待个人的物质享受的問題，在一些人看来，优裕的物质生活，生活上能够舒舒服服，就是最大的幸福了。王杰同志根本鄙弃这种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吃好穿好不算幸福，只有天下穷苦的人都过上美好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他說：“一个革命战士不仅要站在連队看到全国，而且要看到全世界，看到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没有解放，还过着貧困的生活。”革命者不能背离革命理想，不能脱离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幸福来談个人的物质享受。对革命者來說，物质享受是不是幸福，主要不在于物质享受本身，而在于是少数人的物质享受，还是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物质享受。王杰同志全心全意为革命集体的幸福而工作，为促进革命集体的最大幸福的早日实现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革命集体的幸福，他为人民做了許多好事，但对于人民却毫无所求，他乐于过艰苦朴素的物质生活，并給自己規定了“三个不伸手”：“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他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的幸福而工作的。

又如，关于怎样对待荣誉、地位、爱情等問題，在一些人看来，能够成名成家，有高工資、高地位，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庭，就是最大的幸福了。王杰同志根本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这一切同整个革命集体的幸福比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他处理这些問題的原則是：服从革命利益的需要，党叫怎样干就怎样干。当个人幸福同革命集体的幸福发生矛盾时，他乐于牺牲个人幸福，服从集体幸福。他說：“……对于請假、結婚、級別等問題，領導上叫怎么干就怎么干，服从集体的利益。”“家庭三番五次的来信催我回家結婚，可是我主意已定，說什麼也不能丢掉党的事业去处理个人問題。”他完全把个人幸福溶化在集体幸福之中，把集体幸福当作自己最大的幸福。

王杰同志像中国革命历史上許多优秀的革命战士一样，把革命集体幸福放在第一位，为了革命集体的幸福貢獻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

这种崇高的道德观念，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这不是由于他們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或沽名釣誉，而是由于他們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了解和高度自觉。”^①在他們看来，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是統一的、一致的，这种統一、一致的客观基础是革命集体和个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絕不是单个人或者是少数人的事业，它首先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事业，同时也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的事业；不仅是一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事业，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事业。无产者如果不能团結成一个統一的战斗的阶级，单靠个人奋斗，永远也不能摆脱被剝削被压迫的不幸地位；在斗争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和被压迫的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結成巩固的联盟，解放一切被压迫的群众，无产阶级也不能够彻底的解放自己。同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又是一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取得最終胜利的根本保証。因此，在无产阶级伟大的解放事业中，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阶级利益和群众利益，一国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国际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作为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王杰同志对这种历史必然性是有充分認識的。因此，他能够很自然地把革命集体的幸福摆在第一位，能够全心全意为这个革命集体的幸福而奋斗，当革命需要时，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无产阶级一切优秀战士所共有的高尚的道德情操。

但是，有人說，无产阶级战士为了革命集体的幸福牺牲个人幸福，他自己就没有个人幸福了。这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一种污蔑。王杰同志的言行对这种論調作了最好的回答。首先，在无产阶级战士看来，除开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除开革命集体的利益以外，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革命集体的幸福就是他个人的最大的幸福。其次，无产阶级战士也有自己私人生活上的需要，也有自己的爱好，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爱情等等。但是，无产阶级战士这类的个人需要，从根本上是同革命集体的幸福一致的。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他能够自觉地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集体的利益，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的表现。的确，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个人牺牲了一些暫时的、微小的利益，而集体却得到了幸福，从而革命者个人也是幸福的。王杰同志在他牺牲休息时间为战友做了好事之后，在日記中抄录了馬克思这样的一段話：“历史认为那些专为公共謀福利从而自己也高尚起来的人物是伟大的。經驗証明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的人，他本身也是最幸福的……”这一种人生最大的幸福，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所永远沒法理解的。

怎样对待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表现了无产阶级幸福观和资产阶级幸福观的根本对立。资产阶级幸福观是以“我”为核心的，它在处理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的关系时，是个人幸福第一，为了个人幸福而損人利己，在它看来是天經地义的。这种利己主义的幸福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着統治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它的影响，特別在我們知識分子中間还有它的市场，不少人还摆脱不了名缰利索的束縛，并以此为个人的

① 刘少奇：《論共产党员的修养》，第41頁。

幸福。因此，向王杰同志学习，不断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巩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集体主义的幸福观，是我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的一个严重的、紧迫的任务。

“革命就是我的理想，斗争才是真正的幸福”

王杰同志在日记中写道：“通过毛主席著作学习，我懂得了革命就是我的理想，斗争才是真正的幸福。”

“斗争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思想深刻地体现了王杰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幸福观。王杰同志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通过参加革命斗争，树立了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理想。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一切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出发去考虑问题。他活着的时候，不怕任何艰苦，兢兢业业，一心一意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而工作；他死的时候，也是牺牲在自己光荣的战斗岗位上。他完全无愧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王杰同志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同每个革命者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是靠全体革命者共同奋斗来实现的。革命工作有分工的不同，但任何工作都是革命工作。王杰同志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乐于作平凡的工作，立志作一个永不生锈的“万能螺丝钉”，党把他捧在那里，就在那里闪闪发光。在同美帝国主义和一切阶级敌人的斗争中，他要作一个勇敢的“小兵”，党把他摆在那里，他就在那里吃掉敌人的“车”“马”“士”。一个人，当他胸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把自己的工作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他就能正确地认识自己那一份工作的意义，就能够为在革命事业中起了一兵一卒、一个螺丝钉的作用而感到幸福。

在斗争中，王杰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象“疾风中的劲草，岁寒时的松柏”，那里有艰险，他就在那里挺身而出，奋勇当先。无论是施工还是防洪，是训练还是生产劳动，他勇于挑重担子，专找最吃苦最艰险的工作去做；在出现生死抉择的紧急关头，他为了掩护十二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的生命安全，英勇地献出他的生命。

王杰同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不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而且为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奋斗。他对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恶魔怀着刻骨的仇恨。他认识到，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之所以还在受苦受难，最根本的祸根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不打败美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就得不到翻身，中国人民也不会得到彻底的解放。因此，他在平时军事训练中，怀着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怀着支援世界革命、打败帝国主义的雄心，苦练军事技术，苦练二百米硬功夫，时刻准备着响应祖国的号召，去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同帝国主义进行面对面的搏斗。当他看到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横行霸道，在越南北方狂轰滥炸的时候，他义愤填膺，满身热血在沸腾，他说：“支援越南人民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受苦受难的人民就是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就是上刀山入火海也永不变心。”王杰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不怕苦、不怕死，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赤胆忠心，为共产主义社会在全世界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硬骨头。

王杰同志深刻地领会毛主席的教导，把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而奋斗作为真正的幸福。王杰同志之所以能够树立这种彻底革命的幸福观，是因为他有一个共产主义的世界

观，有一个彻底革命的理想，有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認識和革命的高度自觉。斗争是打倒和消灭阶级敌人的根本道路，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泉。只有通过艰苦卓絕的斗争，才能打败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才能得到解放，才能在全世界实现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巨的共产主义事业，才能造福于絕大多数人民。王杰同志充分地認識了这种历史必然性，他說：“从世界每个国家的发展来看，不論哪一个国家要想走向社会主义，不经过斗争，不革命，不反对帝国主义就是空想。从我国的建設成就来看，经过了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打败了日本和其他反动派，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才使人民走上了幸福的道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要在全世界消灭一切剝削和压迫及其产生的根源，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在沒有取得政权以前，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在取得政权以后，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在国内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进行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斗争，在国际上則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还要改造自然，同自然作斗争，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条件。共产主义者深刻地認識了这种历史必然性，自觉地根据客观规律去行动，进行着改造旧世界和創造新世界的革命斗争，不断地把历史推向前进。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者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中，不怕苦、不怕死，在任何艰难困苦、生死抉择的关头决不后退的原因。

敢不敢斗争，怕不怕苦、怕不怕死，这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試金石，也是无产阶级幸福观和资产阶级幸福观的分水岭。王杰同志說：“干革命就不能怕牺牲；怕牺牲就不能在革命道路上坚持到底，就无所谓革命的坚定性。”現在，我們正处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潰、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是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时代，是全世界人民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反动势力生死决战的时代。我們每个革命者都毫无例外地面临着敢不敢斗争，怕不怕苦、怕不怕死的考验。这也是每个革命者是否树立了彻底革命的幸福观的标志。把彻底革命当作幸福的，就会象王杰同志那样，敢于斗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人总是要死的，世界上从来沒有长生不死的人。但是，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卖命、为名利地位而死，这是死得卑鄙；为打败帝国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死，这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虽死犹生。我們共产主义者是最懂得生命的价值的，我們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但是，要革命就得冒风险，就会有牺牲。我們中国人民有过許多痛苦的經驗，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剝削和压迫下生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但是，“在革命战争中，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来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以至整个人类的安全；一时的痛苦，可以换来长期的以至永久的和平与幸福。”^①少数人的牺牲轉化为千百万人民的幸福，当革命需要的时候，革命者毅然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正是“斗争就是幸福”这种幸福观贯彻到底的体现。过去，許多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幸福光荣地牺牲了，現在，王杰同志象这些革命前辈一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們虽然牺牲了，但他們給人民带来的幸福是永存的。

^①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学习《为人民服务》等三篇 毛主席著作的意义

刘 嶸

在广东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会后，学术界和积极分子报告团的同志们举行过一次座谈会。会上，大家又受到一次生动而深刻的教育，认识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每一个人革命化的必由之路；学好用好《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等三篇文章又是革命化道路上带有决定性的一步。

近来，大家又学习了雷锋式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王杰同志一心为革命的崇高精神和光辉事迹。王杰同志的日记再一次告诉我们：要真正做一个革命者，就要学好毛主席著作；要学好毛主席著作，又首先要学好《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

面对着全国和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大好形势，反看我们学术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深感惭愧。学术界中许多同志是在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比之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差距就很大。也还有一些人，由于缺乏为革命而学习的明确目的，存在着较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因而收效甚微。要改变这种情况，我觉得，只有向工农兵学习，坚决地走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道路，首先下决心学好《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学好毛主席著作的第一关。这里，结合我们重新学习《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的一些体会，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一)

有人說，《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篇幅短小，道理简单”。言下之意是没有什么好学的。我想就从这个问题谈起。按照我们的体会，《为人民服务》等文章的篇幅虽是短小，但所论述的道理，却是“为谁服务”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是解决人生观这个世界观的核心问题。毛主席这三篇著作，正是抓住这个革命队伍中最根本的问题，在理论上给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决。毛主席在这三篇文章中用明快而又生动的语言，形象而又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毛主席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共产主义精神；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本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可見，為誰服務，實質上就是做一個什麼樣的人的理想問題，是一個為誰而生、為誰而死的人生觀問題。任何人，都要對這個根本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這是回避不了的。就我們知識分子來說，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表現形式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但本質上只能是這樣兩種截然相反的回答：做一個追求個人名利地位、高踞於人民之上的精神貴族，還是做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戰士。對這個根本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區別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和資產階級貴族老爺的根本標志，也是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在知識分子隊伍中的集中反映。

為誰服務，所以是一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還因為這個人生觀問題，是世界觀的核心問題。大量的生動的事實表明，只有樹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才有可能真正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把毛澤東思想學到手，成為行動上的指南。個人主義是資產階級人生觀的核心，是萬惡之源。夾雜有任何個人主義念頭的人，就會蔽於私利和偏見，自覺或不自覺地抹煞和歪曲真理，就不可能掌握辯證法，掌握唯物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武器。不可能設想，一個不願革命的人，一個帶有個人主義雜念的人，卻能掌握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武器。所以，要想真正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首先就要解決為誰服務這樣一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劉少奇同志說過：“如果沒有明確而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沒有正確而純潔的無產階級思想意識，要徹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並使之成為自己的革命鬥爭的武器，是不可能的”。^① 為誰服務的問題，是通過一系列的具體問題表現出來的，這些具體問題，諸如怎樣對待工作，怎樣對待同志，怎樣對待困難，怎樣對待批評，怎樣對待犧牲，等等。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等三篇文章中，對這些問題都作了深刻的論述。毛主席說，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表現在：

“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不是“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不是“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後再替別人打算”；不是“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

“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热忱”，不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

對待工作，干一行，愛一行，“精益求精”，不是“見異思遷”。

對待缺點，“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

對待困難，要象愚公移山那樣，“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對待犧牲，“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就“比泰山還要重”。……等等。

顯然，在革命隊伍中，任何一個人總是要工作的。在工作中，就有一個工作態度和

^①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第21頁。

工作作风問題。在工作中，总是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困难，因而又有怎样对待这些缺点和困难的态度問題。在工作中、在斗争中，难免有牺牲，又有一个怎样对待牺牲問題。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对待这些問題呢？只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舍此别无他法。我們知道，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只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的人，才能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解决为谁服务这个人生观問題，就不可能正确对待其他問題，就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錯誤，和这样或那样的动摇，給革命工作造成損失。为人民服务，干革命工作，是一輩子的事情。每一个人参加革命实践的整个过程中，在实现思想革命化方面，是需要解决許多問題的，老問題解决了，又有新問題需要解决。如果我們能够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則，带着这些問題，学习《为人民服务》等文章，活学活用，那末，就会感到《为人民服务》等几篇文章，是大有好学的。如果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当作一种抽象的純理論研究，一点也不联系实际，当然就会认为这几篇文章没有什么好学的了。

总之，《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所論述的道理，不是什么简单的道理，而是一个重大理論問題。学习《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不是没有什么好学的，而是大有学头。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学习《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的經驗，和王杰同志学习《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的經驗，一再令人信服地說明了：为谁服务的問題是一个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他們正是在这个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馬克思說：“理論一經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論只要彻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 为谁服务的問題，正是革命队伍中的根本問題。因为它是根本問題，所以能說服人，能掌握群众，而成为伟大的物质力量。

道理是那么明明白白的。但是在我們学术界一些同志中，尽管天天在研究理論，却认为《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道理简单”，这只能說明深受資产階級煩瑣哲学的遺毒，以至于一点也不懂、至少不大懂得什么是理論，什么是馬克思主义理論。毛主席說：“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証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們所讲的理論。”^② “我們說的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馬克思主义。”^③ 《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所論述的为人民服务的理論，正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証明的理論”，正是“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义”理論。

(二)

在学术界中还有这样的說法：知識分子和工农兵“不一样”，工农兵学习《为人民服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頁。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頁。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頁。

务》等三篇文章的道路，我們不一定非走不可。对于这个問題，我們的看法是这样的。

說知識分子跟工农兵“不一样”，也确是“不一样”。但能否据此說明工农兵学习《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的道路，我們可以不走呢？不能！恰恰相反，这种情况正說明我們要恭恭敬敬的以工农兵为师，用加倍的努力，坚决学好这三篇文章。

首先，从世界观来看，知識分子和工农兵是不一样的。毛主席說：“我們現在的大多数的知識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还是属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①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知識分子又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以无产階級思想教育人民，教育学生。这就是一个大矛盾。如果不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观，树立无产階級世界观，不仅不能用无产階級思想教育人民，教育学生，而且还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資產階級思想腐蝕人民，教坏学生，帮了資產階級的忙。毛主席說：“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务。”^②“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是要把資產階級世界观去掉。資產階級世界观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不去掉个人主义，就不可能去掉資產階級世界观。要去掉个人主义，就要大破个人主义，大立共产主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习《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就是为了破个人主义，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其次，从工作性质来看，知識分子和工农兵也是不一样的。知識分子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从事理論工作的，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一句話，是制造精神产品的，担負着教育人、教育学生的工作。毛主席說：“我們的文学艺术家，我們的科学技术人員，我們的教授、教員，都在教人民，教学生。”^③那么，这个不一样說明什么問題呢？它只能說明知識分子負有教育人、教育学生的重大責任，要在思想文化战綫上兴无产階級思想，灭資產階級思想，用无产階級思想教育人、教育学生，把階級斗爭进行到底，当一个思想文化战綫上的革命派。要担負这个重大責任，首先就要向工农兵学习，向学生学习，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思想。特别是在知識分子队伍中，还有不少人存在着輕視工农兵，輕視工农子弟的資產階級观点，严重地阻碍了一些人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子弟服务。知識分子如果不解决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根本問題，乃是一个革命、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根本方向問題，同时，這個問題不解决，也根本无法做到“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一切文化艺术科学的原始材料，作出理論分析和概括，去指导实践。所以，知識分子要完成“教人民，教学生”的任务，首先就得下决心严肃认真地学好《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只有这样，我們才能把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当作革命工作，用革命的精神来搞好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这样，一不会把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当作个人为名为利的手段，二不会因

①②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講話》。

为患得患失而不敢拼不敢闖，而具有大无畏的勇气来进行教学改革、科学研究，不断探索前人所未探索过的东西，做出真正的成果来。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为许多革命的知識分子的革命实践所証明了的。

同时，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和工农兵还有“一样”的地方，这就是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一切参加革命工作的人都要实现革命化，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这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方向。所以，我們不但要看到“不一样”，而且更要看到“一样”，“一样”都要学习《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面我們提到的“不一样”，只能說明知識分子在改造世界观方面需要作更大的努力，而不是相反。我們看到，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学习《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时，取得了远比知識分子更为巨大的成就，尙且說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就要学习一辈子《为人民服务》。那么，知識分子还有什么理由以“不一样”为借口，而輕視对这几篇文章的学习呢？工农兵学习《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就有反复讀十遍二十遍的，甚至五十遍六十遍的。那么，知識分子不正需要以更大的热情和毅力，坚持不懈地学习这几篇文章，讀它五十遍一百遍，一直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到手，在自己的头脑中扎下根，在自己的工作中开花結果嗎？

当然，实现由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根本转变，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不能一蹴而成的，也不是輕松的事，而是一个激烈的思想斗争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实践和磨炼过程。但是，只要我們下定决心，走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道路，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思想，我們就能逐步地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毛主席教导我們說：“我們希望我国的知識分子繼續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①当务之急，就是要学好《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作为“繼續前进”的新起点，来迎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促进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学习毛主席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理论的体会

左 群

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是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毛主席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理论，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毛主席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夺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在这里，想谈谈个人的一些学习体会。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

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人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坚持长期斗争，积蓄力量，锻炼自己，争取全国胜利，就必须避开敌人统治较强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到敌人统治较弱的农村，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农村革命根据地是革命人民、革命军队借以保存并发展自己，驱逐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有了根据地，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就有了与敌人周旋的空间。有了革命根据地，就能进一步树立革命群众的胜利信心，就能给反动派以很大的困难，动摇其统治基础。

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民族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对农民斗争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实践证明，谁不知道依靠农民，不发动农民，谁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不了解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而反对发动和武装农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也是没有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们的错误，都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最好形式，是农民斗争的必然结果。也只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满足

农民的土地要求，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三、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新的国家机器比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任务更为艰巨，因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没有管理国家政权的经验。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内，有自己的政权，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等事业，这就培养训练了从事各方面工作的干部。所以，每一个根据地，实际上都是一个“独立王国”。“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也是为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伟大演习的过程”。（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四、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是革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就能充分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

有了根据地做依托，就能发挥我军之长，弥补我军之短。对敌人来说，根据地则是他们的坟墓。

有了根据地，武装的人民就可和非武装的人民相结合；主力军、地方军就可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各个根据地之间就可密切协同，配合作战，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变我之外线为内线，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这样，就可以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使它遭到灭顶之灾。

有了根据地，就可以更好地实行毛主席制定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方针。我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参战，那里好消灭敌人就到那里打，我要打你时就一定要吃掉你；你打我时，我有群众的掩护，叫你看不到，摸不着，牵着你的鼻子走，叫你到处扑空。

有了根据地，就可采取“诱敌深入”的打法，有计划地把敌人引进家里来，关起门来打。首先给敌人制造困难，然后分割包围，集中优势兵力，一个一个地吃掉它。

五、只要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根据地就会不断地发展，人民武装就会不断地壮大，敌占区就会不断地缩小，最后使敌人占领的城市处于广大农村包围之中，犹如汪洋中的孤岛。人民武装则由打游击战发展到打运动战、攻坚战、阵地战。到那时，便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夺取敌人占领的城市就不成什么问题了，并由此取得全国的胜利。

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经验

怎样才能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呢？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之后，我体会到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经验是：

一、要有坚强的武装力量。根据地建立在敌人统治的地区，周围都是反革命政权。反动派对根据地如芒刺在身，坐卧不安，它们一定要采取军事“围剿”的办法，对根据地进残酷的进攻，所以根据地首先要有一支包括正规军、地方军、游击队、民兵在内的、足以粉碎敌人军事进攻的武装部队。“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的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支武装必须是一支十分革命化、战斗化的武装，它要能经得起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的反复“围剿”，要能经得起艰苦斗争环境的考验；它要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除了打仗之外，它还要担负宣传、组织群众的任务；这支武装还要善于团结群众，和群众有水乳交融的关系。

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农村根据地，如果脱离了群众，就连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更不用说发展壮大。

军队的来源靠农民，坚持长期战争所需要的物资靠农民，农民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首先要依靠农民，发动农民。而要发动农民，就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等各项政策，以改善农民生活，把革命和群众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把关心群众生活、改善群众生活，作为动员群众筑成铜墙铁壁，打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前提。

要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以提高其政治觉悟。人的因素第一，人们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就会由精神变物质，发挥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那就没有任何困难不能克服。

还要把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各行各业的人，统统组织在革命群众团体之中，有了组织，就有了力量。

一切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党和军队，必须把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三、自力更生。农村革命根据地，处于敌人的分割、包围、封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自力更生之外，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至于军队的武器装备，除了自己生产一小部分外，则主要来源于前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兵工厂制造的武器，我们都是有的。所有党政军民，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办农业、办工业、办商业，办根据地所需要的一切。

农村革命根据地，依靠自力更生的方针，就能坚持长期的斗争。因为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农村多是半自给自足的经济，农村离开了城市，照样可以生活下去。这是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与坚持根据地的经验所证明了的。只有依靠自力更生，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立于不败之地。

四、要有一个坚强的党。所有上述这一切，没有一个正确的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这个党除执行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政策之外，还要因地制宜地制定一系列适合本地区情况的具体政策，借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最大限度的孤立敌人。

这个党要十分革命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不怕失败，他们坚信革命一定胜利，在任何挫折面前，都不会悲观失望。

这个党要能密切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这个党要十分团结，全党一致，共同对敌。

建立与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也要注意城市工作和敌占区的工作，瓦解敌军

的工作，以配合根据地的斗争，以便条件成熟时里应外合地夺取敌人占领的城市。

毛主席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对于今天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些地区不少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基本情况，同旧中国有许多共同点。农村，只有农村，才是革命者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才是人民战争的最好战场，才是革命者向最后胜利进军的基地。毛主席的这一伟大的战略思想，在这些地区的人民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一些亚、非、拉国家的革命者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或正在做这样的尝试。

林彪同志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中指出：“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亚、非、拉广大的“世界的农村”，必先取得革命的胜利，然后结合北美、西欧的革命形势，夺取这“世界的城市”，最终地埋葬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革命实践是經濟理論的源泉

陈錫潤 黃麟福 王光振

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經驗和问题，是我們經濟理論工作者面临着的一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要肩負起这个任务，对于經濟理論工作者來說，有許多認識上的問題需要解决。我們认为，經濟理論的源泉問題，就是需要我們再一次进行认真地学习和解决的一个問題。这里想就自己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受到的启发和教育，談談我們的体会，請同志們指正。

理論从何而来？經濟理論从何而来？這個問題，毛泽东同志早就給我們作了明确的指示。他說：“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証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們所讲的理論。”（《整顿党的作风》）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又說：“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嗎？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項实践中来。”毛主席的这些指示，过去我們是理解不深的。虽然，在口头上，我們也說理論来源于实践，理論必須与实际相結合。但是，在实际上，我們往往还是迷信于本本主义，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总是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写起文章来，东拼西凑，无的放矢，“空話連篇，言之无物”，遇到一些新問題，不是生搬硬套，就是凭主观推論，把自己圈在书斋里头。后来，在党的教育下，思想有了一些提高，开始感到經濟学中的許多問題，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許多现实問題，只依靠“本本”是解决不了問題的，需要到实际中去，到工厂、到农村中去，把实际工作中的經驗上升到理論上来，于是我們开始走出了书斋，下乡下厂，搞一些“調查研究”工作。当然，这是一个进步。但是，由于当时指导思想不明确，把調查研究，单纯当作蒐集資料，找典型例子，以便讲课与写文章时举例之用，因而在深入实际的过程中，只是走馬观花，找一些基层干部談談，拿一些資料回来，以此为滿足。因此，得益甚少，收效不大。这样的調查研究，从根本上来讲，仍然沒有摆脱本本主义的束縛，还没有把調查研究看作是理論来自于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的整个过程的重要手段。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三大革命实践的教育，使我們对于理論来源于实践的問題，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对过去理論脱离实际的状况进一步有所醒悟，感到痛切。

理論来源于实践，归根到底是来源于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农业是国民經济的基础，农民在我国人民群众中占了絕大多

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农民问题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这次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农村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广阔的天地。经济理论工作者不研究、不了解我国农村的经济问题，就不可能了解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各种问题。十多年来，五亿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奇迹，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在那里有着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的源泉，急需我们去学习、研究、分析、整理、提高和概括。例如，关于在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关于在落后的手工操作的旧式农具基础上，争取国家援助，依靠集体经济本身的力量进行技术改革、改良农具，实现农业半机械化、机械化的经验；关于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用最少的投资，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关于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和建设大面积的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关于走大寨之路，学大寨精神，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勤俭节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验；关于以粮为纲，多种经营，促进农业生产全面高涨，增加社员个人收入，巩固、壮大集体经济的经验；关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的优越性的经验；关于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坚持政治挂帅，关心群众生活，进行个人消费资料分配的经验；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经验；关于充分发挥全民所有制农业的优越性，加速农业生产发展的经验；关于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觉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以及关于保证党的领导，依靠贫下中农，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各种经验，等等，其中，许许多多经验有待于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从理论上去加以分析、概括和阐明。因此，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研究我国五亿农民在革命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丰富经验和提出来的许许多多问题，就成为我们理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在这个广阔的天地中，我们是大有作为的。

那末，今后我们应该怎样面向实际，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呢？

首先，实践是理论的源泉，革命的理论只能来自革命的实践。要不要实践，敢不敢实践，这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实践论》）深入实际，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掌握客观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第一手材料，是理论研究工作的前提条件。当然，人不能事事都要参加直接的实践，他人的实践经验，第二、三手的材料对我们也是极其宝贵的，但没有亲身经历实践，对第二、三手的材料也是理解不深的。过去，我们往往是“走马观花”、依靠第二、三手材料，结果抓不住问题的本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其次，客观的实际情况，总是非常复杂、千变万化的，当我们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之后，还需要鉴别、分析那些是事物的本质，那些是事物的现象；那些是问题的主流，那些是问题的支流。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碰到了不少问题，人们的

看法往往是不同的，为什么同样一个客观事实，有着二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呢？在这里就需要解决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解决一个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所以，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践，使我们深深地感到：革命的理論来自革命的实践，而革命的理論，只有革命者，在革命的实践中才能理解它、掌握它。在这里，摆在我们經濟理論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认真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指导自己行动，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鉴别事物的真假，去鉴别事物的现象和本质。

第三，理論工作还必须贯彻群众路綫，实行领导、群众和經濟理論工作者“三結合”。革命的实践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理論来自实践，归根到底是来自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經濟理論工作者必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在农村则是和广大的貧下中农相结合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农民群众是我们“可敬爱的先生”，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如果我们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識，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而贯彻理論工作的群众路綫，实行领导干部、群众和理論工作者三結合，是开展經濟理論研究工作的有效的办法。

第四，理論必须付诸于实践，经过实践的检验，坚持真理，修正錯誤。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論》中教导我们：“然而馬克思主义看重理論，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論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認識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論的認識，还須再回到实践去。認識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須表现于从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論和发展理論的过程，是整个認識过程的继续。”毛主席的这些指示，过去我们是很少考虑的。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論而理論，文章一成，万事大吉。至于研究所得出来的結論，是否正确，是否付诸于实践，能否經得住实践的检验呢？那不知道。这种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論而理論，理論脱离实践的現象，是必須彻底改变的。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认为，經濟理論工作者必須进一步端正态度，树立为革命而从事理論研究工作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必須在組織上，搞三結合，理論研究部門、高等院校、和业务部門挂鉤，和农村人民公社挂鉤，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把理論队伍和实际工作者队伍扭成一股绳，共同研究三大革命运动的經驗和问题，不断地实践、認識，再实践，再認識，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只有这样，才能使理論工作面向实际，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服务。

关于农业半机械化問題

吳 勉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也是农业“四化”的中心环节，因此，沒有农业机械化就沒有社会主义現代化的大农业。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是十分重視这个問題的，毛主席早就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科学論断，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明确地規定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路綫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可見，机械化問題对社会主义現代化大农业的建設是十分重要的。但农业机械化不可能是輕而易举、一蹴而成的，而是需要一个由低到高、由粗到精、由簡到繁、由单項作业到多項作业、由局部到全面发展的过程。具体來說，就是要有一个从旧式的手工操作农具到改良农具、半机械化、部分机械化、最后实现高度机械化的过程。从全国来看，当前农业生产上最普遍、最大量、最迫切需要的还是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因此，如何認識这个問題，并在抓好机械化农机具工作的同时，大力抓好半机械化农机具的生产、使用、推广和維修，对促进农业生产新高潮，加速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就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这里，就此問題談談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提倡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同时，是十分重視半机械化农机具和改良农具的。毛主席教导我們：“不要单纯等待农业机器而放松了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的推广”，后来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机械化、半机械化并举，在相当长时期內，以半机械化为主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創造了許許多多新式的半机械化农机具，这些农机具的发明、生产和使用，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減輕劳动强度，保証适时耕作，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活质量，增加农业生产和促进集体經濟的巩固与发展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作用，深受我国广大人民公社社員的欢迎。就中南地区來說，在灌溉机械方面，河南的动力水車（又名鏈条泵），其特点是結構簡單、成本低、效率高，每部售价才四百元，当扬程十五米时，每小时出水量达三十至四十吨，能負担灌溉面积二五〇——三〇〇亩，平均每亩灌溉成本仅二角五分。在耕作机械方面，湖南55型水田犁，群众誉为“五好犁”，具有平（底子犁得平）、深（耕得深）、稳（平稳好耕作）、輕（拉力輕）、快（工效高）等特点，比旧式犁提高工效五分之一，旧式犁杂木曲辕，材料来源困难，而55型水田犁則可用杉木直辕，取材容易。又如畜力旱地中耕器，一人一牛每天可中耕棉花十五至二十亩，比人工中耕提高工效四倍。在脱粒机械方面，湖南的56型打稻机具有四个优点：一是功效高，每天能脱粒三千斤左右，

比手扮提高工效近一倍；二是脱粒质量好，不但干净，而且每亩能多收七至八斤谷；三是能发挥妇女和半劳动力的作用，能缓和双季稻地区农忙时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四是减轻劳动强度。在农副产品加工机械方面，有沅江二号刮麻(苧麻)器。苧麻收获季节性很强，而且头、二、三麻的收割分别和早、中、晚水稻的插秧、收割的季节相近，所需劳力的矛盾很大。沅江二号刮麻器既能提高工效一至二倍，保证质量，又能减轻劳动强度，使妇女和十岁以上的小孩也能操作，而买一部这样的机具仅需八元左右。在运输工具方面，河南的架子车已经成为全省运输的重要工具，它所负担的物资运输量占全省总运输量的一半以上。这些事例说明了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机具是当前农业生产中的一股新的物质力量，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仍然使用以手工操作的传统农具为主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半机械化农具，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就更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任何单纯等待现代化农业机械的到来，低估或忽视半机械化农机具的作用的观点都是不对的。

二

半机械化农具对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充分证明我们党提出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并举，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半机械化为方针是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从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不论是地多人少还是地少人多，不论是精耕细作还是耕作粗放，也不论是一种作物为主或者多种作物经营，它们的农业机械化的共同特点之一，都是由手工操作经过以人畜力作动力为主的半机械化，过渡到以机械动力为主的机械化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大规模地以机械化农机具进行生产的阶段，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农机具，也要经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相互结合、逐步交替的过程，这是世界各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共同规律。例如，苏联早在一八六四年就建立了第一个马拉农具厂，十月革命后，曾大力发展以人、畜力为动力的农机具的生产，半机械化的阶段大概经过三十多年。一九二九年开始了农业机械化，到一九四〇年农业已具有相当的机械化水平，拥有主要农业机械按耕地面积平均，每三六六五亩耕地有一台拖拉机，每一二三七五亩耕地有一台谷物联合收割机，每一一〇〇〇亩耕地有一辆汽车。但在此时期，以人畜力为动力的半机械化农机具所完成的工作量仍占很大的比重，据统计，人畜力所完成的作业量在总工作量中的比重是：春耕作物翻耕方面占百分之三十八，春作物播种则占百分之四十四，谷物收获占百分之五十四，这种相互结合的过程，长达二、三十年之久。英国的农业机械化是从一八五〇年开始的，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农业生产的工具还是以畜力为主要动力的半机械化农机具。半机械化与机械化农具互相结合、交替的过程达二十年。美国以畜力为主的半机械化阶段是从一八五一年开始至一九一〇年，共经历了六十年的时间。从一九一〇年开始至一九四〇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止，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交替过程也达三十年之久。日本在战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速度较快，但目前，除了农田灌溉、脱粒和加工等农事固定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以外，农业的其他生产环节仍是以人畜力为动力的半机械化农具为主。总之，从手

工操作到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以半机械化为主的时期，当然这个时期的长短，并不是绝对相同的，有的长些，有的则可以短些，这固然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科学技术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和农业经济条件等的差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国家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才有可能自觉地去认识和运用这一客观经济规律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整个进程。

这里，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什么在从手工操作到实现农业机械化，中间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以半机械化农机具为主的时期？根据我国初步实践的经验来看，主要是因为：

第一、实现农业机械化必须与农业机械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相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和农业机械工业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后，农业机械工业更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同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需要方面来比较，仍差得很远。当前我国农业机械工业所能提供的产品，不但在数量上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且在品种上亦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在品种方面，当前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比较来说，是专用的多，适合多种作业的少；平原旱作的多，适合山区、丘陵和水田作业的少；大型的多，中、小型的少；谷物作业的多，经济作物的少；加工的多，收获的少。总之，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特点的品种仍不多，多方面的适应性也比较差。要全面地满足农业技术改造的需要，无论在品种和数量上还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此外，农业机械化除了与农机工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外，还要求与其他工业部门如冶金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等的发展相适应。而目前这些工业部门的发展距离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要求也还很远。这些说明了农业机械化的速度受工业生产能力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不可能“一步登天”，不可能现在就用大量的现代化农业机械来全部取代旧式农具，而只能逐步实现。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结构简单、制造容易，中、小型企业也能大量生产，因此，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将是广大农村的主要生产工具。

第二、实现农业机械化要与农业机械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农业的再生产过程是与自然条件紧密相连的，因此，农业生产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国家又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大国，无论是气候、地型、土壤，都极为复杂，各地差异很大，作物更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耕作制度、习惯和方法也很不相同，因而对机械化的要求极不一样，因此，尽管我们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好经验，设计和生产、推广了一些好的现代化农业机械，但要解决各种复杂的技术问题，设计出既能发扬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耕作方法，又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适应各种类型地区和满足农业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农业机械，则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实践和积累经验的过程，而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在技术上的要求没有现代化农业机械的要求那么高，易于设计、制造。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取代旧式农具的主要还不是现代化农业机械，而是半机械化农机具。

第三、实现农业机械化必须与生产者从手工操作到学会用好、管好、修好新技术装备的过程相适应。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精耕细作的经验，这是我们实现农业机械化、建立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宝贵财富，但也要看到使用现代化农业机械生产，对于农民来说还是一个新的问题，农民只有看到了现代化农业机械的作用，不仅能够减轻劳动强度，而且能够增产又增收时，他们才乐意购买和使用，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农民就要学会用好、修好、管好它，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做到既能增产，又能增加农民实际收入。为此，要提高农村科学文化水平，培养出为数众多的具有高度觉悟、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能熟练掌握各种现代技术设备的农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这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比较来说，结构简单，易于掌握、使用，易于修理、保管，而且也有利于农民进行发明、创造，因此，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半机械化农具自然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第四、实现农业机械化必须与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购买力水平相适应。我国农业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国营农牧场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成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牧场所占的比重不大，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主要地位。集体经济的机械化是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重大事情，当然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援，但由于国家正在进行工业现代化，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技术改造，各方面的建设都需要国家拿出巨大的物力、财力，因此，不可能把国家所有的资金都投放在农业机械化的建设上，事实上，国家每年用在农业机械化方面的投资是相当多的，但是与全国农业机械化的需要来说则是有限的，而且这些投资必须按照集中力量打开灭战的原则，重点使用，首先是用在重点支援的地区。大家知道，学大寨精神，走大寨之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道路。农业生产工具的改革，集体经济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国家的支援，但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依靠集体经济内部的力量。所以，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按自力更生的原则，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方针，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多快好省的道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固然不可能提供大量的现代化农业机械，以充分满足农业的需要，而现阶段人民公社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当前集体经济内部的积累能力还较为薄弱。要大量购买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也比较困难，而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一般来说价钱比较便宜，适合当前集体经济的购买力水平，同时，也有利于把集体经济的积累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集体经济的巩固、壮大。

第五、半机械化农具是过渡到现代农业机械的阶梯。在简单的机械和复杂的机械之间是没有绝对的界限的，许多复杂的机器都是在简单工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产工具发展史本身就是个很好的说明。十八世纪机器的出现是由于在工场手工业中，细致的分工，使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被分解为许多简单的操作，与此相应的是许多工效较高的工具，机器就是由这些工具组合而成的。我国这些年来所制造出来的许许多多半机械

化农具，有不少是从简单的传统农具改革而来的；也有不少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则是在半机械化农具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改革和完善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半机械化的工作搞得越好，农机具的品种越多、质量越好，就可以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所以半机械化农机具就成为从手工操作过渡到农业机械化的阶梯。

综上所述，我国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以半机械化为为主的时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要自觉地认识和运用这一客观规律，大力发展半机械化农机具，为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建设服务。

三

半机械化农机具较之现代化农业机械来说，虽然结构简单、易于创造，但是要为农村提供大量质量好、工效高、品种多、成本低、坚固耐用、操作方便、农民乐意购买和使用的半机械化农机具，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当然，在发展半机械化农机具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好好地研究和吸取外国有益的经验，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从我国的实际条件出发，开辟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高速度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来。当前，就有如下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

首先是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真地、正确地贯彻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半机械化农机具的研究、创造、推广、供应、使用和维修，使半机械化农具的工作纳入国家计划，这是我国半机械化农具迅速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具体工作中，如果能够在省、专、县的范围内，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统一规划，定点生产，分级管理，既有必要的集中，又有合理的分散，充分发挥地方中、小型企业的作用进行生产，就能更有利于增加品种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等等。这就要求有关的部门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农业生产的规律，了解农民的需要，使产品的设计能够从农业生产的实际出发，并按照“因地制宜”和“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对产品进行性能鉴定、生产试验；然后初步定型，重点使用，最后成批生产、推广使用。使农机具的生产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上。

其次是如何正确地解决当前半机械化工作中所出现的矛盾，促进半机械化的发展。如上所述，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走大寨之路，学大寨精神，按自力更生原则，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经济本身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半机械化、机械化，这是我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多快好省的道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积极地去揭露半机械化工作中的矛盾，并及时地加以解决，才能加速它的发展。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半机械化农机具不但品种、质量和数量方面不能满足要求，而且价格也比较高。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就会影响半机械化农机具的生产、推广和使用，因此，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增大数量，就成为当前发展半机械化农机具急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工作，例如，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充分挖掘工业生产的潜力；对一些厂房简陋、设备陈旧、又不配套、生产条件较差的老企业在可能范围内，分

期分批地进行技术改造；加强农业机械技术科学的研究；改进产品的設計以及加强农机具的修理和保管，等等。

此外，还必须认真研究解决农业生产需要的季节性与工业生产的均衡性之间的矛盾。为了保证及时供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和避免工业突击生产或庫存过多而影响工业正常生产，因此，供銷部門应有适当資金，有計劃地进行收购，作为货源合理储备。

总之，只要我們自觉地去認識和掌握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客观規律，认真貫徹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針，依靠广大群众，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經濟本身的力量，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創業的精神，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地解决在半机械化农机具的研究、制造、推广、供应、使用和維修过程中所出現的各种矛盾，就能够使我国农业半机械化、机械化的事业沿着多快好省的道路向前发展。

广东經濟理論工作者下乡調查增产增收問題

广东經濟学会为了促进我省經濟学界接触实际，面向农村，研究农村中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經驗和問題，最近，先后組織了部分經濟理論工作者分两批下乡，就增产增收方面的有关問題进行調查研究。第一批是去年十二月中、下旬到东莞調查的。在調查过程中，除以一部分時間与該县的有关經濟部門如农林水办公室、农村政治部、計委、財委、水电局等单位举行座談外，大部分時間是深入到桥头公社邓望成生产队进行調查。这个生产队的生产搞得相当好，特別是一九六五年出現了一个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农副业生产全面高涨的局面：水稻年亩产一千七百四十五斤，平均每人分配二百一十五元。从調查的情况来看，該队所以大幅度地增产增收，主要是因为：1.正确地貫徹党提出的“以粮为綱，多种經營，全面发展”的方針，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資源，发展多种經營，使集体和社員都增加收入；2.发挥自力更生精神，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破除依賴商品肥的思想，通过养、种、积、收等办法用自然肥、农家肥搞稳产高产；3.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費的关系，做到既抓生产，又抓生活，使社員越干越有劲；4.是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队的原則，可以不买的就不买，可以少买的就少买，使每一元的投資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这样，生产发展了，成本降低了，开支减少了，积累合理了，因而，实现了增产又增收。在調查的过程中，还就当前大好形势下，生产队貫徹执行“藏粮于民，藏富于民”这一指示的做法和經驗进行了了解。

第二批是一月上、中旬到花县江村公社調查的，調查中心也是圍繞着农村人民公社的增产增收方面的問題进行。

下乡調查的同志普遍感到通过調查，扩大了眼界，打开了思路，对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都很有帮助。

参加調查的有中山大学、华南师院、暨南大学、华南工学院、中山医学院以及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經濟理論工作者共十六人。

专用绿肥经济效益问题的初步考察

邵 建 勋

近两年来，广州市郊种植和使用专用绿肥有了飞跃的发展。一九六四年以前，不论冬季和夏季专用绿肥，都还处于由农业科学技术站、所及其基点队小量试种阶段，一九六四年冬季专用绿肥即增至十万零七百多亩，一九六五年夏季专用绿肥也增至六万多亩，冬季专用绿肥又再跃增到四十五万多亩。由于专用绿肥的大面积种植成功和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市郊农业生产，这里，仅就广州市郊种植和使用专用绿肥的情况，对专用绿肥的经济效果问题作初步的考察。

种植绿肥是我们解决肥料问题的战略性措施，它不但能节省投资，节省劳动力，而且能够提供丰富的有机质肥料，对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农业生产，具有重大的作用。具体来说，其经济上的效果突出地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一)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广州市郊多年来稻田面积都保持在二百万亩左右，但历史上冬闲田的比例很大，土地利用率低。以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三年为例，详情如下表：

单位：亩

项 目 \ 年 份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稻 田 面 积		860,900	874,100	960,400	962,900	1,008,900
冬 种 面 积	粮 食 作 物	61,954	106,143	162,129	106,541	107,590
	蔬菜及其他	85,006	95,018	122,480	135,603	216,067
	合 计	146,960	201,161	284,609	242,149	323,657
冬种面积占稻田面积的%		17.07%	23.01%	29.64%	25.16%	32.3%

但是，一九六四年冬由于大面积种植了冬季专用绿肥，而原来历史习惯种植的粮肥、菜肥兼收的紅花豆和蔬菜又有所增加，因而大大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九六五年的情况就更加突出。表列如下：

年 份 \ 项 目	稻田面积	冬 种 面 积				冬种面积占稻田面积%
		专用绿肥	蚕 豌豆	蔬菜及其他	合 计	
一九六四年	1,010,300	100,725	247,237	129,270	467,232	46.2%
一九六五年	1,007,400	451,038	200,000	100,000	751,038	74.5%

注：一九六五年冬种专用绿肥面积是实数，蚕豌豆、蔬菜及其他面积是预计数。

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把原有习惯种植的冬种作物扩大到同样比例，不是同样提高了土地利用，而且还能当造取得收入吗？在目前条件下，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从广州市郊来看，历史上的冬种面积一般都占稻田面积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左右，这是因为一般冬种作物都要在水稻收获后才能整地播种，而且花工和需肥量都较大，受到季节、劳动力、肥料来源和市场需要的限制。可是，冬种专用绿肥却在晚稻钩头时播种，花工少，每个劳动力可管十五至二十亩，因此与季节和劳动力的矛盾很少，而所需肥料，又主要是化学磷肥，与其他农作物争肥的矛盾也不大，这就是在广州市郊目前条件下，一般冬种作物面积不能过多，而冬种专用绿肥面积却可迅速扩大的原因。至于冬种专用绿肥虽然不能当造取得现金收入，但投放下去的资金和劳动力，实质上已转化成大量的有机质肥料，也就是创造了一笔物质财富，为越年水稻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准备。从这个意义来看，也可以说是一种劳动积累。如果再从增加地力，为推行粮食一年三熟创造了物质条件方面来考虑，专用绿肥对提高土地利用方面的作用更是大得多了。

(二) 提高了投资效果。种植专用绿肥的目的是为了以田养田，以磷换氮，生产大量的、肥分很高的有机肥料。因此，考察其投资效果，就必须以资金投放量与所取得的产品量来衡量，并以同样的资金投放量所能购买的商品肥相比较。由于广州市郊冬种专用绿肥主要是紫云英、苕子和黄花苜蓿三个豆科品种，其鲜茎含氮、磷、钾极其丰富，因此收到了投放少量用于购买种子、磷肥和根瘤菌的资金，却换取了更多的优质有机肥料的效果。如果能够做到自繁种子，其效果就更高。现将花县炭步公社东方大队种植紫云英的测定和核算结果表列如下：

投 资					生 长 情 况 及 产 量						鲜 茎 折 合 肥			折 合 现 金	平 均 每 元 投 资 所 得 的 产 值
种 子	肥 料	金 额 合 计			每 亩 苗 数	株 高	分 枝 数	根 瘤 情 况	单 株 重	亩 产 鲜 茎	硫 酸 铵	过 磷 酸 钙	硫 酸 钾	(元)	(元)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金 额	(条)	(公分)	(条)		(克)	(斤)	(斤)	(斤)	(斤)	(元)	(元)
(斤)	(元)	(斤)	(元)	(元)	(条)	(公分)	(条)		(克)	(斤)	(斤)	(斤)	(斤)	(元)	(元)
3	3	钙镁磷16	0.80	3.80	263,157	42.8	2	多	6.6	3,463	83.1	21.1	16.6	18.07	4.75
3	3	人尿700	2.10	5.10	273,343	43.8	1.3	多	6.4	3,529	84.7	21.5	16.9	18.42	3.61

注：1. 钙镁磷按每担5元计，人尿按每担0.3元计。

2. 硫酸铵按每担16.5元计，过磷酸钙按每担6.50元计，硫酸钾按每担18元计。

3. 以每千斤紫云英鲜茎含氮0.48%，含磷0.11%，含钾0.24%计。

上表说明种植紫云英不管是施用钙镁磷还是施用人尿，平均每元投资所得的产值都是相当高的。按前一种施肥方法计算，种植一亩紫云英的投资仅用三·八元，亩产鲜茎达三四六三斤，折合化肥是硫酸铵八三·一斤，过磷酸钙二一·一斤，硫酸钾一六·六斤，如果用现金购买同等数量的化肥则要化一八·〇七元，这样，平均每元投资所得的产值竟达四·七五元。按后一种施肥方法计算平均每元投资所得的产值也达三·六一

元，由此可見大种綠肥和购买商品肥的經濟效果比較，孰高孰低，不是一目了然嗎！

如按上表数字推算一九六五年全市郊冬种专用綠肥的投資效果，則其收益就更加可观了。表列如下：

专用綠肥面积 (亩)	平亩 均投 每資	总 金 投 資 額	平鮮 均 每 亩 茎	鮮茎总产 (斤)	折 合 化 肥				平 資 均 所 每 得 元 产 投 值
					硫酸銨(斤)	过磷酸鈣(斤)	硫 酸 鉀(斤)	折合現金(元)	
451,085	3.80	1,714,115	3,463	1,562,100,429	37,490,410	9,528,812	7,498,082	8,154,943	4.75
	5.10	2,300,523	3,529	1,591,871,907	38,204,925	9,710,418	7,640,985	8,310,367	3.61

注：1.以每千斤紫云英鮮茎含氮0.48%，含磷0.11%，含鉀0.24%計。

2.以每百斤磷酸銨16.5元，过磷酸鈣6.5元，磷酸鉀18元計。

(三)改良土壤增强地力。由于冬季豆科专用綠肥能够為我們提供大量的优质有机肥料，而且其根瘤菌又可吸取空气中的游离氮于土壤，因此，不論其迹地或只是施用其鮮茎的耕地，土壤都得到迅速的改良；理化性状显著改变，大大提高了保水、保肥能力。根据花县芙蓉墟大队的測定，不同田类种植紫云英前后土壤化学性变化如下表：

(水稻收获后取采測定)

土 类		项 目 养 分 含 量	有机质 (%)	全 氮 (%)	全 磷 (%)	速 效 养 分 (斤/亩)				酸 度	
						硝态氮	氨态氮	磷	鉀	水浸 出液	盐浸 出液
坭 肉 田	前		2.63	0.12	0.056	0.38	0.84	3.06	10.71	6.9	6.2
	后		2.87	0.12	0.094	2.30	3.06	1.92	26.01	6.7	6.3
半 沙 坭	前		1.42	0.06	0.047	1.21	0.38	1.06	11.86	5.8	4.8
	后		1.12	0.79	0.096	痕迹	1.21	1.67	25.00	7.0	6.9
死 坭 肉	前		3.00	0.13	0.031	0.46	0.50	0.46	7.65	5.5	5.0
	后		3.34	0.07	/	0.77	1.24	2.16	23.18	6.9	5.9
大 眼 沙 田	前		0.99	0.05	0.050	0.18	0.44	0.76	6.44	6.5	6.2
	后		1.74	0.10	/	3.00	1.22	0.92	7.65	5.8	5.7
湖 洋 田	前		2.32	/	/	0.77	0.25	0.41	15.30	5.7	4.6
	后		2.32	/	/	3.82	9.18	1.38	39.78	5.9	5.2
黄 坭 底 田	前		2.25	/	/	6.12	0.54	1.22	12.24	5.6	4.7
	后		2.51	/	/	痕迹	1.55	0.39	7.73	6.0	5.2

如果以同样投資和劳动力所能换取的其他肥料来看，它比使用其他有机肥更为显著和經濟，至于化学肥就更不能比拟了。

(四)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降低单位产品成本, 从而大大地提高单位面积的纯收入。正因为冬种豆科专用绿肥有了上述三方面的经济效果, 因而最后也就必然集中表现为: 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 因而大大地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纯收入。这里, 先以花县花东公社九湖大队不同田类种紫云英后的增产效果和其他措施比较为例, 列表如下:

土名	土质	前作	株高 (公分)	原插苗 (万)	总苗数 (万)	有效穗 数(万)	总粒数 (粒/穗)	实粒数 (粒/穗)	空粒率 %	产量 (斤/亩)	比犁冬 田增数 (斤/亩)
桥东	中上 坭肉田	紫云英	88.6	17.68	29.63	23.8	92	62	33	633	118
		犁冬	81.0	18.72	22.76	20.36	68.5	58.6	14.5	515	
洛麻田	低产 坭肉田	紫云英	92.4	19.63	24.77	21.76	88	61	23.2	650	180
		犁冬	79.6	21.00	24.00	22.08	51	44	13.2	470	
横圳下	中等 丰沙田	紫云英	87.8	18.58	27.8	20.35	91	62	31	620	70
		犁冬	78.6	15.6	21.00	17.30	86	63	26.8	550	

再以从化县神岗公社邓村大队第八生产队大量施用绿肥后, 提高了产量、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收入为例, 列表如下:

(单位: 元、亩、斤)

项 目 年 份	早 稻 面 积	使用商品肥		种植和使用绿肥						早稻生产情况		
		品种 数量	折合 现金	种植 面积	平均 每亩 生产 费	鲜茎 亩产	鲜茎 总产	每亩 用绿 肥 数量	每亩 稻施 绿肥 折合 现金	平均 产量 每亩	折合 现金	每亩 成本 用肥
一九六四年	76	化学氮肥52斤 豆麸21斤	11.45	68	4.00	2.500	170.000			446	37.02	11.45
一九六五年	76	化学氮肥28斤 氨水16斤	5.82					2236	3.58	540	44.82	9.4
六五年比六 四年增减%			-49.9							+21	+21	-18

注: 稻谷按每亩8.3元计。

当然, 水稻增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能都归功于冬季专用绿肥, 事实上我们也很困难准确划分增产部分的百分之几是由于种植和使用冬季专用绿肥。但是从邓村大队第八生产队提供的数字, 仅以施用绿肥取代商品肥所节省的成本及其增产情况来看, 也还是有足够的说服力的。

综上所述, 广州市郊种植专用绿肥的历史虽然还不长, 但已明显地表现出专用绿肥的经济价值是很高的, 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它不仅可以在短期内收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而且有利于我們在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中，依靠广大群众的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充分利用各种自然条件，改良土壤，增强地力，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

如上所述，綠肥的經濟效果是肯定的。但大面积种植专用綠肥对于广州市郊來說，还是一个新問題，仍然缺乏經驗，須要反复实践，不断总结，才能进一步提高它的經濟效果。这里，根据广州市郊发展专用綠肥中所出現的各种矛盾以及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具体条件，对如何提高冬种专用綠肥的經濟效果問題，提出如下几点初步意見：

（一）因地制宜，选用和培育不同的品种。从广州市郊一九六四年冬种专用綠肥的结果来看，不論是紫云英、苕子、黄花苜蓿，也不不論是种在山区、丘陵区或沙围田区，都有一批大面积成功的队。这当然是有条件的，概括來說，主要是要有一定的排灌能力，做好排灌工作，根瘤菌拌种，增施磷肥，防治病虫害，适时收获等等。但重要的是它已充分說明了这几个品种适应能力强，在广州市郊各种类型地区都可以种植。但是，在肯定这个前提之下，仍然应该因地制宜有所选择。例如：高旱地区較宜于种植黄花苜蓿，因为它更为耐旱耐瘠；排灌和土壤条件較好的地区較宜于种植紫云英，因为它对水肥的要求更高些。因此，从广州市郊的水、肥、土的条件来看，应该以紫云英为主。又再从广州市郊早稻插秧季节較早的耕作制度出发，应该选用早熟品种，以免延誤早稻农时。例如种植苕子就应该选择較湖北荆州苕子早熟的四川油苕。而更重要的是在普及种植的基础上，自行选育繁殖适合于本地情况的早熟品种。只有这样才能把冬种专用綠肥真正巩固下来，并充分发挥其經濟效果。

（二）提高单位面积鮮茎产量。可以通过培育和推广良种，提高栽培管理技术等等，来提高冬种专用綠肥单位面积鮮茎产量。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施用磷肥，实行“以磷換氮”，其效果較为显著。

（三）适当和合理安排留种田。在广州市郊目前条件下，冬种专用綠肥留种，就会延誤早稻插秧季节，这是一个突出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問題，或者只依靠外省供应种子（这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的）就会因影响早稻产量和拿出大笔資金购买种子而大大降低其經濟效果。要解决这个矛盾，在未有理想的早熟品种之前，最可行的办法是适当和合理安排留种田。所謂适当，就是要根据第二年种植面积的实际需要，和我們現有水平每亩留种专用綠肥所能提供的种子产量，以队为单位来确定和落实安排留种面积；过少則不能实现种子自給，过多則增加与越年早稻插秧的矛盾。所謂合理，則是充分利用各种不与早稻插秧发生矛盾的土地，安排作留种田，例如利用果园作黄花苜蓿留种，利用預留的晚造秧地給紫云英、苕子留种……等等。总之，尽一切可能，避免或减少在越年早稻田中留种。

（四）提高使用技术。实践証明，冬季专用綠肥和其他肥料一样，施用得是否得当，明显地影响到稻谷产量的提高或降低。我們有一些生产队，就是由于缺乏經驗盲目多施綠肥，使一九六五年早稻减产。根据花县獅岭农科站的試驗測定，紫云英的不同施用量的增产效果如下表：

(獅岭农科站中上坭肉田)

处 目 理	科 高 (公分)	原 插 苗 数 (万/亩)	总 苗 数 (万/亩)	有 效 穗 (万/亩)	无 效 分 蘖 (万/亩)	无 效 分 蘖 (%)	平 均 每 穗			空 粒 率 %	亩 产 量 斤	增 产 率 %
							总 粒 数	实 粒 数	空 粒 数			
亩压4000斤	90.00	10	39.8	25.3	14	36.5	86.4	66.2	26.2	32.4	745	23.1
亩压3000斤	90.10	10	37.8	24.1	13.7	36.1	85.3	64.6	18.6	19.2	752	24.6
亩压2000斤	80.20	10	36.4	21.9	14.5	39.7	87.8	71.4	16.4	18.7	795	30.5
亩压1500斤	82.10	10	36.0	21.1	14.9	41.4	87.4	76.0	11.4	13.0	778	28.5
对 照 区	80.10	10	34.4	20.3	14.1	41.1	82.8	64.8	17.8	12.5	605	/

上表說明，以每亩压青一千五百斤至二千斤，其增产效果最为显著。当然，不同土壤条件和不同的稻谷品种，会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是否能够控制綠肥的分解，使之符合水稻生长期中各个时期的不同需要，也是重要的因素。这些都有待今后通过实践，逐步掌握其規律性，提高使用技术，做到以最少的施用量来达到最大的增产效果。

(五)合理安排冬种布局，逐步增加粮食一年三熟的面积。过去多年种植冬小麦和紅花豆的經驗証明，广州市郊是完全可以实现粮食一年三熟的。但是过去冬种小麦后的土地，越年早稻一般都有較大幅度的减产，因此，最近三年来就逐步縮小到几乎沒有了，主要是过去广州市郊大部分土地的地力还不足以負担一年三熟的“重任”。如果連續若干年种植和使用冬种专用綠肥，大大地提高地力之后，推行粮食一年三熟，迅速提高粮食单位面积年产量是完全可能的。

談組織工業生產專業化的條件問題

趙元浩

工業生產專業化是指工業企業專門生產一定的成品或產品的某些部分，這是現代工業社會分工的一種重要形式。但社會制度不同，工業專業化生產的特點及其作用是根本不同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專業化生產為剩餘價值規律所決定，它是在殘酷的競爭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中自發地進行的，因此它的發展是盲目的、畸形的。其結果不但加速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而且造成大量失業，給社會勞動帶來了極大的浪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業專業化生產為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規律所決定，社會主義國家為了更好地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可能，有計劃地合理地組織工業的專業化生產，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多快好省地發展，因此，社會主義工業生產專業化的過程，是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工業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不斷高漲的過程，而且，隨着社會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社會分工的日益細致，專業化生產水平將會越來越高，這是因為專業化生產具有巨大的優越性，它更有利於採用新技術、新工藝、新裝備，提高機械化、自動化水平；更有利於發展新產品、提高產品質量和促進產品、零件、部件的標準化、系列化、通用化；更有利於提高固定資產利用率，改造舊機器為專用機器，節約國家建設投資；更有利於縮短生產周期，節約原料消耗，降低生產成本以及更有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利於調整生產關係，進行企業管理革命，提高產品質量等等。因此，我們必須自覺地去認識和運用這一客觀經濟規律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當然，強調專業化生產的優越性，絕不意味着專業化生產可以在任何條件下進行，實踐證明，專業化生產必須以一定的條件為前提，只有在專業化生產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正確地組織專業化生產，才能顯示出它的作用。那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組織專業化生產的條件是什麼呢？一般來說，主要有如下幾個條件：

(1) 社會對產品的需要量較大。社會對某種產品某種工藝或某些零件、部件等有較大量的需要，是組織專業化生產的基本條件。因為專業化生產所以比較非專業化生產優越，其主要原因，是產量大，有必要和有可能採用專用機器設備，專用工具、夾具。專用機器設備本身的效率既高，又可以節約許多調整機器設備、工具、夾具的時間，還可以組織流水生產，這就大大提高機器設備的生產效率。如果產量需要很少，而採用專用機器設備，那麼一台機器設備開工的時間很短，就可以完成生產任務，大部分時間停着不用，這不僅是機器設備的浪費，而且是整個社會勞動的浪費。因此，在組織專業化生產之前，必須對各種產品和零件的需要進行普遍和深入的調查統計，分析研究。只能組

織大量需要的產品或零件進行專業化生產，需要量不大的，就沒有這個必要，而只能組織多品種生產。

(2) 合理的和穩定的協作關係。專業化和協作是互為條件的，因而也是不可分割的。有專業化生產就必須有企業之間的協作，而企業之間的協作，又以產品彼此不同，互相需要為前提。例如有的工廠製造汽輪機，有的工廠製造發電機，有的工廠製造變電和開關設備，還有的工廠製造各種電纜、電綫、鍋爐……等等，才能配套成為火力發電設備；從製造一個產品來說，如我國第一汽車廠，要生產出汽車，就需要同四、五百家工廠協作。供應它各種各樣的零件。可見專業化生產不能沒有協作關係。但協作關係有好幾種：有產品協作，如火力發電廠成套設備要許多專業化工廠協作才能配套；有零件、部件協作，如汽車製造廠就需要許多專業的汽車零件廠協作供應零件，才能製成汽車；有工藝協作，如機器廠需要的鑄件、鍛件毛胚由協作的鑄造、鍛壓工廠供應，或機器廠的零件送給協作的熱處理專業廠進行熱處理加工等。此外，還有修配性協作，如工廠里不設修理車間，而把損壞了的機器交給協作的修配廠修理就是。這些協作關係必須是合理的和穩定的，否則對生產帶來許多不利。所謂合理，就是便利生產而不是耽誤生產，協作廠供應的產品、零件、毛胚或勞務必須是及時的，質量好的和成本低的（低於主機廠生產成本），否則便無法顯示專業化和協作的優越性，甚至耽誤生產，造成浪費；如停工待料，降低質量，提高成本等。所謂穩定，就是協作關係不要經常變動，變動多了就不能保證協作件的正常供應，不利於生產。一般來說，協作以就近就地來組織、經濟合理為原則，其中工藝協作和修配性協作以當地為主。因為遠距離的地區間的企业協作，運輸路綫太長，不但可能因交通運輸情況變化而產生供應暫時中斷現象，而且運輸距離愈遠，供應件儲備需要愈多，流動資金需要量也就愈大，對節約國家資金是不利的。但是，社會需要量不很大的產品零件、部件，又不能在每個地區都建設一個工廠，那麼，實行地區之間的企业協作就成為必要了。當然人們對專業化與協作的認識和共產主義風格，對建立合理穩定的協作關係是十分重要的保證，這正是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精神。

(3) 嚴格的計劃管理制度。如上所述，專業化生產必然和協作相聯系，那麼，在協作關係中，企業之間的产品、零件、部件、毛胚或勞務是否能及時供應，是否能按質、按量供應，對於保證正常生產，發揮專業化和協作的優越性有着決定的意義。因此，必須嚴格要求實行專業化生產和協作的工業企業把協作供應其他企業的产品或勞務，列入本企業的計劃之中，而且按照別的企业要求交付的時間完成交貨任務，才不會造成其他有關企業的損失。社會主義企業完成協作合同的任務依靠什麼來保證呢？首先依靠企業的革命化，用共產主義風格對待協作的任務；其次，就是依靠企業里有嚴格的計劃管理制度。保證企業計劃均衡地完成。企業的革命化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均衡完成計劃上面。這樣，嚴格的計劃管理制度就成為專業化和協作的重要條件，沒有它，按時、按質、按量完成協作的任務就沒有可靠的保證。

(4) 相应的工业标准化的水平。标准化要求全国产品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规格、质量进行生产。全国工业产品能够符合国家统一规定的规格、质量标准,其意义极为重大:第一、工业企业之间彼此供应的原材料符合规格、质量的要求,不仅为产品质量提供可靠的保证,而且可以避免由于原材料规格不对口或质量太差而造成的种种浪费现象;第二、工业企业之间彼此供应的零件、部件符合标准,就可以大大提高全国机器设备零、部件的互换率,这样,制造机器设备的工厂就不必要每种零、部件都得自己制造,而可以依靠协作,因此标准化的水平提高,是促进工业生产专业化与协作的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生产专业化与协作的发展,也必然促进标准化水平的提高;第三、标准化的水平提高,有利于机器设备的维护与修理,可以缩短修理时间,提高机器设备的利用程度;第四、标准化水平提高还有利于安全生产和企业之间关系的正常化等等。工业标准化的内容十分广泛和复杂,它包括原材料标准化,机器设备标准化,产品、零件、部件标准化,工、夹具量具和仪表的标准化,还有检验方法的标准化……等等,以上这些又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标准化的水平和工业发展水平也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要加速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的发展,抓好标准化这一环节是不容忽视的。

以上所述的条件,只是就当前的一般情况而言,由于生产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对组织专业化生产的条件也要用辩证的观点来进行分析、研究。至于那些城市,那些行业,那些产品、零件、部件、毛坯,那些工艺实行专业化生产,这就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生产的需要与可能来确定。条件已经成熟的就先实行专业化,尚未成熟的就积极去创造条件,真正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合理地组织专业化生产,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广东文、史学界开展关于《海瑞罢官》問題的討論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广东学术界极大的注意。广东历史学会、广东语言文学学会筹委会和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文科的有关系和专业，都先后就《海瑞罢官》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讨论中，大多数同志认为，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和很中肯的批评意见，把问题提到了原则的高度。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服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必须得到正确的解决的。

一些同志在发言中，具体地分析了海瑞的“退田”和“平冤狱”的历史背景及其阶级实质后指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以至曲历史事实和颠倒海瑞的阶级立场的手法，把一个封建卫道士的海瑞硬描绘成是“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是“站在农民一边的”。农民只要依靠海瑞自上而下搞点“退田”，就可以实现“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于是，在《海瑞罢官》里，一点也看不出海瑞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看不出封建国家的官吏、法庭、法律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相反，它给人们的突出印象是，只要有了海瑞这样的“清官”，就可以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农民就可以获得土地，过好日子了。显然，吴晗同志透过海瑞，竭力宣扬阶级调和论，宣扬超阶级的法律和超阶级的国家观，宣扬改良，宣扬封建道德，这些观点都是与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国家观根本对立的。

一些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海瑞是三百多年来剥削阶级神化了的形象，是剥削阶级用来调和阶级矛盾的一面旗帜。今天，吴晗同志塑造的海瑞形象，不仅继承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海瑞形象的毒素，而且把他提到了阶级的高度，特别突出海瑞对现存秩序的叛逆性格和干预精神，号召我们向他学习。因此，吴晗同志对他所塑造的海瑞形象的宣扬，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是适应了社会上一些小撮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政治需要。

在讨论中，对如何评价海瑞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有不同意见：一些同志认为，海瑞不仅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更代表了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是大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是一个对农民采取军事镇压与政治欺骗而尤长于政治欺骗的封建卫道士，是必须否定的一个历史人物。有的同志认为，从阶级利益来看，海瑞代表了江南地区的商人、小地主、少数富裕农民的利益。他主观上是要维护封建统治，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客观上符合新的政治经济势力的兴起，对自然经济起了一种冲击作用，对明末新的社会势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效果受到很大的限制。有的同志认为，海瑞是属于地主阶级的，但他代表着小土地所有者阶层，所以他反对大土地所有者，保护小土地所有者，并同情贫雇农。因此，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在否定中应该有所肯定。

由于海瑞是历史上所谓有名的“清官”，因此，在讨论中还涉及到“清官”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清官”与贪官的本质是一致的，“清官”更富于欺骗性，应着重揭露其阶级本质。有的同志则认为，不能说“清官”更富于欺骗性，“清官”与贪官应有所区别。“清官”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应予以肯定。

广东各有关学会和高等院校文科各系准备就《海瑞罢官》中的有关问题进一步开展讨论。

学术研究

一九六六年第一期（总第二十五期）一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学术研究編輯委员会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处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訂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本刊代号：46—3 定价：每册 0.35 元
本刊每逢单月五日出版